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本书是供內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幷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20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柏林 Verlag Neues Vater land 1919 年出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卡尔．考茨基着
马清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3 年 6 月第 I 版
1964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02　定价(七)0．80 元
印数 2001—3000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供内部参考)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马清槐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出版者说明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为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写的一本书，一九一九年六月写成发表。这本书实际上是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擅篇。早在一九一七年，列宁就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论点进行了详尽的揭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宁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完全不理列宁的批砰，紧接着又写了这本小册子。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据考茨墓自己说，是要“讨论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态度”。他采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书名，妄图把它作为“声讨”布尔什维克“罪行”的“檄文”，以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九年九月，当列宁看到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消息时，立即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卷)，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真面目。

全书共八章，前七章是考茨基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所谓恐怖主义所作的“历史考察”，说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历来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维克正是犯了“残酷恐怖主义”的罪行，认为“只有一味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推克有着某种继承的关系”。

考茨基在这部分历史说教中，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直接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

在一些章节里，考茨基还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幌子，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他“探讨”所谓“恐怖主义的渊源”说，在早期社会，农业居民是定居的，所以习尚和平，讲究人道;而畜牧业、商业是流动的，所以牧民和商人惯于掠夺，崇尚残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两种倾向，商业资产阶级倾向残暴，工业资产阶级倾向和平。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弃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纪人道主义倾向的发展，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布尔什椎克又违反了这种倾向，这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说在前七章考茨基还作了一些“引经据典”的工作来为自己的谬论辩解，在第八章他已找不出任何论据而只能进行污蔑和咒骂了。在考茨基的笔下，苏维埃政权被描糟成漆黑一团。

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考茨基首先是从“分析”所谓“时代的特点”谈起的。他说“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所渭苏维埃，只不过是“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指责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污蔑布尔什维克开展的“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运动，即“剥夺剥夺者”的斗争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会考虑实际的局势”，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据考茨基说，剥夺资本必须和经济改组一起进行，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两者“一分为二”，“截然分开”。指责布尔什椎克放手发动农民、没收地主上地、征用富农粮食是犯了“走上劫富济贫的侠盗式道路”的错误，诋毁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听任群众“自由行动”，说什么已经把“剥夺的过程从对于生产资料的剥夺扩展到对于消费资料的剥夺”，“很容易走上抢劫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的肃反政策，也是考茨基攻击的目标。他说“枪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能”，“他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那里去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

考茨基把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污蔑成苏维埃政权在面临经济破产前强行的“强迫劳动”，“实际上是要把现在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阶级”。

考茨基还搜集了不少“材料”，攻击布尔什维克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批评布尔什维克虐待知识阶层;斥责布尔什维克“控制报纸”，侵犯“出版自由”，以宗教裁判所的态度，以绝对独裁的形式，强制群众绝对服从;责难布尔什维克败坏无产阶级道德，如此等等。一句话，在考茨基看来，布尔什维克是十恶不赦的罪魁，苏维埃制度是“革命的黩武主义”，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

考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说，这“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原则 ，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虽然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他喋喋不休地一再污蔑苏维埃政权是所谓军事官僚机构，说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统治者是“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在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说什么“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合并成为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结果”。这个政权眼下虽然没有垮台，也只能“苟延残喘”，因为“像旧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经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叛徒考茨墓就是这样来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

考茨基在书的结尾还谈到了世界革命的问题，极力抵制布尔什推克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离间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妄图说服他们脱离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路线。他把布尔什维克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说成是“自相残杀”，是“兄弟阋墙”。说“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是党派粉争的产物”，“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傅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中掀起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考茨基提出他自己的一套世界革命的路线说，世界革命实现的道路“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线，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说什么“民主制度是赖以实现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说的文明人的权利”，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远景”，等等。最后考茨基还把矛头指向第三国际的成立，认为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宣扬资产阶极民主的批判是极端错误的，哄嚷“没有一种说法比这更为错误的了”。

目　录

序 言

这本着作是大约一年以前动手写的，但由于十一月九日的革命而中断了；因为革命给我带来了不属于纯粹理论和历史研究范围的新的任务。过了几个月，我才能够继续动笔，在偶然间断的情况下把这本书写完。

最近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增加这部著作的完整性。这一点所以比较难办，是由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对于这个论题的研讨多少有些改变。我的出发点是讨论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什么态度。可是，既然布尔什维主义自动提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先驱和雏型，认为巴黎公社已经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赞许，同时鉴于现在这一代人还不大认识和了解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我就把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作了对比。

为了使读者能对公社有所了解，我不得不论及巴黎公社，以后又论及法国革命及其恐怖时代。这给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此较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方法；因此研讨公社之后就必然要进一步研讨恐怖主义、它的起源和它的后果。

这样，本书就由两条思想路线合并而成，但其中的一条又间或离开了另外的一条。起初，我觉得这个办法多少有一点叫人发生混乱，甚至考虑到是否还是把这本书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阐述巴黎公社，另一部分讨论恐怖主义。然而，就我的出发点而论，苏维埃共和国同历史上的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分别加以论述。因此我希望，虽然存在着本书的二重性所固有的困难，我终于能够保全书中所包含的思想的结构的完整性。

读者可能认为我的许多例证和解释是学究式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纷扰动乱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仿佛已经使历史上的真情实况适合于当前的需要了。相反地，甚至在我论述一个过去的遥远时期的那些段落里，我也经常力求只讨论问题的似乎有助于阐明我们周围的混乱局面的那一个方面。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现今存在于俄国和德国的这种混乱局面，我们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前途就一定是很不可乐观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在这两个国家，我们发现政府下面的社会主义者作出不利于其它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其残酷的程度与半个多世纪以前屠杀巴黎公社成员的凡尔赛刽子手们的暴行没有什么不同，而那种暴行是一向引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值得称道的愤慨的。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际的时候，前途就立刻显得比较光明了。西欧的工人们已经起来。唯有他们才能取得实际的成绩，如果他们采取的方法此东方至今所采用的方法来得高尚的话。

因此他们有必要向我们吸取经验，知道怎样凭成效来认识不同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这倒并不是盲目地恭维那些直到现在为止占相当优势的革命方法，而毋宁说是提出必要的、尤其在目前必要的最严格的批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经历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想在这危机中力争上风。

革命的成功将大部分取决于它是否能发现正确的方法来把革命的使命传达给无产阶级。研究各种方法是我们目前最崇高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这种研究，从而促进革命的向前发展。

卡尔．考茨基

1919年6月于夏洛腾堡

第一章　革命与恐怖

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社会民主党最广泛的范围内流行着这样的想法：不仅对于西欧，而且对于德、奥两国来说，掀起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无论是谁，只要他抱有不同的想法，就被嘲笑为革命的空想家。

现在我们碰到了革命，这次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暴的姿态，是连平时设想得最出奇的革命空想家都料想不到的。

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十分明白的要求。可是，这次革命却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的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受威胁。诺斯克已经冒失地仿效托洛茨基的榜样；当然其间还有这点不同，即他本人并不认为他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两个人都以革命的权利为理由来为他们的屠杀作辩解。

事实上，认为恐怖手段是革命的一种要素，以及谁要革命谁就应当设法向恐怖手段作某种让步等想法，是流传很广的。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人们一再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它被看作是最出色的革命。

要探讨恐怖主义及其种种情况与后果，最好是从叙述无套裤党所建立的恐怖统治入手。我们将从这方面开始。这会把我们带回到离当代事件相当遥远的时代，但我们在考察过去以后就会更清楚地理解当前的事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和当代的那些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肯定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然而当代的那些革命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十八世纪的革命有所不同。如果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工商业同那个时期相应的现象比较一下，这一点就立刻可以看出来。

第二章　巴黎

目前的德国革命没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间发生影响的恐怖统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十八世纪甚或十九世纪，没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只要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经济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它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它的职权范围并不很大，其相应的一般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或所在地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所在地。只要运输系统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只要个别的地区不足以供养君主和他的家臣，君主就往往格外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所以，他有更迫切的动机要亲自巡视他的领土的各个地区，因为这是他可以指望借此维持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那初期，君主的主要工作是像一个游牧民那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逐一地寻找水草丰盛的牧场，在耗尽了它的可用的东西以后立即舍之而去。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政府机构有了扩展，而生产的发展就使货币制度成为可能，并可强制臣民以容易运带的硬币而不是以笨重的自然产物向君主纳贡。随着纳贡义务的增加，君主的权力也有所扩大，以官僚政治和常备军的形式出现的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样，向各地流动的情况就成为不可能了。君主和政府必须设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单独的大城市既然位居王国的中心并比外省的较小的城市为富，就成了商业辐辏之所。它们就终于成为君主选作驻在地点的首府，后来其中又有一个特殊的城市被选为政府和君主的永久驻在地。这里立刻便聚集起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人们，全国的税收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流回到外地去。为宫廷和政府服务的商人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还有那些以银行家的身分来同国家做交易的金融业者。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超过了贵族的权力，后者的独立性立刻被摧毁了。大贵族愿意安居在远离国王驻所的自己的庄园里，对于他们的行动君主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应该在君主的亲自监督之下呆在宫廷里，专门为君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毫无益处和好处的真正的服务。君主剥夺了他们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的职能，把它们交给他所任命的并给与薪给的官僚与官吏。朝臣逐渐变成了懒汉，他们一生的唯一义务就是呆在宫廷里，乱花从自己的产业上得来的收入。因此，当年他们在自己的城堡和城寨里同家臣们一起消费的东西，立即流进了宫廷所在的城市并增加了它的财富。在那城市里，他们在国王的王宫的旁边建造了新的邸宅；他们既然被剥夺了一切正经的职务，就花天酒地地挥霍他们的财产。同他们一起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的“暴发户”竭力模仿他们的行动。

因此，与乡间各地和“外省城市”大有不同的王室所在地就不仅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而且也成为追欢寻乐的生活的中心。这对乡间的一些人而事实上是许多局外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有钱过享乐的生活，便是具有帮助寻欢作乐的人获得欢乐从而可以骗取他们的钱财的意愿和本领。

可是，比较严肃的人也被吸引到宫廷所在的城市里来。住在偏远庄园里的贵族除吃喝、打猎和同邻近的姑娘作乐以外，没有其它的消遣，城市却开始采用了比较精美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贵族开始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赞助科学的精神立刻成为“一时风尚”。因而艺术家和学者不久便聚集到宫廷所在地来，他们希望在那里更快地获得进步。宫廷所在的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是增多，艺术家和作家就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里，希望紧靠着贵族找到一个立足点和一个销售作品的市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许多实业家和商人是为了满足所有这些人的要求和需要而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的。没有什么地方此宫廷所在的城市更能提供发迹的机会了。凡是有才智、自信和精力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去。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的目的。有很多失败的事例，那些失败的人形成了首府的另一个特征。他们就是那些力求在首府改善自己地位的成群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只有在首府他们才能很好地躲藏起来，等待他们可以立即加以利用的运气的转变。他们是像里科．德．拉．马尔蒂尼埃这样的人。不但是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有放纵的追欢寻乐，连同最辛酸的贫困和屡见不鲜的罪行，成为皇家首府的另一个特色。

与特殊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一种使居民精神活跃起来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宫廷所在地，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数量往往让位于质量。

在一个小国里，或者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里，宫廷所在的城市很小，上述的特征有许多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城市里，最显着的特征是居民的依存于宫廷，并且这种依存性不仅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朝臣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粗暴、更加鄙俗和更加天真，并在从首都获得启发的外省居民中间反映出来。

这是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君主和奴隶色彩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俱来的“地方观念”的根源。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兴起时使其先驱居于最显着地位的心理状态。它使得不顾一切的波纳宣布：“其它的民族都是奴仆。日耳曼人是受人服侍的”——这样一种思 想由海涅更睥睨不可一世地表达了出来：“德意志这一虔诚儿童的养育所，并不是罗马杀人犯的巢窟。”

但是，在一个宫廷所在的大城市里，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城市愈大，被吸引到宫廷去的人们同那些力求在城里发迹的其余的居民此起来，其人数和势力愈小。希望破灭的和不满意的人愈多，他们就愈加团结一致，并且他们的力量也愈大。这种局面并不单单鼓励了那些人，它也激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虽然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不满的理由，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反对到处都很流行。在较小的城市里它处于潜伏状态，在较大的城市里它就敢表现出来。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大陆上的宫廷所在地中间，最大的是巴黎，它是欧洲当时最重要的国

家的首都，在十八世纪末约有居民六十万人。魏马是德意志的宫廷所在地和精神中心，约有居民一万人。

巴黎的居民很早就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因此就发生了一六四八年的福隆台党的叛乱，这次叛乱是政府和作为最高法院的巴黎议会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当时筑了许多街垒，直到最后国王不得不逃离巴黎。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在这同一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斗争一直持续到一六五二年，这一年君主政治不得不达成某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不久便导致专制制度的复活。首都居民已在斗争中同高等贵族团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联合。高等贵族在反对君主政治的斗争中任何行动都无法获得胜利。巴黎所具有的反对路易的力量，与伦敦所具有的反对查理的力量不同。

当路易十四还是青年的时候，福隆台党的斗争就发生了。巴黎市民的起义和他的逃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再经受同样的屈辱，他在巴黎城外建立了王宫。当然，他不得不抛下政府机构，但他选择一个离开巴黎极近的地点作为他的宫廷的固定所在地，以保证同他的王宫有一种经常而迅速的联系，然而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致受任何街头骚乱的侵扰。一六七二年，要使他或者毋宁说是他的人民花费百万法郎的新宫在离巴黎十二哩的凡尔赛开始兴建。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它屡次证明它是不顾巴黎的反抗者而被建造起来的。

虽然巴黎往往坚决起来反对国家的中央权力，它对那个权力的态度却并不总是带有统一行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努力争取独立和脱离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它的财富与权力却取决于帝国的幅员和帝国国家权力的实力。它努力争取它那社会的自治权利，但它从国家的中央集权获得更大的好处，因而它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是赞成中央集权的。

由于巴黎对帝国的其它一切部分占据突出的地位，它在十八世纪的期间才能把法国各个征服的省份在全国紧密一致的气氛下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怎能使亚尔萨西亚人同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德斯人同加斯科尼人团结起来呢？但是他们都和巴黎有关系。他们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在巴黎，在那里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民族。巴黎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的最坚强的拥护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矛盾心理在巴黎对外省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在巴黎，帝国正在遭受其打击的弊害很快地被揭露了。巴黎此其它任何城市更有勇气来揭露和谴责它们。它很快就获得了向它们进攻的力量。因此它成为苦难中的全部法国的领袖。外省的人民由于散居各处，在知识上是落后的，并且精神颓丧、软弱无力。他们把巴黎看作是自己的先驱、自己的救星，往往十分热情地仿效巴黎所作出的榜样。

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不仅由于它的居民的劳动，而且由于对外省的剥削，已经变得很强大了，那种剥削的结果是使外省制造的货物绝大部分流进了巴黎，其中一部分被浪费掉，一部分被用来积累资本，并使国内的剥削者与投机商人得以发财致富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除信赖进步的巴黎以外，还产生了把巴黎看作一个剥削的都市的那种真正的仇恨，从而出现了首都和外省的对立。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有时是一方、有时是另一

方占了上风。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的结果，经济上的对立变得格外显着。在广大的乡村和外省，经济显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就产生了因袭保守和墨守传统道德观念的风气。而且，谁要是不愿接受这些观念，谁就得把这种真实的情况掩盖起来，因为在乡村和小城市的狭隘的范围内，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这种监督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是完全没有的。那里谁都可以放大胆子，嘲笑过时的传统。这些传统不但受到下面而且也受到上面的攻击；那就是说，既受到下层阶级的群众又受到寻欢作乐的傲慢贵族和资本家的攻击，前者由于生活贫困和变化无常，既然不再看重家庭生活，也就不愿为私有财产的种种考虑而有所畏缩。在这两部分人的中间，还存在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帮闲，他们往往像乞丐无产阶级一样地贫苦不堪，虽然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城市贵族和大金融家所享受的舒适生活。

所以，难怪谨慎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要对这个塞纳河畔乱糟糟的社会的极端不道德行径感到毛骨悚然了，因为油嘴滑舌的巴黎人总想嘲笑乡下人的乏味的实利主义和狭隘的偏见。

在宗教问题上，也像在道德问题上一样出现了反对的意见。对于与世隔绝的农民来说，牧师是为他们操心的唯一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在他们和外界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超出教堂尖塔范围以外的知识。这种知识早已赶不上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够在乡间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心理上产生什么印象。他们依恋着教会和教团，虽然他们只是尊崇这些团体的精神财富。他们不愿为自己获得教会的物质财产。

另一方面，对于巴黎人来说，教会的财产没有教会的影响和它的宗教观来得重要。

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是获取知识和保卫知识的手段，那么文艺复兴以来民间的和世俗的知识就早已超过了教会所提供的知识。在城市的人民看来，教会不但不再是扩大知识反而倒成为阻碍知识的手段。由于牧师们企图与世俗教育论者列于同等地位(他们对后者的优越性日益有所体会)，并企图采用国家的镇压和强制措施以实行自卫，反对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世俗教育论者用他们最犀利的知识武器、极端的蔑视以及最彻底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行报复。他们用更大的热情和兴趣指挥对教会的战斗，因为通过这些方法和根据当时一般的条件，如果他们在热情奋发时能够谨慎从事，他们是有希望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官僚争取过来，或至少有把握使他们严守中立的。这是因为贵族和官僚不仅轻视传统宗教的教义，他们还觉得天主教会动辄妨碍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愿无条件地与具有等级的国家机器结成同盟。这样，反对教会的斗争就不像反对专制制度那样危险；因此国内的日益高涨的反对力量首先努力解决与教会有关的问题。

但是甚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出有某种分歧。统治集团每逢教会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组织时就起来反对，但在他们看来，教会还不失为使下层阶级唯命是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分歧甚至在过激的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也很显着。伏尔泰创造了“打倒不光彩的(教会)”这句名言，但他看出有必要为了人民而把宗教保存下来。

在巴黎的下层市民和他们的领袖中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当然，他们都反对教会并希望和它不发生关系。可是，无产阶级总想得出冷酷的结论和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于是下层市民中有些人便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鼓吹并宣传最彻底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有其它一些人则厌恶这种思想倾向，因为这是贵族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所采取的纲领，尤其在革命时期。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在法国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甚至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一书中都把自己放在卢梭和罗伯斯比尔的一边，因为后者在反对无神论者狄德罗和阿纳尔夏西斯．克洛茨的时候，坚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他们知道，无神论推崇人们中间的混乱，因为它预先假定了天堂的无政府状态。"路易．勃朗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在无神论者看来，天堂也像上帝本身那样是不存在的。像直接的阶级对立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些争论和矛盾必然会通过像大革命这样一种翻天复地的剧变而引起最激烈的冲突的。

第三章 大革命

路易十四由于恐惧，已从巴黎逃到他选作王宫所在地的凡尔赛，这同一位路易终于能够粉碎贵族们获得独立的企图。他同时有很强大的力量，足以在对邻国的斗争中扩大他的王国，使它成为 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他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些斗争使法国民穷财尽，濒于破产。

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是从一七〇一年起直到一七一四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以法国的失利告终，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战争本身就足以引起一次革命。人们对于这位君主的强烈的反对情绪是普遍的。这可以从他在一七一五年逝世的情形看出来。

“他的葬礼是以尽量简单的形式办理的，以便‘节省时间和金钱’。这时自己相信已经摆脱了不可容忍的束缚的巴黎市民，当这位伟大的国王的柩车从街上经过时跟在后面，不仅高声愤怒地诅咒和唾骂，而且确实扔了烂泥和石头。乡间到处发出了快乐的呼声，夹杂着对死者的诅咒。各处都举行了感谢祈祷。能从这种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鸿运，公开地和毫不羞愧地流露出来。和平、行动自由和减税，是人民希望从摄政者取得的利益。”[1]

法国的人民注定要受“储君”的追随者的许多苦难，才能通过大革命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国家刚刚开始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就陷入了几场新的战争。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年，它为了波兰和洛林同奥地利作战，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年，它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反对马丽亚．台里萨和英国；一七七八至一七八三年，他们能够通过大革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些战争不仅破坏了这个国家，它们还指挥失当，以致没有给法国人带来任何军事上的光荣。”（罗斯巴赫语）。

专制主义依靠新兴中产阶级的帮助，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阶层，但其目的不是要想把它废除，而是要对它行使无限的权力。君主觉得他是不能没有贵族的。他挑选那些仍然对他效忠的贵族成员担任国家行政和军队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剥夺了这些贵族的一切独立性。他降低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过一种寄生的享乐生活为止，从而使他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腐化堕落，引导他们走上经济破产的道路。

贵族的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破产愈是明显，这些贵族对农民的要求就愈多，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就愈加厉害，他们的农业在经济不稳定的局面下也就遭到更大的损失。同时，贵族把不幸的农民看作主要的纳税人，对他们的要求大大地增加了。这是因为，那些贵族虽然通过他们的外交和军事的冒险已使国家遭到破产，却并不就此心满意足，还想用掠夺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经济衰落。在这方面，他们有教会和君主作为靠山，因为这些势力就是

全国的大地主。

以巴黎的这些不可救药的情况为背景，可以发现一个迅速兴起的拥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强大中产阶级，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对国家和社会秩序颇有影响的种种弊害，比欧洲其它大城市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格外严厉地指摘它们和格外不留余地地斥责它们。在他们的下面，是欧洲势力最为雄厚和怀有最大自信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人数最多、最为集中、最无顾虑和最坚决的无产阶级。

当这些对立的势力开始互相谴责的时候，一场可怕的冲突就立刻变成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最后，君主政治已经束手无策，同时由于金融家不再贷出款项，财政的破产已迫在眉睫，于是冲突爆发了。

封建的市议会体现出是贵族、牧师和普通公民的常任代表，它们从一六一四年起就一直没有召开过，这时它们被请求来帮助政府，批准新的捐税和公债，因而也就是协助提高破产的专制政治的信用，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个别市议会的选举是在一七八九年宣布的，当选的议员被召集到凡尔赛的王宫里去。

然而，除朝臣以外，所有的阶级都痛恨当时的制度。这些市议会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开会议以后，着手改革捐税和公债，而不是制定新的捐税和公债。可是对于这个问题，贵族与牧师的看法多少有些和中产阶级不同。这些人通过他们对于这些市议会的敌对态度而取得了胜利。一般的市议会被组成一个拥有宪法制定权的国民议会，它给了法国一个崭新的宪法。

国民议会的权力最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它所信赖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对它拥护这一自觉。但这并不能使它避免实权集团的政变。君主政治仍然控制着像军队这样的力量，并且具有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但他们必须记牢仍旧由巴黎所掌握的实力。只有在把巴黎制服之后，他们才敢希望解散国民议会，使它屈服于君主政治的意志。因此，许多军队在巴黎调集起来；当他们认为一切都万无一失的时候，他们接着就发动了政变，罢免了国民议会曾经企图强迫国王接受的大臣涅克尔(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

不论巴黎是否十分镇静地对待这个事件，还是它同军队发生了冲突，革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巴黎起义了，国王的军队败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冲进了“残废军人院”，夺取了大约三万件武器，袭击了在革命的近郊地区前面的要塞、即巴士底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可是这时国王和他的朝臣联合了起来，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揭竿而起。以前已经有过纯粹农民起义的事例，那是很容易地就被镇压下去的。但这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这场刮起的风暴了。巴黎当时拯救了革命，使它成为普遍的运动。

风暴看来好象逐渐在减弱了。国王和他的封建朝臣恢复了勇气；他开始反对国民议会的某些决议并召集新的军队。因此巴黎人得出结论，只要国家的首脑、即国王和国民议会仍旧

留在凡尔赛，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安全。他们希望把国王和国民议会置于他们的监督和直接影响之下。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人们成群结队步行到凡尔赛，把国王带回巴黎。人民这时希望享受和平生活，能够把他们的精力用来建立宪法，从事那种由于情况改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和好处的实际工作。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路易十六宣誓忠于宪法，虽然这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意的。他觉得自己是杜伊勒里王宫中的一名囚犯，他的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引起他的反感。

在他宣誓忠于宪法之后未满一年，他就秘密逃走(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并且在他尚未抵达安全地点之前竟十分错误地向人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留下了一个文件，声明他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后所发布的敕令和公告，都是违反他的本意强逼他发布的，因此他宣告无效。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冒失的行动；因为他在潜逃的过程中被人认了出来，变成俘虏，并且被解回巴黎。

甚至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情绪激昂的群众就要求废黜国王；但人民群众的君主制的本能根深柢固，无法使这样的步骤获得成功。这一点救了路易，因为当时他所耽心的就是废黜。

当法国在他的君主制度的统治下卷入与欧洲的同盟君主国家进行的战争时(一七九二年四月)，他的命运更糟了。这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夺取若干土地而进行的战争。这是封建贵族和欧洲的专制君王为反对一个已经获得自由、这时有再度遭受奴役的危险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具有一切作为内战的特色而连带发生的残暴行为。国家的敌人使革命的人民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他们自己的国王却是国家敌人的同盟者。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的观念丧失了它的全部力量；可是国民议会还不能断然地把它抛弃掉。这时又是巴黎人坚持要把路易囚禁起来和召集新的国民议会，他们召开了国民公会，责成该会为法国制定新的民主宪法(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在第一次会期，这个新的国民公会一致决议废除君主制(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但巴黎人相信，只要路易十六仍旧健在，共和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他们要求按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国民公会的多数成员不敢采取这个措施。可是，当巴黎人听说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了一只存放若干文件的秘密碗橱时，他们怒不可遏。这些文件证明：国王已经收买了许多颇有口才的议员，其中就有米拉波，他的卫队中有好些人参加过奥地利的军队对法作战，甚至在那次战争期间就领取他的津贴。

虽然有这些事实，国民公会的一部分成员还竭力想拯救国王。他们打算求助于法国人民。路易的命运应当通过一次大选来决定。

这种挑拨外省来反对巴黎的企图，遭到了巴黎人方面最坚决的反对。国民公会慑于对巴黎人的畏惧，向人民求助的提案以四二三票对二七六票被否决掉。这样，路易的命运被决定了，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走上了断头台。

当时竭力替国王说情的共和党就是所谓吉伦特派，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乃是因为最初组成该党核心的候选人是在吉伦特省选出来的。他们把巴黎恨入骨髓，想要破坏它的势力。他们想使法国变成一个联邦国家。

“在召开国民公会四天之后，吉伦特派拉索尔斯在他同党的鼓掌声中反复地说：‘我决不让巴黎由一伙阴谋分子所操纵，也决不让它对法国说来变成一个像从前罗马对于罗马帝国那样的城市。巴黎的势力必须缩小到八十三分之一，即其它任何地方都同样享有的那一份。’”[2]

吉伦特派和巴黎的对立采取了最激烈的形式。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起义中，巴黎人终于能够实现他们所提出的驱逐并逮捕三十四名吉伦特分子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的报复手段是：诺曼底的吉伦特分子夏洛特．科尔台暗杀了马拉(七月十三日)；不久以后，吉伦特派又企图煽动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来反对国民公会——这些都是在战时发生的。对此，巴黎人实行报复，处决了能够在巴黎找到的一切吉伦特分子(十月三十一日)。

[1]菲利普逊：《路易十四时代》，第518页。

[2]库莫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党》，第349页。

第四章　第一巴黎公社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我们曾经不断地谈到“巴黎人”。自然，并不是巴黎的全部人口都可以归入这个名称，因为当时存在着许多显然互不相同的阶级。所谓“巴黎人”’应当理解为这个都市的广大居民、即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就后者这个名词来说，我们不应当把它理解为大工业所产生的近代的无产者。当然，那时巴黎有一些工厂主，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工人是作为苦力和搬运工人受雇来担任种类繁多的工作的，或者就是一批工匠的学徒，他们希望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变成独立的工匠。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作为家庭手工业者的小工人和各种各样的居间人，他们的生活最为贫困，最没有保障。

这种生活贫困和缺乏保障的情况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化，而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即根据他们的收入来源而言，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以过一种舒服的资产阶级生活为理想。没有什么事情比把收入决定的地位同阶级决定的地位混为一谈更能使人产生误解的了。这个混淆在过去是由拉萨尔、在今天是由我们的俄国同志们造成的，因为这些俄国同志们相信：贫农的阶级利益和富农的不同，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和城市的以工资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相一致的。这个说法正同有些人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荒谬，这些人认为：小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和大资本家的不同，他们同财政资本的对立是和无产阶级同资本的阶级对立相一致的。小资本家希望变成大资本家，小农也希望增加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而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前者正像后者一样地渴望靠牺牲工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小农通过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时，小资本家则通过高价出售食品。

因此，大革命时代巴黎的穷苦市民按阶级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这种生活状况并未使他们抱有与景况较好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目标，虽然这种生活状况所给予他们的从事日益激烈的斗争的手段是不大受那比较顺遂的小资产阶级欢迎的。

挨饿的人无法等待。他感到绝望，因而不能从容地考虑手段的选择问题。对他来说，生活没有什么牵挂，他除自己的镣铐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因此他在一次动乱的期间不惜摒掷一切，为新的局面预作准备，并希望由此做天下的主人。

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即巴黎居民中的广大群众形成了革命的巨大动力。他们的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作风使他们成为巴黎的主人，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统治者，并让法国征服欧洲。

他们的斗争手段在于武装起义。他们的起义不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本身也不是从占优势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要有组织得多。可是，他们倒是由群众的而不是由他们领袖的自

发的压力中兴起的，并且也只有依靠群众，这些起义才往往势不可当。如果一次起义必须由领袖而不是由下面推动的领导力量来诱发，这次起义就表示缺乏必要的动力，整个运动非失败不可。在这次革命的全部发展期间，群众是动力，领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局势是向前发展的。当情况适得其反，领袖们觉得有必要激励群众起来斗争时，革命就已经趋于衰落了。

可是，如果说一次起义只是在自发的时候而不是在领袖指引的情况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并不是说它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也有绝大的获胜把握。大革命时期的几次巴黎起义在群众的组织方面是有它们的基础的。

甚至在最初出现骚动的迹象的时候，在攻打巴士底监狱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组织的核心。后来这些核心获得了更加紧密和稳固的基础。

在革命期间，每一个团体都要求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制宪会议根据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法律所建立的条件，由于国家突然丧失权力，已经到处存在了。那些团体获得了较高水平的自治权，即控制全部地方警察、指挥公民自卫队以及正在各城市组织起来的国民军的权力。

可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竭力不使下层阶级分享他们的权力。国民议会把公民清楚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公民是那些至少以三天工资缴纳直接税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选举地方议会和国民议会。只能从他们中间招募国民军。这些团体后来发展成为有钱阶级的代议机关。

但是巴黎的“消极”公民以及他们的从积极公民的队伍里来的朋友们，连同正式的地方代表会议，也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为了选举，巴黎被分成六十个区，由它们选出候选人。在候选人被提名以后，这些选区就不存在了。但它们没有取消，而是自动地组织为市政府的永久性的机构。它们不愿横遭摧残，在七月十四日(攻打巴士底监狱)以前整个巴黎处于动乱状态的时候，它们开始把人民武装起来，并担当独立的当局的职能。在攻下了巴士底监狱之后，各区已经变成市政府的公认的机构。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设立了一个中心办事处，特别代表们可以到这里来聚会，互相交换意见。这样就产生了组织公社的初次尝试——通过联合各区的组织而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运动的结果，而各区的组织则已经在人民的自动创议下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当国民议会正在逐渐削弱国王的权力时，各区以及各分区也逐渐在人民中间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它们建立了巴黎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为八月十日的革命公社打好了基础。[1]

国民议会竭力想要取消各区的会议组织。通过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律，巴黎选区的划分有了变动。但是“消极的”公民不理睬这种禁止。各区这时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点。不久以后，凡是公社或国家大事无一不是由这些区进行讨论并参与问题的解决的，因此这些区的全会就变成了常设的机构。只有通过它们的永久的性质，才能展开紧张的活动。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各区完全代替了已经彻底衰落的公社代表，它们组成了新的机构，

即由每一区推派委员三人组成的革命公社。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受那些区拥护的巴黎公社决定了革命的进程。

后来的历史著作都没有能够给予这些区以应有的地位。它们的工作是由许多不知名的人完成的。革命时期的知名人物在雅各宾派里比在各区里格外出类拔萃。可是，雅各宾派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各区，并且往往是雅各宾派方面显出举棋不定、畏缩不前的神态。只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无产阶级才能勇往直前地断然闯进未来的世界。

恐怖统治的起源

通过公社，巴黎的无产阶级获得了革命法国的一个统治的地位。但这个地位是分裂的，正如巴黎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当时的无产阶级在一般社会中的地位那样。

小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意识，采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观点。他们不能摆脱私有制，他们需要它来继续进行生产和生活。然而他们身为穷人，对富人的财产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富人的一帆风顺使他们感到愤慨，富人的财富是靠他们的不幸遭遇积累起来的。正就是这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庞大财产的不计一切的敌视态度，使他们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具有旺盛的精力，并且由于巴黎的卓越地位，使他们成为全国广大人民深切关注的这场革命的先驱。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在其反对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反对欧洲整个君主制度的坚强斗争中，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全部力量作为后盾。因此他们能够蔑视全世界的当权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的权力都到了他们的手里。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黎工人的强大的革命自觉精神才开始产生。由于这种自觉，直到第二巴黎公社的时代为止，甚至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止，巴黎的工人始终是整个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十分值得称道的典型。

可是这个阶级本身却代表着巴黎的最糟糕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迫切地要求廉价的食物，特别是在大革命的时期，所以这个革命实在可以称为饥饿的反抗。结果促使巴黎的穷人愈来愈同农民、中间商人、有钱人以及那些由于拥有私有财产事实上最能靠生产资料获利的人们发生矛盾，因为私有制在当时零售业盛极一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废除的，并且也没有人尝试过甚或建议过要废除私有制。当无产者企图就这种矛盾在巴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把巴黎的力量显示给全国各地方的时候，情况的发展使他们了解到，他们不能长久地作为少数来保存自己而与多数相对立。所以尽管以前获得了多次胜利，他们还是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无产者参加革命时所抱的希望，是想摆脱封建主义下的悲惨境遇从而排除一切的不幸，正如资产阶级曾经承诺和想要做的那样。他们这时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权力，可是仍旧只有资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在事业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大城市里的贫穷现象没有减轻；相反地，贫穷的真正的菩痛却第一次开始让人切身地感觉到了。

饥馑和物价高涨是整个革命时期的突出现象。一般人把它们解释为连年荒歉的结果。可是据我看来，革命时期的饥谨并不单纯由于这个缘故，而是革命本身的直接后果。

那时农民中间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民除奢侈品以外简直不需要城市的工业制品。他不仅生产自己的食物，而且也为他自行制造的纺织工业提供原料。他也制作自己的简单家具和许多家用工具，他在生产方面所需要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有农村的工人供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他事实上还到城市去出售产品，那是由于国家对他征收各种捐税，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生产需要。如果他不把他的谷类、牲口、酒类或者他在家里生产的其它任何东西带到市场上去，他便无法缴纳那些税款。

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还必须以实物向封建主纳贡，并且在其封建主的庄园上完成一定数量的强迫劳动。在这些封建主用这样的方法积聚起来的农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供家庭消费之用；他们把大部分出售给市场，换取金钱在城里过放荡的生活。

因此，捐税和封建负担一方面提供了流入巴黎并在那里流通的金钱，它们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为换取戋戋的现金收入而使巴黎获得粮食供应的产品。

革命暂时取消了封建负担，同时由于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征收捐税，那些捐税也暂时停止缴纳了。因此农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非出卖他们的产品不可。首先，他们利用刚获得的自由尽量吃饱，把政府和封建主义硬要他们遭受的半饥不饱的处境告一段落。对于所剩余的产品，他们打定主意只按十分高昂的价格出售。今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他们廉价出卖产品了。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就必然产生了物价的高涨以及巴黎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形式。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确曾编组了一支一万名的革命军队，它的责任是在乡村搜索并为巴黎征发粮食，所采用的正就是俄国最近尝试的并且同样以失败告终的那种方式。这是使今天的俄国革命甚至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特征。

战争使法国遭受“包围”，并使缺粮现象不能依靠从国外输入粮食而得到缓和，这就使矛盾甚至格外尖锐化。矛盾使巴黎人挨受更加严重的饥饿，并以普遍征集的方式使乡间人民承担沉重的战争负担。

巴黎人具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心，本来是可以首先感到失败的来临的。而且，巴黎的爱国情绪最为奋发。巴黎的伟大和力量直接取决于帝国的伟大和力量。国民公会的极左派“山岳党”的成员创造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说法，而“爱国人士”这个名词就立刻具有了激进革命党人的含义。

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边疆的农民当然希望避免外国的入侵，他们此别人更容易直接受到外国的胜利所带来的恢复封建奴役的威胁。因此他们像巴黎人一样地洋溢着爱国热忱。亚尔萨斯人尤其如此。那些远离边疆因而不受外敌威胁的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这些农民并没有理解战争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感到战争的负担，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负担是弑君渎神的巴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像拉凡德、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些地区，只要它们能够得到必要的领导，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把反对巴黎的行动推进到实行公开叛乱的地步。领导人员有时是由反革命的贵族提供的。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曾结合为吉伦特派，一度策划相类

的地方叛乱来反对巴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金融家也和农民一起同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发生矛盾。事实上这种对立甚至格外显着，其后果也甚至格外直接。这不是工人和当时还没有起很大作用的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即使在革命以后，圣西门都把工业资本家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金融和商业资本；对高利贷者、投机商人、行商和贩卖商人的矛盾。这些人本身并不造成粮食的匮乏，但是他们乘机利用这个灾难，增加紧张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多所论述。近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怕的经验。

在这困苦艰难的时期，物价高涨所造成的投机活动使人十分感到愤慨。可以与此并列的，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军需品承包商以及地产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国民公会曾经没收了教会的地产——也许占法国地产的三分之一。

此外，那些逃出法国以便从外部来反对革命的贵族侨民也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他们的土地也被没收了。但是所有这些庞大的地产并未保留在政府手里，也没有分给贫苦的农民，而是出卖了。首先，这是财政状况虚弱的结果，而那种状况是曾经终于促成革命的爆发的。但是革命并没有使财政状况有所好转，相反地，由于农民不再缴纳捐税，财政格外枯竭了。那些靠政府出卖充公的地产从中渔利的人们，往往以低价买进几片土地，其目的只在于把它们拼在一起，再分成小块以高价出售。政府的财政困难并未因此得到显着的缓和，但地产的投机者却左右逢源，利市百倍。

迫于需要，政府除发行革命纸币外别无他法。纸币的发行不久就开始达到巨大的规模。这样就产生了物价高涨的新的原因，以及汇兑和物价的剧烈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情况又为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利用，作为自己的大好财源。

这样，就从旧的封建制度所有制的废墟中间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随着无产阶级的日益强大而同普遍的贫困一道发展起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如果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仅仅拥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影响经济规律的作用的。然而巴黎的无产阶级挨饿了。

他们没有仔细研究，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办到的和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掌握了政权，决定尽量加以利用，以便达到资产阶级中间的知识分子保证他们能够享受的那种平等、博爱和普遍繁荣的理想境界。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他们就企图依靠强制手段来改变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种强制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使我们够受的了，即：高涨的物价以及大体上同我们的战时借款和类似措施相一致的强迫购买的公债。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的生产分散、统计资料缺乏、中央权力与各地方的关系的失调等现象，所有上述的措施都像今天一样丝毫不能减轻困苦的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它经济处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无产阶级中间的统治者们在绝望之余便越来越仰仗向外的方法，即仰仗血腥的恐吓手段和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失败

巴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统治了整个法国。可是他们很当心地不去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力，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公社”作为他们的口号。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代表整个帝国的国民公会，帝国才能团结起来和加以治理。因此他们避免干预国民公会的召集。他们不是不要议会，甚至也不是反对议会，而是通过议会来维持他们的权力。

列宁也一定有过同样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很难看出为什么他要召集制宪会议，而不是让人投票表决。可是公社比他来得幸运；因为它懂得怎样利用这个重要的工具，而列宁在第一天就很不高兴地把它抛开了。

当然，同公社联合起来的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只是少数派，但多数派却并不是由性格坚强、意志坚决的政治家组成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摇摆不定、迟疑不决的。他们让自己受巴黎环境的影响；即使环境的影响还不足以使他们同“山岳派”表示一致的态度，那也足够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使他们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投票表决的。

利用这些软体动物，利用这个“沼泽派”’“山岳派”得以在国民公会中占据多数。

但紧张的局面往往要求采取迅速的对策，在这种时候，国民公会的立法活动就不是经常能够令人满意的了。即使法律都不是能够很有效地应付社会的要求和需要的。每一项暴虐的法律，不论它多么严厉，只要它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使那些受它压迫的人略施小技就有机会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是限制了本身的活动范围。这种压迫的政策既以与现存的关系密切相连因而无法根除的现象为目标，就不得不迟早从它本身所制定的法律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借助于不受法律拘束的压迫，最后走上独裁的道路。

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独裁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这是一种政体，不仅是一种状态。它代表着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仅由一人来实施，或者仅由一个知道怎样不按任何正式手续行事的或愿意单单归一人领导的人数极为有限的集团来实施。为了使合作有所保证，每一个人的集团需要一些具体的规章、一个管理机构等等——换句话说，它已经受法律的约束了。

作为一种政体的那种类型的独裁在于个人独裁。阶级专政根本是胡扯。没有法律和规章的阶级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对付投机商人、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措施毫无希望地失败了，无产阶级分子就求助于一种专政。

早在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公会就必须组织一个“公共安全和一般防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很少，逐渐取得了绝对的独裁权。起初这个委员会有二十五个委员，后来减为九个。所有的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它控制部长和将军，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员。它派出具有无限权力的委员，能够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必须由各部部长无条件地加

以实行。它固然要对国民公会负责，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那个团体确实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面前发抖的。当时至少曾对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加了一些限制；因为按照规定，委员会应每月改选一次，并无权控制国库。不久，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变成“山岳派”的独占的机构。但是，这个团体的专断的命令愈是增多，他们中间的一个唯一的人物、即罗伯斯此尔的独裁权力也愈大。

作为独裁的补充工具，又成立了两个机构，(1)一个叫做治安委员会的公安委员会；(2)临时革命法庭，负责审判有关反革命活动以及损害祖国的自由、平等和神圣的一切案件。

无论是谁，只要被一个“爱国者”怀疑和告发，就足以被判处死刑，并且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

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对于恐怖时代的组织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发现一个以其自身的生命使巴黎活跃起来的不屈不挠的党派、即雅各宾党人的党派。”

“巴黎已经被分割成称为‘区’的一些居民集团，这个城市表明了雅各宾党中流行的观念和思想。”

“各‘区’的中心是公社，它把这些观念和思想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委员们在国务活动的所有各个部门——在国家行政中、在官吏的遴选中、在军队中，以及通过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在共和国的各地，把生命注入这些法律。”

“‘治安委员会’的任务是揭露一切不良的和讨厌的分子。”

“临时革命法庭立即惩罚他们。”

“革命的机器就是如此。”[2]

这架可怕的机器是被开足马力的。

人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打垮走私者、勒索者和投机商人，尤其是如果把这些人都送上断头台的话。

但是经济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激励人们相信，在任何种类的体力劳动中存在着金矿。至少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如果谁手头有钱，有很多的钱，他就此以前任何时候更变成最悲惨的境遇的牺牲者。恐怖统治对于捞钱的事并不是畏缩不前的，不过它竭力用各种偷偷摸摸的方法攫取它所垂涎的东西。这祥，以行贿受赂的形式产生了自肥和贪污的新的来源。

被人发觉的危险愈大，那些人“想要”适当地拿出一部分的赃款来收买他们罪行的揭发者的倾向就愈加强烈。处境愈是困难，革命政府各个机关想从装聋作哑的应付办法中获得好处的欲望就愈大。

因此，尽管断头台忙得不可开交，新的财产却正在积累起来，另一批资本家代替被处死的资本家成长起来；而饥饿和饥荒也并没有减轻。

这些新的资本家是直接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家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证

明自己和上述那些人都是最不顾死活的和最狡猾的，但决不能算是属于性格最刚强的一类。革命家中间最优秀的人士、即最大公无私的和廉洁的人们，那时正困在边疆和内战的不断的斗争中。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由于优秀成员的牺牲以及其中属于冒险者一类的最歹毒、最冷酷的人的出现，从两方面遭到削弱。它在两方面丧失了它的最精干的成员。其余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淡和气馁了。革命已经不断地进行了四个年头；它曾给农民和金融家带来特权甚至财富；但对于以充分的自我牺牲精神勇气百倍地斗争的、终于能够把法国的权力统一在他们手中的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它甚至没有解除他们的饥饿；相反地，它倒增加了他们饥饿的程度。连嗜血的恐怖统治者的生活也并不过得好些。事实上它能从政治方面得到什么呢？他们中间开始感到疑虑、猜忌和疲劳了。

不久就开始发现，巴黎公社的统治势力有向他们提出的名目繁多的要求需要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各个“区”的势力在于所有的公民都经常积极地参加它们的工作。而且，这些区都在不断地开会，并且它们自己都必须解决一切与行政和政治活动有关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变成不可能了；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必须在劳动中有所生产。否则他们将怎样生活呢？由于干着可能随时间断的临时工作，他们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只要革命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只要他们希望从革命的政策中获得经济的利益，他们总是竭力想法满足于自己的处境。他们越是疑窦丛生，他们就越是想从生产劳动中而不是从政治中求得救助。他们越来越愿意让政府各部门接二连三地落入各区的手里。他们让这些区任命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吏，因而开始逐渐推行以后就要产生的帝国的官僚主义集权。同时，各区以某种形式获有薪给的一帆风顺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立刻在人数上此其余的人为多，这单纯是因为他们是有闲的人，能够找到开会的时间，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的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出席会议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当时存在着前者在数量上超过后者的危险。

从一七九三年九月九日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各区革命活动衰退的迹象，这个决议限定每星期开会两次，并规定每开会一次给予那些必须为生活而工作的成员每人两个法郎的津贴。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出席会议的人数继续减少的现象。

除此以外，还发生了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关系的显着变化。在革命上升的时期，正是群众推动了领袖，使他们精神奋发，对胜利满怀信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民众的运动有成功的希望，上述的关系就是群众与领袖之间的正常的关系。每逢革命向前发展，领袖总此群众表现出更多的迟疑不决的心情；因为他们此群众更善于估计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更清楚地看到必然要遭遇的困难。

但这时领袖的处境是：如果他们想要雉持自己的地位，不致遭到彻底的复灭，他们就需要使群众重新奋发起来。因为群众快要精疲力竭，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和失望。所以领袖就得激励人民，唤起并鼓舞他们。这种情况在任何群众运动中总是表示：内在的力量不足，那个运动还没有获得这种力量，或者就是这种力量已经丧失。

为了激励人民，当权的政府就必须假装有力量的样子；它不得不使他们陶醉，从而使他

们忘记还需取得社会的和经济的胜利。达到这个效果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煽起人们的嗜血的欲念。所以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要继续实行恐怖手段，并且确实还要加强这种手段和使它更为有效的缘故。最后，当权人物感到他们脚底下的基础正在动摇，这种感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神经过敏也显然有助于产生同样的结果。由于接着萌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人们不但格外憎恨那些享有阶级特权的分子，而且也憎恨他们自己一派的成员，因为这些人尽管在次要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却和阶级特权分子抱有同样的一般原则。这样，当权人物日益产生误解，觉得每一个错误和每一个失着最后都会导致毁灭。

一场革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可能做出的荒唐行为的妨碍，这就表明这场革命是在蒸蒸日上的阶段。相反地，在一个衰落的阶段，革命可能会感到最轻微的错误的可怕影响。

革命领袖们的地位愈不牢靠，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吵就愈加激烈，从而每一集团似乎更有必要镇压其它集团以挽救革命。

在“山岳派”的成员中间，一开头就存在着“信神者”(如果不是实际上见诸行动的“教会信徒”的话)与无神论者之间、偏狭的清教徒与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之间、轻率的人与深谋远虑的人之间的显着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谐无间地进行合作。当这些不同的集团开始互相猛烈地攻击，甚至使用“恐怖统治”作为彼此镇压的工具时，这就已经透露了革命衰落的迹象。罗伯斯此尔派把阿伯尔派当作“极端革命者”，把丹东派当作“过分温和的”和“堕落的”分子拖到革命法庭受审，终于使他们在断头台上(一七九四年三月)分享了他们在几个月前为吉伦特派准备的同样的归宿，这时，革命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这些恐怖的措施已经显出革命瓦解的征兆；它们促使巴黎公社的群众分裂，从而把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的追随者变成革命政府的仇敌，这就进一步造成了革命的崩溃。与此同时，由于群众日益冷淡，政府不得不撤销在此以前一直由各区担任的种种职务，把它们交给政府官吏。

警察机关、特别是政治警察机关落进了两个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央机构的手里，它们是国民公会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警察机关变成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力量无限的工具，同时它也从各区的一个充分公开地执行任务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秘密性的机关。秘密警察机关这样就成为超越政府其他一切机构的一种无形的权力。

但是，领袖们想用恐怖手段来挽救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见效。他们脚底下的土地开始动摇了。他们只得背城借一地扩大恐怖组织和警察权力。但唯一的结果是：由于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危险，他们就彼此团结起来拚命打算抵抗反对；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统治者已经找不到任何拥护他们的人了。

克鲁泡特金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热烈赞扬者，因而他决不愿意反对那个制度，但他曾出色地描述了恐怖主义所不得不采取的致命的途径。在他论法国革命一书的标题为《恐怖主义》的第六十七章里，他作了如下的评述：“最阴暗的一面(撇开对外的战争不谈)是外省、特别是南方的态度。国民公会的地方雅各宾派和代表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反革命领袖以

及对他们所领导和组织的人们进行的大屠杀，已经产生了这样深刻的仇恨，以致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惨酷战争的问题。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不论在地区或巴黎，除了借助于最极端的报复手段以外，谁也提供不出任何更有益的意见。”

他引证一些事件来证明他的论述，接着指出罗伯斯此尔怎样觉得非把恐怖主义推进到极端不可。路易．勃朗相信罗伯斯此尔本人希望摆脱恐怖主义的方式，因为他预先看到并深切地感到它的种种有害的后果。但他除用最严酷的恐怖手段来对付他自己队伍里的誓必求助于恐怖主义的人们，没有别的办法使他们就范。路易．勃朗说；“罗伯斯比尔要使那些曾经弄得全世界人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发抖。他想出了用他们自己的战斧砍翻他们、用恐怖主义本身来粉碎恐怖主义这种大胆的计划。”[3]

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出于罗伯斯比尔的本心，这是一个可以议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强迫通过了牧月二十二日(一七九四年六月十日)的法令，这个法令完全排除了给予政治嫌疑犯的最后一点点的法律保障。在革命法庭上，这种嫌疑犯的辩护人被取消了，诉讼程序只凭“人类公正的理智”的命令进行。法庭的裁决取决于“法官的良心”和他的“调解的能力”，不论其性质和程度如何。

早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罗伯斯此尔就曾说过：“他们正在企图用强辞夺理的诡辩来支配革命。背叛共和国的案件仿佛像是私人间的案件那样进行审判。暴政肆虐，而自由反为其作辩护。阴谋分子自己所起草的刑法，乃是他们自己被据以判罪的法则。”

当时唯一可以认可的惩罚是死刑。它甚至可以施之于那些“蓄意在人民中间制造纠纷或混乱而曾散布谣言的人们，以及旨在破坏精神状态或企图毒害公共道德的人们”。采用这种手段，任何政府都能立刻使反对派噤若寒蝉。克鲁泡特金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颁布这项法令，只能意味着宣告革命政府的破产。因此牧月二十二日这项法令的效果是使反革命在六星期的时期内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o”

不久，根据这项法令，大约有五十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于是，到处都称之为罗伯斯比尔法令的这项新法令便立刻开始实施。它使恐怖统治一下子成为人们咬牙切齿地憎恨的对象。”

接着又有一百五十名嫌疑犯大批受审，他们被分成三起立即正法。

“不必再详细叙述这些执行死刑的情况了，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是：从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设立革命法庭之时起，到一七九四年牧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止，即在十四个月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已经发布命令处死了二千六百零七人。但是自从颁布新法令以后，从牧月二十二日到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仅在四十六天的期间，这同一个革命法庭就处死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巴黎的人民看到五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才能逐日出清的运送被判处死刑的人到断头台上去的所有那些囚车，开始吓得发抖。不久就很难找到足够的基地来掩埋死人了；因为每逢在巴黎的工人区开辟新的墓地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强烈的抗议。”

巴黎的工人居民这时都转而同情受害者；其所以格外表示同情，是由于富人已经逃走或

者避居在法国的什么地方，从而使穷人人受断头台的残害。事实上，在路易．勃朗无法证明其身分的二千七百五十名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们中间，只有六百五十名是属于此较富裕的阶级的。甚至有人说，公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是保王党，是巴茨的代理人，他为了使共和国遭人唾骂才拚命煽动执行死刑的。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这种新的大规模屠杀都加速了雅各宾政权的崩溃。

整个社会都感到自己面临罗伯斯比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极端激进派”、“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暴力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罗伯斯此尔的政权在那些受他威胁的人刚要张牙露齿的时候就垮台了。他在热月九日对人民发出的呼吁遭到了冷遇。他失败了。同时巴黎公社对它已经行使好几年的权力丧失了最后的明白的要求权利。法国革命因而回复到当时的经济条件所赞成的基础之上，即回复到资产阶级的无上权力上面。

［1］ 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第一卷，第 174 一 179 页。克鲁泡特金按照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已经给予革命时期公社的历史以特殊的意义。除一些专著作而外，他的几本书提供了对这段历史深入研究的资料。结果，他对当时的议会活动情况就阐述得没有这样出色。

［2］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布鲁塞尔 1856 年版、第二卷，第 519 页。

［3］ 路易．勃朋：《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 748 页。

第五章　恐怖统治的传统

罗伯斯比尔的垮台标志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失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崩溃，是因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抛弃了代表他们的一伙人并不愿再为之斗争这一事实而产生的。的确，当可怕的屠杀终于结束时，他们如释重负地畅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可悲的结局不久就被人遗忘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仅在巴黎——的记忆中仍旧根深柢固地存在着的，是对那伟大而光辉的时代的怀念，那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起义控制了国民公会，并通过国民公会控制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本身。法国那时能够睥睨整个欧洲，甚至使它屈服，至少暂时能够如此。

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革命分子在拿破仑黩武政治的控制下、特别是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在“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的统治下日子过得愈悲惨，这些革命分子就愈加怀念那些伟大的传统。

现在很少有人是为了任何科学的目的和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历史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尽力发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以便使它同这一发展过程中整个一系列的相互关系无可辩驳地相适合；或者换句话说，以便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和事物，获得比较确实的知识和比较坚实的基础。

每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总抱有某种十分实际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哲学知识的冲动的结果。像几何学这样抽象的一门学问，单凭它的名称也可从中找到上述这个论点的证据，因为它不外乎是指测量土地的方法。

同样地，当初历史的出发点也纯粹是以应用为目的的，即颂扬人们的祖先，以便激励新生的一代去模仿他们。既然它主要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绝对忠于事实。他们动辄喜欢采用夸张的手法，以便加强效果，同时也敢故意作一些虚构的描述。历史的伪造有着同历史著作本身一样久远的来历。

大家都知道，这种记录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已经沿用到今天。人们认为这是强烈的爱国情绪的表现——远远超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才艺。

历史著作还另外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它是一种通过过去的习惯、契约或条约来为若干个别国家或一个国家内各个地区、部族或家庭确定其应得权利的手段。这种历史的解释给予伪造者以丰富的资料。于是天主教以及教皇和个别主教、修道会和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就根据伪造的文件而被确定了下来。

自从读书写字不再限于少数特定的集团以来，假文件的伪造已经逐渐不流行了。但是，历史学总是充分懂得怎样随意提出确实的证据来支持对于任何合法权利的每一项历史要求这一点，已经由这样的手法使我们看得很多，这种手法是近几年来每一交战国为了符合它的愿望和欲求而提出其种种历史权利的“科学”证据时经常采用的。

虽然如此，可以从历史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利益，却不在于因怀念祖先的丰功伟绩而产生的兴奋和热情，也不在于确定对某些权利的要求，而是在于增加那些希望从过去的经验中

获得利益的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增加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一方面，个人由于从历史上学到一些东西而得以增加他的智力。这就是说，他考察他的前辈的种种成功和失败，企图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他本来可以做什么事或者本来可以不做什么事。特别在军事问题上，从历史得来的知识一向有巨大的实际效用。从来没有一个军事统帅不是涉猎过战史并从他的前辈获得教益的。

有关政治问题的知识就此较难以从研究历史得来。在政治问题上，需要研讨的群众比在战争方面、特别是在古代的战争方面人数要多得多。这些群众并不是一个全能的领袖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的个性，不是容易应付的。最后，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处理的关系比在军事问题方面头绪多得多，并且格外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在所包含的关系比较单纯、比较容易通盘考察的军事问题上，如果向历史汲取经验的结果只是愚蠢地模仿过去，而不是把那些从研究历史得来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有的放矢地应用到具体问题上，那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政治方面，各个国家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存在着大得多的差别，因而格外不容易把它们看出来。所以，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过去的事件，直接应用到仅与过去事件表面相似的局势上去，往往是弊多利少，并在谋求了解真实事态和当前具体需要时只会模糊视线而不是使人看得更清楚。

因此在政治方面所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简直不懂得该怎样实实在在地汲取经验。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即使在他们确实用功探求历史知识时，所关心的决不是什么“汲取经验”，而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开始考察人们研究历史以增加其势力和实力的第二种方法。

每一个当代的阶级或党派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类同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也像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有产者与无产者，贵族与平民、君主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种种斗争。过去的这些阶级和党派当然是受那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条件的支配的；它们的内容往往完全不同于较后时期的相应的现象。但是在政治方面，今天的事件是用过去相类的事件、用它们的成功和失败来衡量和此较的。为了在某一方面进行宣传，如果有人能够引证一个过去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件，那是总会增加他的力量的。如果有人能够指出相反的一面，证明在哪一点上一个相反的行动已经使他的前辈遭到毁灭，那也是同样会增加他的宣传的效果的。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研究历史的十分浓厚的兴趣，但那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正的兴趣。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伪造历史的事例。各党各派的作家们自然竭力想把他们的领袖放在有利的地位，而把他们的敌手尽可能放在不利的地位。在引起人们伪造历史的许多实际需要的包围中，只有那些为真正想取得经验的欲望所鼓舞的人才没有伪造的倾向。这种欲望促使人们不但力求看到前辈的成功，而且还要竭力了解他们的失败，并对他们和他们的行动进行严格的批判分析。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那种趋向于纯粹科学的冲动的转变，其目的在于了解正确的事实，单纯出于满足因果关系的欲望来考察历史。

导致著述历史的其它一切实际的需要，扩大了那种使科学性降低地位的趋向，直到它仅仅变成一种传说的捏造。今天，幸而相反一方面的批评家能够经常揭露这种欺骗的手法。这

种做法已经不能再像从前只在戒严状态下或检查制度下才核对事实的时候那样简单地进行了。但即使在民众教育程度极高、出版事业享有无限自由的今天，还不乏对历史的片面的阐释。

自然，不应当认为作家总是有意识地想使读者误入迷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倒是历史作家由于他自己的党派狂热和党派褊狭观念而迷失了方向，因为这些东西通常使他看不出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种情况格外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赖以补充历史知识的资料往往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结果，同时因为社会关系总是异常复杂，甚至最公正的探究者也往往感到很难理出头绪，必须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真相如何？”

利沙加勒在其《巴黎公社史》的序言中说得很对：“凡是有意无意地根据‘历史空想’向人民提供虚假的革命历史而欺骗他们的人，正像为航海者画出错误的航线图的地理学家一样，自己招来惩罚。”

然而我知道我党有一些同志，一些绝对诚实的和值得尊敬的同志，他们认为向人民提供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的“历史空想”来哄骗他们，乃是对革命的神圣义务。

另一方面，在急骤的暴风雨中，即使是最谨慎的历史家要在地图上——标出沿途所经过的所有危险的暗礁，也是多么困难!革命使人们热情奔放并在运动中作生死的搏斗，自然此其它一切历史事件更容易受党派思想和阐释的支配。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最激烈反对的，正就是实行恐怖统治、代表那次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和最热烈的表现的巴黎公社。每逢反革命分子要想表明那次革命的特征并加以攻击时，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向这个机构。但革命家却认为为巴黎公社作辩护乃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不赞成把恐怖统治看作当时革命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只是属于过去而在将来不应重演的形式。他们不赞成人们关于那些对组织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解释。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只能颂扬而不能谴责那个制度，认为“恐怖”是解放被奴役的阶级的一种可怕的但必要的手段。

甚至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年所拟定的计划都还以革命恐怖主义的胜利力量为基础，虽然他那时已经批判了一七九三年的传统。

在《新莱茵报》上，他一再赞扬恐怖主义。他在有一期(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报上发表了下列关于匈牙利人起义的言论，而对于这次起义的革命意义，他是估计过高的：

“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1]

在此以前，在同一刊物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日的一期上，马克思关于维也纳事件写进：“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

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战败者罪该万死![2]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3]

这个办法没有拿来作实际试验。但我们在革命者中间发现一种日益滋长的内心矛盾。如果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们拥护恐怖手段，他们的态度就与我们以后会知道的从今天环境中产生的他们日益浓厚的人道主义本能相抵触，就与他们不愿作出使人痛苦的行为和甚至杀人的心理相抵触。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比历史书本里过时的恐怖主义理论更受人重视。

关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者，波尔纳在其巴黎通讯的第六封信中写道：“他们很快就得胜了，但他们对敌人宽恕得还要快。遭受了如此重大损失的人民所实行的报复多么温和，他们把一切又忘记得多么快!只有在战场上的公开搏斗中，他们才使敌方受到创伤。他们根本没有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根本没有追捕逃亡者，根本没有搜寻逃匿者，也根本没有折磨嫌疑犯。一个民族的态度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革命者的气度像他们在——八三〇年那样豁达。甚至在同一年的可怕的六月斗争里，战斗的工人都表现了最高尚的英雄气概和最坚韧不拔的毅力，一点也没有嗜血残忍的形迹。残忍手段是留给他们的战胜者用最可怕的方式来发展的。不但是那些听了捏造出来的起义者的暴行而万分愤慨的士兵，甚至是知识分子都参加这个复仇运动。医师们拒绝为受伤的革命者包扎伤口。

马克思在他登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论六月战斗的著名文章中捉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一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4]

正是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愤怒，促使马克思写了上面所引述的相信恐怖主义的声明。

当巴黎的工人们在一八七一年压倒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政治权力时，由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斗所产生的极端严酷的情况在那些工人中间发生了更多的影响。他们有不少人曾经亲自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斗争。人们也许已经料到，复仇的日子、马克思预言的恐怖的日子现在就要来到了。

但他本人在他论述公社的文章中说道(《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

“从三月十八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些暴行。”[5]

这里我们发现一种对于恐怖主义的断然摒弃，而恐怖主义则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的“上等阶级”的革命的一个特征。

不久以前，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忠于马克思的，因为他的革命热情肯定会把他引向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这一点的明证，我引述了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恐怖行径的声明。

我们现在看到，我所犯的不忠于马克思的罪行早在一八七一年就由他本人完成了。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声明之间，已经插进了二十年的最奋发、最紧张的精神活动，这个活动的结

果就是写出了《资本论》。

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以马克思的见解为依据，他就没有权利抱住马克思的对于一八四八年的看法不放，而抹煞他对一八七一年的看法。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也对恐怖主义没有什么热情。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上说：

“所谓‘恐怖统治’，我们理解为那些鼓吹恫吓残暴的人的统治；恰恰相反，这是自己受到惊恐的人们的统治。恐怖——这多半体现着那些自己怀有恐惧因而需要安下心来的人们所犯的毫无用处的暴行。我相信，其所以产生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应当归咎于冒充爱国者的过分性急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把恐怖手段当作家常便饭的暴徒。”[6]

当马克思以明显的满意语气，指出第二巴黎公社始终没有干那种作为第一巴黎公社突出现象的暴行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巴黎所发生的强暴性质的事件，不应当由它负责。纵然如此，我们也不应当认为恐怖主义的思想在第二巴黎公社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它为那个机构的全体成员所摒弃。事实决非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比较一下。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往往指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是自己的雏型，并且认为它具体地说明了自己一切理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第三版的序言里也曾宣称巴黎公社象征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比较仔细地研讨一下这种专政并了解它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1]马克思：《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3 页。——译者

[2]原文用黑体大字刊出。

[3]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43 页。——译者

[4]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3 页。——译者

[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8 页。

[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35 页 o

第六章　第二巴黎公社

公社的起源

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样，是战争和军事失败的结果，并且必须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支持。除此以外，二者就没有办法再比拟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德意志黩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世界霸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拿破仑失败和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在德国人开始提出并吞亚尔萨斯一洛林的要求以后，法国激进派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第三共和国抵抗德国联合起来的君主们的这场斗争中，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国抵抗欧洲同盟君主国的斗争的局面似乎要重新出现了。那个早年的传统又发挥了作用，巴黎的无产阶级又组织了最好战的队伍，他们十分坚决果断地从事战争，以拯救浑然一体的共和国。

同时，一八七〇年的农民也不再像一七九三年的农民那样。一八七〇年的农民憎恨巴黎和它的无上权力。然而，他们相信应当击退共同的敌人，因为后者的胜利将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并且可能会夺去他们已经为自己取得的教会的和其它方面的财产。另一方面，一八七〇年的农民却从普鲁士人的胜利中产生不出相类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教会的问题是胜过一切的，因此亚尔萨斯一洛林的丧失同战争的负担和破坏相比，似乎害处要来得少些。抛开自始至终拚命反对分离的亚尔萨斯一洛林的人民不谈，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平的思想在农民和外省人民中间迅速地蔓延开来。这种要求和平的叫嚷代表反动派和保皇党的口号，目的在于反对巴黎的好战的激进派。像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厌倦战争的和平派比那些想要继续作战的人们占了优势。但是一八七一年的和平思想并没有帮助激进派中间最激进的分子，而是倒反帮助了反动派中间最反动的分子。

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出了一个国民议会来缔结和约。议会只有两百个共和党人，另一方面却有四百多个保皇派分子。“几乎整个省份都要求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但巴黎却要求血战。它只推选那些保证继续作战并反对以放弃领土的代价换取和平的人们。”[1]

二月十二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会，并在三月一日以五百十六票对一百十七票通过了和约。这一百十七票中间大约有一半是巴黎代表们投的票。国民议会的选举目的只是为了缔结和约。当初仅仅考虑到这一点，选举人才投他们的票的。这个议会之所以有压倒多数的反动分子，不但是由于人们不喜欢共和国，而且也由于人们不可遏制地提出和平的要求。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国民议会的委托就告一段落了。必须选出一个负责决定与宪法有关的一切

问题的新的议会来代替旧的议会。这些选票所产生的结果本来可能与波尔多的议会所产生的不同，因为共和国不像继续作战那样遭到很大的反对。然而，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选举事实上选出了绝大多数为共和党的议员。但正因为该党的“容克地主”害怕国民议会，他们格外死抱住他们的委托不放。他们自行组成了一个制宪会议，如果他们没有分成两派，他们毫无疑问是会恢复君主制度的。其中一派是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在法国始终被认为是合法王朝的那个王朝的合法拥护者；另一派是反对那个王朝的奥尔良派，他们由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已经处于世袭统治者的地位。这种分裂拯救了共和国，但它并没有使巴黎不成为两派共同仇恨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除巴黎以外没有其它强大的支柱，但这个支柱的力量在一七八九年以来已经在无数的场合下显示过了。只要巴黎没有被克服，就决无可能恢复君主制度。外省的人士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巴黎，反对不道德的、无神的、好战的共和党的巴黎，更不必说它的社会主义了。从它最初的几次开会起，国民议会就十分强烈地表示它的极端厌恶的心理。为了保卫国土已经忍受了五个多月可怕的围攻的英勇的巴黎，现在却成了它的傲慢贵族的最可耻的诽谤辱骂的对象。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自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所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派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二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像这两个运动的结果一样，是截然不同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在停止巴黎公社的活动的时候，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并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是完全要不得的。当然，由于革命传统，有了适当准备的武装起义的策略深受巴黎人的拥护。布朗基派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代表。在被围时期的各个不同时候，他们和雅各宾派性质的其它人士力图鼓吹暴动，可是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以这些企图总是成为泡影。由于十月三十一日麦茨的投降所造成的印象，他们起来要求根据社会主义而不是爱国的动机选举一个巴黎代表会议，以便用一种比第一巴黎公社在一七九二——一七九四年所表现的更为奋发的精神来继续作战。忠于政府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终于能够不流血地弥平了这次暴动，因为政府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反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举行了巴黎人民的普选。结果，拥护政府的有五十五万八千票，反对的还不到六万三千票。“不惜牺牲的活动家”在一月二十二日的处境也不见得好一些。虽然他们当时用爱国的和深得民心的赞成继续作战的投票来反抗，政府却已经宣布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革命派中间便骤然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比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动具有更凶残的效果，但它也毫不费力地被压下去了。

这些失败已经使这些活动家感到厌倦和失望，并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在三月十八日还没有准备要求举行一次新的暴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际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暴动的企图。在拿破仑垮台之后不久，在九月革命的期间，卡尔．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说道，

“我刚坐下来打算写信给你，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要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但无论如何只预备在那里耽搁一两天。他的目的是到那里去同巴黎的国际联合委员会接洽事情。这更有必要，因为目前整个‘法国支部’都涌进巴黎，以便用国际的名义做出一些蠢事。他们要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任命皮阿为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等等。我今天收到了巴黎联合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打算明天寄给你。声明中包含一项紧急的要求，要总委员会对德国人发出一个新的特别宣言。我已经打算在今天晚上提出同样的建议。请尽快地寄给我一份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亚尔萨斯一洛林的军事情报，因为这个情报对那宣言是有用的。我已经详细地答复了巴黎的联合委员会，同时也已担负起使他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2]

我曾被人谴责为仅是马克思的一个“堕落的艾庇戈尼”。当然，马克思的革命性和他当时那种火爆的脾气，要是在今天本来是会促使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的。我们从他的信里看出，在那革命的时期，他的火爆的脾气怎样使他认为他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担负起让他的同志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同时也看出，这种同样的脾气，虽然十分暴躁，却能在某些情况下实行一种革命的行动，即使那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思格斯在九月七日给马克思写了如下的复信。

“杜邦刚才走了。他今天晚上曾在这里，对于那个了不起的巴黎声明非常生气!赛拉叶正在到巴黎去并且他已同你谈过，这一事实已经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对全盘事情的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正确的，即：利用共和国已经答应给予的在法国组织政党的自由；在组织形成后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在媾和以前约束法国的国际，使其保持审慎的态度。”[3]

对于这封信，马克思在九月十日答复说：

“请告诉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4]

换句话说，在他火爆的脾气看来，更重要的乃是组织而不是行动。就在这保持谨慎的实际情况下，法国的国际当时所采取的，还简直是一种冒失行动的计划。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二月二十二日，在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委员提议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和平示威，以纪念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鉴于局势紧张，联合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认为连这种和平示威都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弗兰克尔尤其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他们暂时以全力来组织无产阶级，研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支付在围城期间已经过期的工资，以及失业问题。

在国民议会中的国际的代表马隆和托伦决定要表达人民的意志。由于弗兰克尔的建议，联合委员会议决不布置示威游行，而是让每一个个别成员自行决定他是否应参加这种示威。

这证明他们对于起义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倾向。这次起义事实上是由革命派的反对者而不是由革命派操纵的。由于战争危急，巴黎的无产阶级正在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局面在梯也尔周围的人们——贵族地主、金融家、官僚政治和军队的首脑——看求是一个很严重的危险。在签订和约以后，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解除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部分的武装。这是从那部分队伍被剥夺大炮开始的。德国的统治者已使巴黎国民自卫军拥有这些大炮，因为他们——德国人——希望这支国民自卫军“会成为使火药库着火的火花”，像波尔根正确地说过的那样。[5]

充分利用胜利，是军事科学和行动的要素。一位将军的重要任务不仅是打败敌人，而且要使打败的敌人完全解散和复员。然而，一个政治家的目的却有所不同。他必须越过胜利而更往前看，以便发现可以根据什么条件同目前的敌人将来发生关系。这两个想法在每一次十字军中都是互相对立的。当军事思想越出实际进行战争的范围而对政治发生影响时，结果是很危险的。一八六六年，俾斯麦已经精通并学会运用军事的思想方法，虽然颇费周折。但是，一八六六年的几次胜利已使普鲁士参谋本部掌握巨大的势力，这种势力由于一八七〇年的胜利而格外有所增加。俾斯麦无法反对普鲁士参谋本部。他必须屈服于军事的思想方法，结果他自己的政治理解受到了妨碍和蒙蔽。因而才有提出并吞亚尔萨斯一洛林的要求的事，这个要求使战争延长了几个月，驱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为德国现在的分裂铺平了道路。虽说如此，亚尔萨斯一洛林这时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却仍旧是一种很实在的收获。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还想屈辱那个由于反抗德国人的军队而被他们痛恨的中心——巴黎；他们在二月二十六日强迫法国答应让德军从三月一日起侵入巴黎，占据香丽榭。当巴黎人在二月二十七日知道这个消息时，升起了普遍愤怒的呼声和武装起来的号召，以便用武力击退共同的敌人。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几乎都表明态度，准备听从指挥。只有国际的成员保持缄默。不论当时举行起义以反对内部的敌人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凶多吉少，举行反对外敌的起义也同样是不幸的。他们恳求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放弃任何武装抵抗的企图，因为他们说这只会导致以前六月屠杀的重演，并把共和国埋葬在巴黎工人的血泊中。他们建议国民自卫军不要武装抵抗，而是用一条哨兵线把德同人包围起来，这样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同巴黎人民隔绝，使他们孤立起来。

中央委员会终于听从了劝告，所以德国征服者的洋洋自得的傲慢态度没有引起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巷战，应当归功于国际。几星期以后使巴黎无产阶级中间遭到血腥大屠杀的，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军队。

根据一月二十八日的巴黎投降条款，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外，市内军队的全部军用物资已经移交给胜利者；不仅他们的武器，而且还有他们的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巴黎城装备的大炮。因此，当德同人开进巴黎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步骤将胜利者根据条约归他们保管的那些大炮搬运到安全地区。政府或许是希望敌人已经接收那些大炮，从而削弱了内部敌人的力量。但是国民自卫军预有准备，及时地把这些总数有四百尊的大炮搬到巴黎市内德国人还没有能

够接近的地区。在缔结和约以后，政府最关心的事就是要重新掌握这些大炮。这样，他们便希望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队伍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好象要腰斩巴黎并使其丧失首都的地位。抱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在巴黎开会。梯也尔费了很多唇舌劝他们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举行会议，而不是在以前的会议地点波尔多。他们真打算在三月二十日在那里开会。他们预先必须有不受巴黎威胁的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决定在三月十八日没收这些大炮。梯也尔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暗中偷走这些大炮，而不是用武力公开夺取。在早晨三点钟，当整个巴黎还在睡乡的时候，几团军队占领了存放大炮而无人守卫的蒙马特尔，想要把它们搬走。但说起来十分奇怪，他们事前忘了带来必要的马匹。因此首先要把马匹弄来；与此同时，巴黎人觉得事情可疑，立刻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人群，最后迫使军队空手离开那些大炮。他们胜利了。有些士兵曾和巴黎市民生活在一起，同他们一道反对过共同的敌人，一道鄙夷过无能的将军们，这时他们同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列康特将军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结果只是使他的士卒倒戈相向，把他拘捕后用枪打死。这次枪杀的纷扰属于人们想要归咎于公社的那些恐怖暴行一类。枪毙托马将军的事件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三月十八日早晨穿了便服在人丛中记笔记时被捕，当作奸细处决的。早在二月二十八日，就有一个警察暗探在进行侦察活动时当场逮住，被扔进塞纳河中残忍地淹死了。

那些把这些行为归因于公社的人们忘记了，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公社还没有成立。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使巴黎的市民负责。这些执行死刑的事件中的每一件都是由军人实行的，与平民无关。它们是那些不大重视人命的黩武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产物。那些因为士兵枪杀他们的嗜血的将军而感到愤怒的热爱人道的人们，如果看到同样的士兵枪杀了妇孺，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他[列康特]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柢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6]

国民自卫军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目的只在于防止更多的流血。事实上，他们有时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险，终于能够把愤怒的士兵所逮捕的军官从他们手里救出来，所以被杀死的只有上述的那几个人。三月十九日，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最后提出抗议，反对以任何方式参加这种屠杀。在三月二十日公社的官方报纸上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告里有如下的声明：

“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的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

这是一个强烈的谴责，它不仅指责了原告，也指责了那些被推在国民自卫军身上的暴行。看到军队脱离政府而趋向人民，政府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对激怒了的群众让步，同他们进行谈判，或者避其锋芒而溜之大吉。梯也尔决不愿意进行谈判，他匆匆忙忙地带了他的政府逃出巴黎，赶快把所有那些还没有沾染叛变情绪的军队集结在自己的周围。他甚至

放弃了巴黎四周的要塞，包括著名的蒙瓦拉里昂要塞在内。如果巴黎人跟着梯也尔猛追，他们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这是他们的将军后来亲口说出的话。如果那样，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虽然它未必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因为条件还没有十分成熟。但是他们就可以解散国民自卫军，并按照下列计划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自卫军，即：巩固共和国，给予包括巴黎在内的各地区以自决权，以民兵代替常备军。那时公社所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个计划根据法国当时的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们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对于部长们的撤退，没有谁此巴黎人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当时没有现成的组织可以接收事务的领导权，以代替业已逃走的统治者。甚至在三月十九日早晨，巴黎都还根本没有什么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为形势所迫，只得挺身而出，组织一个没有明确纲领、没有任何明显目标的团体。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首先是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一个名叫吕叶的个人，让他掌握支配巴黎的最高指挥权。他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不合适的人，一个酒鬼，自己不知道究竞是“傻子的成分多于叛徒，还是叛徒的成分多于傻子。这个人能够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内犯下可能犯下的可怕的错误——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但是对于吕叶的这种不幸的选择，归根到底只是当时局势的一个朕兆和迹象”[7]。

直到四月三日，才决定对凡尔赛实行进攻。但在三月十九日本来可以带来胜利的因素，却在四月三日成了失败的肇因。希望士兵们仍会像在三月十八日那样倒向巴黎这方面来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碰到了他们无法克服的最顽强最坚决的反抗。从那时起他们处于与整个巴黎相对抗的防御地位，因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复灭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那时起巴黎的起义就纯粹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了。在那以前，许多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倒向无产阶级这边来，但从此以后，他们让无产阶级孤军继续作战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彼得堡起义的情况同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情况比起来，有多大的距离啊!这次俄国的革命是由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它把工人阶级和士兵组织了起来，号召他们袭击政府；当时政府设在彼得堡，像一八七一年巴黎的梯也尔一样，背后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可以断言，要不是整个帝国的局势远此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有利，即使立刻占领首都的一切权力岗位，也不会决定他们的胜利。当克伦斯基像以前梯也尔逃往凡尔赛那样逃到加茨契纳的时候，他无法指望任何农民来拥护他。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在俄国的武装起义，都倒向在首都执掌政权的革命党人。这就使他们的制度有了力量并带有永久的性质，而这是巴黎的制度所没有能够得到的。另一方面，这也就产生了巴黎公社所没有的反动的经济成分。巴黎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像俄国那样以农民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的。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它们的组织和所用的方法也同样大相悬殊。固然，巴黎公社的组织也许可以很容易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相比。固然，巴黎公社处于与俄国革命相类的地位，因为像俄国的情况一样，在它之前是一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禁止各种公开的群众政治组织，并且在它垮台之前不久还禁止了工会的组织。正如俄国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情形那样，法国工人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以后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和工会的现成组织使他们能够作团结一致的斗争。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促使马克思如此真诚地希望工人们首先利用新共和国来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从而使它有充分的准备作为一个统治权力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小小的前哨战中浪费它的力量，因为那种前哨战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决不会给与他们任何悠久的统治权。但是，既然他们是通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而不是依靠一场简单的前哨战来掌握政权的，他们就必须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情况下，谨慎小心地提供一种他们在手边找到的代替物。对于俄国工人来说，就可以在大工业的组织中找到这种代替物。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8]

工厂中的“产业军小兵”只须用他们自行选择的相类的军官来代替资本家安排在工厂里担任指挥的士官和将校，从而工厂中的组织就实际上变成了工厂工人的一个亲密的组织。这样，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中间便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可是巴黎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办法。巴黎的工业大部分是为有闲者服务的工业，而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工业。其至到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还占首要地位，这同俄国的、特别是圣彼得堡的工业的情况恰好相反。俄罗斯帝国在其工业薄弱和产业工人与农民相比人数不多的方面表现出它的经济落后性。然而，不管所存在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总带有近代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巴黎工人那时缺乏群众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得不提供其它某种代替物，而这种代替物就是国民自卫军。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所造成的结果是武装了法国各地、特别是巴黎的人民。这种武装起来的行动起了双重的作用。下层阶级、即无产阶级和中小阶级武装了起来，并自行编制作好起义的准备。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才产生出他们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用武装起义来把革命更推进一步。当时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十分舒服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又是另一种情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恰恰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武装和组织起来，以便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同时他们实行两面作战——一方面

反对那些力求恢复旧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反对那些急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向前推进的下层人民。他们的武装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斗争中的胜利者，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国民自卫军被建立成为保护有产阶级的机构，他们自行提名军官，并具有对政府而言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国民自卫军在七月君主政体下达到了举足轻重的最高峰。然而，它无法挽救那个政体，并且在一八四八年证明是很不可靠的。拿破仑第三在其政变以后，剥夺了国民自卫军的独立性、即自行选举军官的仅利，但他不敢完全把它解散。于是发生了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和迅速的败北。祖国又处于危险中，又激起了一七九三年的精神，以便通过全民的武装起义用“集体发动”的办法来继承战胜欧洲的传统。迫于这种形势，巴黎的立法机关在八月十一日根据茹尔．法夫尔的提案，宣布一项法律，规定把国民自卫军从一个公民自卫军变为全国国民都须参加的普遍自卫军。除了原来从有产阶级召来的六十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以外，又加上从那些比较贫苦的阶级召来的二百个新营，他们甚至有权提名他们自己的军官。这样，巴黎的国民白卫军的新营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规定扩大国民自卫军的整个法律确实是由于突然的惊恐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做父亲的害怕他们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决定竭尽一切力量不让这些孩子增加实力。但他们无法阻止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自己，不过，在特罗居指挥下的巴黎军事当局疏忽了本来可使国民自卫军发展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的一切办法。他们就这样地出卖了祖国，因为他们害怕巴黎工人胜过威廉的军队。在巴黎，在开始被围的时候，有十万军队，另外还有十万名警卫队。假定三十多万国民自卫军中有二十万名宜于服现役，那合起来就是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德国人在没有进入巴黎之前，对于这样的大军恐怕连一半都不容易对付，而且这支大军散布的面积非常广阔。但是从八月以后，国民自卫军有充分的时间实行整编。因此，巴黎的当局可以指挥大部分的军队来抗击德军。如果他们能够在任何一点突破包围巴黎的铁圈，德军获胜这场战争的希望就很渺茫。但是，只要国民自卫军能够立刻在军事上组织起来，上述的那一点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在这可以办到的事情面前，他们却害怕起来了。他们宁可打败仗，宁可拱手把亚尔萨斯一洛林让给敌人。这就是巴黎人心里所感到的事情，因此才产生出他们对那些出卖了法国的统治者的无比愤怒。当巴黎已经投降，整个议会已经改选，并且当议会对共和国和首都的憎恨已经使人十分生气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巴黎人知道他们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国民自卫军，属于革命方面的几个营在被围期间已经彼此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这时参加了一个问盟。因此他们被称做同盟派。二月十五，革命营的代表初次聚会，以便讨论同盟的事情。他们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提交新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担心德人入侵，情绪激昂，不能静下来仔细讨论。他们宣布休会，以便在巴士底广场参加革命的示威游行。在以后的几天，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的临时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同时为了防备恐慌，成立这种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直到三月三日，代表们参加的会议才大致成为一个确定的组织。会议决定设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巴黎的二十个区各

推代表三人组成。三人中间的二人由军团的委员会推选，第三人由军团的营长推派。三月十五日，被推选为确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举行会议，从而解散了直到这时为止始终尽其职责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既然中央委员会是从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士兵代表会议；但它是从无产阶级以及从那与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为有闲阶级的营没有参加这些协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所得的情报，在三月十八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二百六十个营中，拥护它的有二百十五个。因此，到这时为止，它是一种工人代表会议。所以人们很可以把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拟。然而，巴黎公社却决不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当政府在三月十八日逃走以后，公职的位置空着。这自然就落到中央委员会的身上，因为这是在巴黎普遍受人尊敬的唯一组织，虽然它的全体委员都不是知名人物。他们在三月十日举行会议，以便商讨应该着手进行的事项。像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况，他们这时如果把问题说成是两面兼顾的问题，也许格外中肯，但他们却把问题看作只能顾到一面，走运一条路就不能走另一条路。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就一再讨论究竟应该实行改革还是应该实行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说争取改革的斗争和争取革命的斗争应该这样来领导，使这两种运动与其说是互相排斥，还不如说是互相补充。

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其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它的步骤似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首先只采取这些步骤中的一项，即似乎是最迫切的一项。它企图表明它可以找到大多数的选民来支持巴黎起义，并且希望借此为这起义获得声势最浩大的道义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如果利用革命实力巩固大选的道义权威来反对敌人，情况就会更加有利，因为敌人本身也无疑地正在企图得到军队的支持。根据帝国至今不让巴黎人享有的普选的原则立即选出巴黎的公社行政管理机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国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崩溃后不久，巴黎的工人就从新的临时政府获得保证，答应马上要进行公社的选举。这个诺言没有兑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被围期间发生的混乱。十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两次起义是在“公社万岁”的呼声中发动的。因此有必要立刻造一份公社选民的完整名册。先是规定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后又规定在二十六日。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负责的机构，准备让位于那些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人们。在三月二十日《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公社的公告》中，给了巴黎的公民们如下的通知：

“请你们在三天之内完全自由地选出巴黎区代表的成员。那些由于必要而已经掌握政权的人，这时将把他们的临时权力移交给人民中间已经当选的人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在公社成立以后，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把它的权力给了那个团体。它甚至表示要完全解散；但公社没有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个中央委员会继续作为军事机构的一部分，在公社下面发生作用。这并不能有助于开展工作或指挥战争。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人们这一原则。这个中央委员会从

来不主张一切权力应当归于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那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归于工人营的中央委员会。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道：“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9]我们知道，在专政的名称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论如何也不懂得抑制平等的普选和镇压民主的行动的。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起义的公民激进分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如果说他们在公社中的活动突然结束，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和他们相处的一伙人不合他们的胃口，因此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事实上，有些人在候选人开会以前就悄然引退，其它的人则在公社成立的几天之内辞职。这些辞职以及选举人的某些要求，使改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就在四月十六日实行改选。公社绝大多数的委员赞成起义。而且，在公社的革命成员中间，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大多数人不过是革命者。他们多半只受一七九三年规定的原则和雅各宾派的传统的指导。其中有些人，例如德勒克吕兹和皮阿，已在一八四八年对“山岳派”表示过忠诚，也有不少人由于政治斗争而被迫脱离他们私人的职业生活，变成了职业反叛者和革命家。其中较老的成员按照过去的传统生活，对于新的发展和想法并不真感兴趣。

“其它的委员年纪较轻，多半是喜欢用武力而没有任何健全基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口头上的英雄，这时正在玩弄着起义，正如他们在几个月前曾经玩弄过战争一样——这些人话讲了一大堆，并且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他们的革命思想只以外表为限。他们是浅薄，连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也只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的支配。”[10]这是那位伟大的革命家杜布勒伊对这些人的批评。

他们大多数人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有不少人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勒克吕兹。按照他们根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很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相反地，他们却同下层阶级站在一起，并且像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那样尽力为下层阶级而奋斗。但正像“山岳派”一样，他们无法逃避属于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特权问题，并且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成分。这句话可以适用于公社中的大多数革命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他们中间有普通官吏、药剂师、投资者、律师，特别是新闻记者。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不同，他们一生有七个人，但其中布朗基本人当选后却没有能够出席会议。这表明布朗基派是多么不希望发动三月十八日的起义，因为布朗基在起义爆发前不久，为了恢复他的健康，已经离开巴黎。三月十七日，他在洛特省的菲加斯城

被捕。布朗基在有一点上是同意雅各宾派的意见的，即同意他们通过巴黎下层阶级的起义以统治巴黎、然后依靠巴黎用武力统治全部法国的努力。但是他们比雅各宾派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看出这种统治的方法不足以解放被剥削者，除非那个政府能够被用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在他们的方面，最受他们重视的经常是政治的利益而不是经济的利益。他们没有研究过经济生活，也不想获得任何有系统的经济知识。他们一再为无知作辩解，说他们想要完全不受教条的拘束，从而暴露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特征。他们不想被偏见和“学究式的讨论”弄得“手足无措”。他们说，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它马上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办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且他们认为正在准备的起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然而，他们非常不幸，因为他们周密地准备的起义总是归于失败，而一次成功的起义又是事先没有准备。此外，布朗基派的理论并不强调知识的重要，而只是满足于当前的行动。事实上，这种理论对于活动家来说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但是，尽管有这种事实，更容易接受这种理论的倒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

下面是构成当时布朗基派的成分的一览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布朗基派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会议突然为警察破获，参加会议的成员几乎全体被捕。他们一共有四十一个，每人都报了职业。这些人中包括十四个技工、四个店员、十三个学生、六个新闻记者、一个律师、一个工头、一个地主、一个独立的商人。学生的人数本来远不止这些，但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假期还没有结束，所以有许多学生不在巴黎。

这个会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布朗基主义，不但了解它的组织方法，而且了解它的目的。一八六六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布朋基派被邀出席。布朗基拒绝了，但是有两位选出的代表、即律师普罗托和雇员乌姆贝尔却去参加了。结果在布朗基的集团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因为，按照这个集团的传统，独裁的权力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他们的政党的领袖。这两种独裁是密切相关的。自从布朗基派的组织成立以来，党的领袖的命令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没有被服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是盲目服从的，甚至以后他们也还遵守这个原则。因此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以便对普罗托进行谴责；但这次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就被解散了。能够逃走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就有普罗托。我们已经说过，其余的人都被捕了。[11]

在公社的布朗基派中，又出现了律师普罗托，以及那批在十一月七日被捕的成员中的两位。他们是律师特里东和学生卫果。在其它当选的人中，有律师和医生布朗基(他先后攻读过这两门学科)、药剂师爱德、会计员费烈。在整个布朗基派中，只有一个工人，即铜匠夏尔东。在选入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中，有两个人是同布朗基派有关系的，他们是铁匠杜瓦尔和学生瓦扬。我们看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占着多大的比重。甚至在公社本身内部，雅各宾派也像布朗基派一样，不大注意经济问题。对凡尔赛的战争，维持巴黎的秩序，对教会的斗争——这些才是他们用全部精力来处理的问题。像对凡尔赛的军事斗争和对巴黎的凡尔

赛同伙的治安斗争一样，对教会的斗争也是利用暴力，通过对人身和表面现象的攻击来进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中的第三个集团是由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有十七个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主义同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按照蒲鲁东主义，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是应当避免而不应当仿效的。它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种统治的缺点及其失败的不可避免。它了解到：无产阶级单纯取得政权，并不能够改变它的社会地位；它并不能够废除无产阶级所深受其害的剥削制度。它又了解到，如果不通过政治骚动而单单通过经济上的改组，就能实现那种变革。因此，这就使得蒲鲁东主义者怀疑布朗基主义的方法，怀疑起义和恐怖手段，并且同样也反对民主制度。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级已经挫败了民主制度；但它凭自己的行动有了什么收获呢？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者活跃起来。

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蒲鲁东主义表明了，无产阶级光靠经济改造而进行的解放政策是怎样注定要失败的。今天我们所宣传的是，只要无产阶级还受资本主义的锁链的束缚，民主制度就毫无办法把这无产阶级解放出来。但如果说经济的解放必须先于政治的解放，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论是怎样的政治活动，必然同样是无用的。布朗基主义者专门把注意力放在反对现有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上面，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同样专门地想要不靠国家的任何帮助求得给予无产阶级经济自由的手段。因此，布朗基派谴责蒲鲁东派，说他们挫伤了工人阶级对于残酷剥削他们的第二帝国的斗争勇气。甚至马克思都责备蒲鲁东，说“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把他说成是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12]另一方面，蒲鲁东主义者却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对立，因为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他们还知道，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由。这一点他们比布朗基主义者懂得更多；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生的政党，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下在法国组织了真正的工党。

在六十年代各地工人运动由于一八四八年以后的反响而从沉睡中觉醒的时候，当国际工人协会正在组成的时候，同他们合在一起的正就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单凭这一点，便足以使布朗基禁止他的信徒们也依附于那个组织了。然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他们逐渐懂得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这种认识使他们格外离弃了片面的蒲鲁东主义。因为恰恰就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蒲鲁东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并且在法国产生了便于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新的情况。蒲鲁东希望发起一种不涉及政治的纯工人运动，但这种运动

只有放弃一切可能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的斗争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主张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协会、交换银行、互助保险组织织等等来解放工人阶级。但只有当巴黎的工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还很少带有大规模生产的性质的时候，以及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在工人看来还多半是提取一切利润的金融资本家而并非真正的工业承包人的时候，这些想法才有可能实现。

在国际工人协会，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了解到一些有关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运动的情况；英国工人运动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组织他们的斗争的重要性，以及蒲鲁东主义者所不愿插手的工会组织和罢工。在这一套实践之上，还产生了一种理论，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作为现代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规律，而这一理论是国际的多数人当时还没有听到过的，即使是那些知道这个理论的人也了解得并不正确。但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从精神和思想上鼓舞了国际的一切活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也被克服了。像蒲鲁东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承认经济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并认为如果这些关系不加改变，无论何种政治的变革都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但他仍然看出，要想推翻资本的统治，要想通过经济变革实行无产阶级的解放，掌握国家权力和权能是绝对必要的。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的手里所获得的性质，和蒲鲁东所说明的截然不同。据马克思看来，经济不是使政治成为多余，而是使它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斗争及其影响的性质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知道，经济条件本身形成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一项政治的效果在今天是可能得到的，明天是必然会得到的，虽然在昨天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对他来说，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于研究各种经济情况和趋势，并力图使政治目的和方法同它们相适应。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历史的方面。他们的主要努力不是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种经济观点找出可能的和必然的途径，而是要找出那种在一切条件下、在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况下都能产生预期效果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主义者已经找到正确的途径，他们就能如愿以偿地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了。当时人们相信，这些思想已被马克思主义所代替，但我们发现这些思想甚至在今天还存在着。我们又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是探究在目前经济条件下能够而且必须采取什么策略，而是从这样的论点出发，即：既然无产阶级希望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就有责任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论当时当地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们的责任不是在于审查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可行到什么程度，而是在于发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点金石、即社会主义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情况下都能提供的万应良药。今天人们相信这个问题已被在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宣布的专政所解决。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布朗基主义者想要在一次暴动中发现点金石，蒲鲁东主义者想要在交换银行中发现点金石。

甚至在今天，马克思还很少被人所了解。他要求具有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要求把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放在远为次要的地位。可是，一般说来，他和恩格斯所采取的目的、途径和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合乎逻辑的事理在他们的一边。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在法国国际

成员的心中代替了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当工人运动重新在法国兴起的时候，工会组织和罢工就立刻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第二帝国力图把这个运动引上合法的和非政治的方向，在一八六四年核准组织工会，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同一年准予实行罢工。这个国际的成员，包括蒲鲁东主义者在内，不得不参加这一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且他们既然是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好的代表，也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起来领导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他们从而不可避免地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并在这一方面卷入政治斗争，卷入反对帝国的斗争。法国国际成员的思想开头本来是带有蒲鲁东主义的性质的，这时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就越来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可是，在巴黎公社的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已经失掉旧日的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还没有取得新的立足点。他们的思想还缺乏鲜明性。虽然如此，他们却不失为不辞劳瘁地考查经济生活并深切了解当时迫切需要的公社委员。他们成为巴黎公社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利沙加勒谈起他们时说：

“人们说过，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很大的错误。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参加行政管理，光是他们的气息就使运动非同寻常；但他们很少参加实际的统治。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只给了工人二十五票，那些革命家却得了七十票。”[13]

但是，这二十五个人中的多数、即属于国际的十三人，在公社里却总共只有十七个代表。只有四个国际成员不是工人成分，并且其中有一个人、即学生瓦扬倾向于布朗基主义。在困际成员中间属于工人集团的十三个委员中，有一些是公社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是：钉书工人瓦尔兰、木匠泰斯、油漆匠马隆和珠宝匠弗兰克尔。按照他们的党的观点，他们把一切直接行动、战争的指挥以及警察力量的组织都交给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而把注意力转向和平问题、各区的行政管理以及经济改革。其中只有一个人、即五金工人杜瓦尔表现了几分好战的精神，并且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同瓦扬一样，也是倾向于布朗基主义的。他和公社的其它一些人在四月三日暴动时被俘，由维努亚将军下令枪决。所以他是巴黎公社第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他的属于国际的同志们几乎完全限于注意经济问题，在行政管理方面作出了异常卓越的成绩。例如，泰斯在邮政安排上、瓦尔兰和阿夫里阿尔在其它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就是如此，虽然当时存在着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巨大困难，即：较高的官吏逃离巴黎或至少离开他们的岗位之后，工人阶级必须一下子接管并继续进行他们所完全不熟悉的工作。除巴黎公社中的国际成员之外，巴黎国际支部还有其它的成员在工作上也相当成功，例如，铜匠卡麦利纳在四月间接管造币工作，在短短的几星期内就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个工作在公社瓦解后还继续维持着。另外还有领导关税工作的巴斯特利卡和间接税行政委员孔博尔。他们都是工人。

公社方面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把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区交给一些专门委员会，而不是交给个别的部长。劳动、生产与交换委员会也就是代表公社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委员会，共中有国际成员马隆、泰斯、杜邦(制篮匠)和阿夫里阿尔(机器匠)、日拉丹。日拉丹是唯一的一个雅各宾派，他的职业我无从查考。在财政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有三个是国际成员，他们是

油漆匠维克多．克雷芒、瓦尔兰和相当有钱的慈善家贝雷——国际成员中极少数的有产者之一。除这些人以外，还有雅各宾派列日尔，他是一位兽医，但却是一个反对帝国的老战士；另外还有出纳员茹尔德，他没有具体的倾向，是财政方面的实际首脑，有好几百万法朗必须在他的手里经过，一方面他的妻子继续在塞纳河边替人家洗衣服来维持家庭，另一方面他自己每顿饭的餐费从来没有超过一点六法郎。在这主管劳动和财政的两个委员会里，所用的方法与主管军事和治安的两个委员会大不相同。这些方法的显着的差别，门德尔松在其所写的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德文第二版)的附录里说得很清楚：

“公社的军政部门手头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们在这里看到无能、无知、浮夸、缺乏一切责任感等等。我们在这里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时期必须因此遭受损失的一切不幸的混乱局面的反映，并且我们只要从万多姆广场走到警察厅长的官署，就能看到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反映。

“当我们再走到劳动部和交换部去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出从那些组成当时警察厅参谋本部的新阿伯尔派的妄自尊大的嚣张气氛转变到另一种和平的气氛。那个名称本身就显示出蒲鲁东主义学说的影响。可是，除此以外，国际工人协会的诚实而谦虚的成员却埋头工作，抛弃一切不可能实现的希奇古怪的想法。由于他们把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并不想从命令和领章上寻求他们的权力的证据。他们构成了一个由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中产生的委员会。因此，这个部十分有效地进行它的工作，以致人们很可以说，它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从来没有着手去做任何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这个部里，社会主义者是相当集中的。它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代表了公社中实际革命的成分，但它表现了一种十分令人诧异的审慎态度。这种审慎的态度在财政部也可以看出，而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则由茹尔德在辩论当铺问题时作了说明。当时曾发布命令，凡典当的衣服、家具和用具价值在二十法郎以下者，从五月十二日起无偿地退还原主。这笔费用由国家补偿。在这次辩论过程中，阿夫里阿尔提议，应设立一种更好的工人的机构以代替这些当铺，对此茹尔德回答说：

“他们说要组织一个机构。这个建议很好。但我们必须首先要有时间把问题研究一下，方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阿夫里阿尔被委托制造大炮，他一定会要求给与较多的时间。我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14]

公社没有时间对社会问题做任何大规模的工作，而他们中间最干练的人也不愿不先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就贸然着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社会对策在今天看来似乎多半是琐细的。例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和禁止任意罚款与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议，就是如此。最重要的决议从来没有超过单纯调查研究的范围。在被围期间和三月十八日以后，巴黎有许多任务场由于业主逃亡而停止生产。根据阿夫里阿尔的建议，曾为工人阶级对这一十分严重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如下的决定：

“鉴于许多任务场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愿考虑劳动者的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

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公社兹宣布：

“召开工人工团会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目的为：”

“(1)调查被遗弃的工场，精确地说明这些工场的现况，并将工场中使用的劳动工具列一财产清单；”

“(2)编写一份报告，内容为叙述尽速使这些工场开工的实际措施，当然不是使用遗弃这些工场的潜逃者的力量，而是使用在这些工场中工作的工人生产协会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

“(3)拟订这些工人生产协会的章程草案；”

“(4)成立仲裁法庭，在上述业主归来时，应由仲裁法庭裁定将工场最后转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条件，并裁定这些生产协会应付给业主的抵偿数额。该调查委员会应向公社的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提出报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任务则是在最短期间内向公社提出符合于公社和劳动者利益的法令草案。”[15]

这个法令注明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由《公报》于四月十七日公布。

该调查委员会在五月十日和十九日举行会议。不久以后，公社即告失败。因此该实行社会主义的委员会没有作出实际的成绩。虽然如此，它的组成却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如果无产阶级政权能有更长的寿命，公社的社会主义者将被迫采取什么道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整个体系彻底加以社会主义化或立刻加以消灭，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些人却受人谴责，说他们如此怯懦地放弃了他们的工场，让工人们失业。同时，他们还纷纷受到相反的责备。

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同被围期间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相混）表示不满，说雇主们把工人留在工场，因而使他们无法履行国民自卫军成员的义务。只有那些被业主遗弃的企业才应该首先按照公社的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化；就是这些企业也须经过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化方面的另一步骤的计划与被服和军火的供应有关。这些供应尽可能通过工人生产协会在供应协议书的基础上进行，而这种协议书是要由厂长会同国民自卫军和劳动部一起拟定的。我们手头有一份由工人们呈送给公社的劳动规程草案，这个草案涉及从事修理武器的工场，并要求规定十小时工作制。这个规程包含约二十二条，刊印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公社公报》上(第628—629页)。它很好地说明了公社的社会主义工人的社会主义化的倾向。按照这个规程，工人们选举了他们在公社中的自己的工场代表、他们自己的场长以及他们的工长。由上述人员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每一工作台上的任何工人有事均得向该委员会联系。在公社方面，则规定组织一个监督委员会，按时听取各工场的工作报告，并得随时检查簿籍账册。工人们看来是十分热烈拥护公社的利益的。第十五条规定每天工作十小时，而不是像一八六六年日内瓦国际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为八小时。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如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得延长工作时间。对于加班加点，不额外付与报酬。除此以外，当

时的工资很低。厂长月薪二五〇法郎，经理二一〇法郎，工长每小时七十生丁。对于普通的工人，没有规定最低工资额，但却规定了最高的工资。他每小时的收入不得超过六十生丁。同样有意思的是，第十六条规定夜间在工场里经常要有人值班，以备公社前来提取武器。每一个工人都必须轮值夜班。这个决定的原文如下：

“在目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尽量节约公社的每一分钱,所以夜间的值班人员不付报酬。”(《公报》，第 629 页)

的确，这些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独裁”时间当作要求增加工资的凑巧的时机。在他们看来，争取幸福的共同的伟大事业理应放在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

公社的社会主义

尽管马克思脾气暴躁，他却并不认为这些小心谨慎的办法有哪一点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说：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16]

在马克思如此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即民主制度之后，他接着赞扬公社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很审慎温和的”[17]。

马克思在这同一本着作的前几页，指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须遵循的原则：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par décret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和完满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总是要达到的那种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使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自由发展。”[18]

根据“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句话，有人曾经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没有给社会运动规定确切的目标和具体的纲领。但这个说法却被这样的事实所驳倒了，即：他本人起草了从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到法国工党纲领发表时为止的若干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法国工党纲领是他同盖得和拉法格在一八八〇年共同写成的。在上面引述的那段文章中，他已经举出社会运动的目标，即：用胜利和逐步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放工人阶级，创造一种随着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来的、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人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反对马克思说，这些目标不过是一些理想，因此工人阶级还是有理想要实现的，但是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之中，马克思清楚地懂得像处于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外的一切超越的思想，例如关于永恒的正义和自由的思想。工人运动的目标是由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所规定的。实现这些目标的特殊形式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并且

事实上取决于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现成的乌托邦，而是一个保证经济关系和工人阶级本身将有长期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在政治胜利以后是不会结束的，但只有通过使“新社会因素”获得解放的办法才能继续。

早在二十年之前，马克思就规定了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并了解作为社会革命必要条件的实际形势。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以后，他由于研究了经济条件，看出革命暂时已经告一段落。这就使他同他的许多同志发生矛盾，因为那些人只认为这是对于革命的背叛。群众有革命的需要，他们也有争取革命的意愿，所以据他们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九月用下列的话作了答复：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19]

当马克思声明反对把单纯的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这一意见时，他当然并不是说意志和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没有意志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行动。如果没有意志，也就不可能有革命，并且事实上也就不可能有历史。每一个社会运动的先决条件在于社会的努力所产生的、从深切感到的需要发生的坚强意志。但是仅有意志，决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要使运动取得胜利，仅有单纯的意志和单纯的需要是不够的。我可以有永生的意志，这个意志也许在我的心里异常强烈，但它决不会使我免子死亡。所以，如果要使运动获得成功，意志必须限于可以实现的事项，需要必须设法保证它自己的满足。而且，凡是决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必须有力量克服任何可能产生的阻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辨明可能实现的事项和不可能实现的事项，作为考察实际情况的结果，同时还要指出力量的相互关系。这样，人类的各种潜在力量才能集中到当时可能实行的事项上面。这样才能避免浪费精力，才能更好地运用现有的力量和更加紧地进行工作。

然而，用这种方法辨别社会问题，却决不是容易办到的；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而且，社会的需要以及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完成实际上可以办到的事项的力量也都在发生变化。此外，社会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和复杂，并且越来越难以看透。固然，人类的智能肯定是在增长，求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但是人的智力并不总是发展得十分完备，能够看出目前存在的实际关系。它总想满足时代的要求。但是，只要实际的情况使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人类的意向就往往出于单纯的想象，以为这些情况具有符合他们心愿的非常有利的一面。人并不愿意死亡，但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认识却让他知道他非死不可。

然而人类的洞察力却已经设法在这些情况中发现我们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某种迹象。罗马帝国的无产阶级生活十分贫困。然而他们非常强烈地感到需要不工作而过一种快活的享乐生活；但实际的情况把这种生活排除出可能的范围以外。虽然如此，他们的人类的本能却使他们相信按照自己所采取的方针是可以过这种生活的。

神的观念那时是使弱者变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媒介。它要提高人数不多的、备受虐待的犹太民族的地位，使他们变成世间的主宰。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它要使手无寸铁的愤怒的农民群众战胜当时统治者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不再相信一个能起这种拯救作用的神；但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在某个时期能够向整个欧洲挑战的法国大革命的情景，使人们重又相信会产生奇迹，使他们相信革命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只需抱定决心，就能完成他们决心想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产生什么结果，那只是由于决心不够。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反击，坚决认为应当考虑实际的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当时使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它的许多日标之一，而那些目标是“社会的现状由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绝对抱有的”。不过，这些目标不像某种“现成的乌托邦”一样能够立刻实现。它们并没有形成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完整的蓝图，而只是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和发展。

所以，工人阶级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成熟，可以接受支配权的。它在任何地方都必须经过一个发展时期，才能具有这种资格。而且，它也无法选择它的执掌政权的时机。如果工人阶级接受了支配权，它决不应该简单地破坏现有的生产手段。它倒是应该想法继续利用已有的东西，按照无产阶级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展，并“使新社会的因素获得解放”’而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要求完全不同的对待方法。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候，越是清楚地了解实际的情况并加以适当的考虑，就越是容易发现什么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当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时，马克思费了很多心思认真地加以考虑。巴黎的工人肯定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才智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以及启蒙和革命运动的发源地的。然而，帝国不让他们有良好的学校制度、出版自由和政治组织，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让他们有工会组织。因此，利用共和国来更好地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竭尽全力来支持和保卫共和国，在马克思看来乃是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有一个情况使得工人们不可能在那时取得政权，那就是：全国大部分的地区事实上还是农业地区，巴黎本身的市民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世界的历史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单纯意志力。它既不能催促革命的到来，又不能推迟革命的到来。巴黎工人的起义及其在三月十八日的胜利是必然的。从此以后，人民就应当知道实际的情况允许胜利的无产阶级实现什么目的，并对这一目的集中其全部的力量。

马克思没有把废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看作巴黎公社那时的主要责任。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谈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

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千里，而应该把它粉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党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20]

这封信上没有一句话谈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宣称公社的主要责任是粉碎那时掌握在官僚军阀手中的政权。显然，如果无产阶级不在改变国家组织的同时力求实现能改善其地位的生产手段组织的政变，它就决不能够总理一切政务。如果我们把所有这种抱有这个目的的取得政权的企图称为社会主义，那么巴黎公社里当然就有社会主义存在，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大不相同的。自然，那一部分是由于缺少时间。全部的起义只持续了几个星期。这大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次起义仅限于巴黎的小工业成分。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关系，除把单独的一些工场变为生产工人的协会之外，不能有其它的作为。

把一个完整的工业部门组织成为生产和管理其专家及原料的统一体系，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如果公社获得了胜利，它也许会为自己取得全部的国家和政府机器。它也许同样会实行铁路、矿山和铁厂的国有化。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废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在邻近的德国大规模地活动着，或至少是在准备中。不过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它也会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除掉缺少时间和法国经济落后而外，对于“社会主义化”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障碍，即公社中人们的无知。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根本不注意经济问题。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在巴黎公社的时期，他们在理论方面是不足取的。这些国际成员打算放弃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们不预备走得很远，不肯有意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同时，尽管他们有许多顾虑，马克思却赞成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即首先考查经济问题然后才作任何改革，而不是匆匆地发布命令，因为这样做必然达不到目的，只会造成混乱，最后使大家泄气。即使这种审慎的态度与其说是由于理论上的眼光敏锐，还不如说是由于理论上的把握不定，他却赞成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必要的事情，即：在革命期间，我们不应当仅仅接受意志的指导，而是也要接受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的指导。杜布勒伊在其《公社》一书第 419 页上把巴黎起义的这一特点解释得特别透彻：

“抛开其他阶级的反对不谈，有组织的征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全体按日计酬的工人脑子里只有传统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同时也因为他们没有展开任何机构或工会组织，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制被排除以后，为了保证正常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些组织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靠命令来临时规定一个新的制度，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命令和法律却只能使那些已经存在的关系有所保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待时机成熟就想贸然采取行动，也许唯一的结果是使它自己的一部分最好的力量起来反对它，而不会在按日计酬的工人中间造成任何与它有利的值得重视的倾向。他们只能利用使当时存在的政治机器民主化这一借口，为总的社会准备工作铺平道路；他们就是这样办的。”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在当时的社会水平上得到了实现。这种和巴黎

公社的方法十分相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方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的方法。那并不是说，必须在今天的德国采取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这种同样的方法和这种同样的审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所造成的巨大进步由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那时，只有巴黎一地发动了一次并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得不到全国任何支持的起义；它必须屈服于与官僚政治和较高财政密切结合起来的占优势的土地均分运动。在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爆发，并且它到处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德国农业人口勉强超过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一九〇七年为 29%)，工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已经前进到在工业各部门组织职工会的地步。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无产阶级是刚从波拿巴的政权下挣脱出来的，那个政权到这时为止没有让它获得任何教育或组织的手段。德国无产阶级则在有了五十年的政治和团结经验、有了包含几百万人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后才投入这次革命的。最后，一八七一年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正要放弃一种已经证明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理论。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推断出另一种此较好的理论。德国的社会主义则能自由地运用一种理论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以及明晰的方法，而这种理论已由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是最高超最出色的理论，并且由于它大大地胜过目前流行的其它任何经济观，连资产阶级也加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就能此一八七一年发展得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并且收效也更快。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我们已经谈到公社的经济方法。但我们也已经指出，按方法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这样一种方法是找不到的。巴黎公社谈不上有什么经过仔细考虑和规划的方法。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巴黎公社里的如此许多敌对势力才会力求合作。公社的行动方法是对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明确的理论的结果。公社里的社会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也并不十分明确，并且他们只代表少数。然而他们的精神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支配着当时巴黎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多数派则不大看重经济，他们甚至自己感到此少数派更没有把握，而对于公社的政治问题，情况就有所不同。公社中掀起的对政治问题的反对意见要大得多。这种反对严重地影响了并且几乎摧毁了公社的进行工作的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总的倾向却逐渐找到了一个中间途径，这个途径是也被马克思接受了的，正如他接受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行动方法一样。我们已经知道，公社的多数派是由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所组成。当他们参加巴黎公社时，他们希望像一七九三年的情形那样能够影响法国的全部生活。他们是激进共和党和自由思想家；他们想要摧毁君主政体、教权制度以及官僚政治和常备军的全部机器；然而，除非通过一种能使巴黎的一个中心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强制力手段的国家组织，他们就不能掌握巴黎的最高指挥权。他们忘记了，依靠中央集权而开展起来的一七九三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为拿破仑和帝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希望利用独裁权力获得救助，而没有了解到，如果得不到严格训练的军队和有组

织的行政机构的支持，所谓独裁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激烈反对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的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十分苛刻地批评了他们事实上深为厌恶的一七九二年的传统。他们认识到那些导致恐怖统治的错误的想法，知道那些想法蒙骗了无产阶级，使它残忍狂暴，而丝毫不能帮助它走向自由。但是他们也同样不赞成民主制度。一八四八年的普选曾经帮助建立了反动的国民议会，并且成为帝国的主要支柱。的确，在当时法国的经济条件下，无论独裁或民主的国家政策都无法提供立即解放无产阶级的希望。社会主义者们就来探求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们对于一般发展的思想以及民主政治在扩大政治远见、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等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就立即解放当时的无产阶级这一点来说，无论独裁或民主都没有什么办法。对于这一点，蒲鲁东主义者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并不高明。由于完全缺少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政策，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着手。当时公社在某些工业区所采取的政策，给了无产阶级一种完全不同于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的国家政策所能提供的前景。民主在地方上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政府里就没有多大意义。那些猛烈抨击国家议会、即他们称之为“空谈之所”的人们，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来反对公社的空谈之所和议会。自治区的主权成为蒲鲁东主义者的理想。他们的思想已经在他们所认为的工业的地位上表现出来。而且，他们并不想要排除交换；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还存在着一些商业公司，它们的经济重要性远远地超过了一个公社的范围。为了控制这种公司，就有必要把不同的自治区合并起来。蒲鲁东主义者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放工业的无产阶级和农业的法国。但他们忘记了一件小的事情，即：把国家分为若干有主权的自治区的想法也是一种国家观念，并且要想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推翻现有的国家，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想要避免的。所以，蒲鲁东主义者所理解的公社的概念，是与雅各宾派所理解的概念直接相反的。在雅各宾派看来，巴黎公社是取得国家权力以控制全部法国的一种手段。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每一个公社的主权是结束国家权力本身的一种手段。

阿杜尔．阿尔努在其所着《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议会史》里把革命的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分歧讲得很清楚。同样的几句话，不同的议会成员往往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一派看来，巴黎公社代表着反政府原则的初次应用，代表着反对单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斗争。他们认为公社代表着自治原则、各个集团的自由联合、‘民治民享的’最直接的政体的胜利；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社形成了与旧的行动方法毫无关联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独裁观念的否定。它意味着人民自己夺取政权，从而摧毁一切存在于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的权力。抱有这种感情、思想和意志的人们代表着以后称为社会主义派或少数派的那个派别。另一方面，在其它一些人看来，巴黎公社是一七九三年旧的公社的继续。在他们的心目中，它意味着：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权力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安插新的人员来领导旧的制度从而加以彻底摧毁。他们暂时把那些新的人员武装起来，去进行一场为人民服务以抗击人民之敌的战争。

“在这权威派的人们中间，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如果说他们接受地

方自治和各派自由联合的原则，并且甚至把这原则写在他们的旗帜上面，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迫于巴黎的意志。他们仍然是旧习惯和旧思想的奴隶。当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就立刻恢复他们的旧习惯，并且肯定是抱有最善良的意愿，让自己对新的思想运用旧的方法。他们没有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总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些想靠独裁或单纯的专横来建立自由的人们，通常只会摧残他们所要拯救的东西。这一个包含着各种各类成分的派别构成了多数派，他们被称做‘革命的雅各宾派’。”

杜布勒伊在引述这些评论时说，它们只谈到两个极端的倾向。这话是对的。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这些倾向中，以发现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注意最显着的特征，仿佛那是典型的特征似的。当时存在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如果巴黎公社获得胜利，恐怕也不会能够把它克服。但巴黎公社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迫使那些互相竞争的派别想出某种新的方针。从四月三日起，公社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并且不得不放弃征服法国和加以统治的打算。这样，雅各宾派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他们不再希望通过巴黎公社实行统治，只要他们仅仅能够不让反动的法国来粉碎巴黎的新获得的权利，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不但蒲鲁东主义者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法国陷于崩溃而各个自治市都获得完整的主权这一想法也同样落了空。主张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像主张联邦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致力于同一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它对法兰西全国非常重要，甚至是法国的许多公民和政治家所要求的。这个目标就是：地方自治，它们在国家民主制度所划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限制国家官吏的权力，设立民兵求代替常备军。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格外愿意承认这个民主国家，因为，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他们在最近那几年被迫同帝国进行斗争，因而被卷入一个国家政策，并且已经开始推行夹杂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格的蒲鲁东主义。

最后的结果是确定了一项政策，如果马克思在巴黎，他自己也会承认和核准这个政策的；但他不会参加两派中间的任何一派。他是会十分孤立的。尽管如此，形势的力量以及那些认真考虑实际“局势”而不为“单纯的意志”所驱策的公社优秀人士的智慧，却终于制定了一条方针政策，这个政策看来同马克思本人的政策十分相似。门德尔松的评论（见利沙加勒着《巴黎公社史》附录，第 525 页）对于这个政策比对公社的经济措施要合适得多：“公社的创立者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创立了什么东西。”

巴黎公社在最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程序是按照两个极端之间的路线进行的。公社所遭受的极大不幸是它的缺乏组织。巴黎无产阶级当时还刚刚摆脱帝国的束缚，那种路线是它的缺乏组织、办事规程和能力的自然结果。巴黎公社从一开始起，就同凡尔赛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什么地方此在战争中更需要组织和纪律了。公社却完全缺少这两样东西。公社的各个营是由它们本身选出的军官指挥的。这样，那些军官就不受最高指挥官的节制，而是依靠那些选举他们出来的士兵。根据这种方针，就不可能组织一支真正的战斗的军队，因为这样的军队只有在禁止内部分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成。

这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所已经知道的，因为，当他们发觉自己卷入一场真正严重的战争时，他们很快便撤销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力和通过士兵选举军官的办法。当年国民自卫军的各营是否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情绪。因此，公社的实际战士的人数很少，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关饷的有士兵十六万二千人和军官六千五百人，但在四月三日以后的那些非常的日子里，上火线作战的只有两万到三万人不等。这些勇士必须承担战斗的全部可怕的重任，以抗击一支在五月下半月总数至少达十二万人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优势兵力。自上而下的分裂更助长了自下而上的分裂。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仍然与公社并存。它以前曾将它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公社。然而，它继续干预发给国民自卫军的一切命令。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库格曼的论巴黎公社的信里，认为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公社是一个错误。他没有举出他说这种话的理由，因此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这在他看来是一个错误——显然是由于战争指挥上的反应。他认为这个错误是巴黎人所造成的第二个错误。按照他的看法，第一个错误在于没有在三月十八日以后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这两个错误也许就是失败的原因。同时，十分不幸，这些从一开头就使公社的军事处境陷于绝望的基本错误，在公社召开会议以前便已经铸成了。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战争的指挥如果由中央委员会主持，一定会此由公社主持获得较好的效果。相反地，那个委员会甚至此公社更显得优柔寡断。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

可是，最糟的事情是同时并存着两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最高权力，另外还加上一个干预战争进程的第三种权力，即炮兵委员会。在三月十八日组成的炮兵委员会经常为了大炮问题同军事委员会发生争吵。军事委员会掌握着马尔菲尔德的大炮，而炮兵委员会则掌握着蒙马特尔的大炮。[21]

当时曾到处想用加强政府权力的办法来尽量缩小一般的组织。四月二十日，成立了由九个专门委员会各推代表一人组成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以代替我们已经提起过的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够排除根深柢固的弊端。念念不忘一七九三年传统的雅各宾派要求成立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如果这成为事实，就会使公社形同虚设。凡尔赛军队的不断的冒险行动，使得“留着一把十分漂亮的一八四八年式的胡子的”[22]公社委员米奥在四月二十八日要求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即成立一个统辖其它一切委员会的新的委员会。对于需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虽然这个行政部门的命名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辩。革命的雅各宾派认为，如果这个委员会称为公安委员会，这就可以使该委员会赋有一七九三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公安委员会的胜利的权力。但是这个令人想起恐怖统治的传统，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厌恶。五月一日，以三十四票对二十票通过成立这个委员会。在导致成立这个委员会的选举中，少数派的大部分人、即二十三人没有参加投票，他们作了下列的解释：

“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我们不愿让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无用的人还变成有害的人；因为我们认为，成立这个公安委员会就是抛弃三月十八日的公社革命所由产生的社会改革原

则。”

这个将使公社增加其活力的公安委员会，同时也为它的分裂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它破坏了公社。仅仅由于这个缘故，该委员会丧失了一切道义的力量，而且，那些独力担任公社的任何严肃工作的人们、即民族主义者，也敬而远之。像利沙加勒所说的，除了一个人以外，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咆哮叫嚷的家伙”。五月九日，这个没有价值的委员会宣告结束，以便选举新的委员会。少数派这次参加了选举，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这个相当可怕的名称后面，正潜伏着一种实际的独裁。但同时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致多数派铸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把少数派完全拒之于委员会之外。第二个公安委员会证明和第一个一样无能。它甚至此第一个走得更远，积极地起来反对少数派，撤掉某些少数派的职务，从而使公社丧失了一些最优秀的成员。这个举动导致了公开的破裂。五月十六日，少数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公社放弃职权而袒护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并宣布此后不再参加公社的工作，仅从事各区和国民自卫军的活动。他们在末尾说，他们希望用这个办法把公社从他们力求避免的内讧中拯救出来，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所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最后一句话带有和解的口气，这个声明似乎意味着彻底的决裂。

在处理行政工作或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少数派此多数派要干练得多，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却不是很有决断或很合理的。他们曾在五月一日拒绝参加选举以抗议第一个公安委员会的独裁。但在五月九日，他们由于提出第二个委员会的候选人而已经承认了独裁。而且，他们在十五日又决定发表公开声明,用停止在公社中的一切合作的办法来对这同一独裁提出抗议。十六日，即在他们的抗议书发表的那一天，他们屈服于他们的朋友们、即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的压力，因为那些朋友力劝他们不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破坏公社的团结；因此到了十七日，在宣言上签名的二十二个人中有十五个重新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可是多数派却并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尽管他们的成员中间包括瓦扬在内的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们作了和解的努力。带有和解性质的一项决议案被拒绝了，而他们却通过了米奥的提案。那个决定的原文是：

“公社将不再计较少数派中从声明书上撤回签名的每一个成员的态度。它谴责这个声明。”社布勒伊在论述这件事情时说，“这样，雅各宾派和联邦主义者在他们牺牲以前的最后一次战役中像势如水火的兄弟那样站在一起。”[23]

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队进入了巴黎。公社在二十二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公社的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在公社所表现的两种倾向中，各有一个纲领作为指导，而这个纲领如果实行的话，是根本行不通的，并且只会使它的门徒采取无益的行动。但尽管如此，这两个纲领互相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却为处境所迫而产生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可以实行，而且符合当时法国的需要，甚至在今天也还包含着最富成效的可能性。这个纲领是要求地方自治和解散常备军。公社的这两个基本要求对法国的福利来说，在今天像在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一样重要。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我们要谈到公安委员会，就不能不想起代表着一七九三年那个组织的基本精神的恐怖统治。对于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所产生的对立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雅各宾派从一开始就赞成把恐怖主义当作一种战斗手段，正如国际的会员从一开始就加以摒弃一样。甚至在公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它的对立就很明显。有一个委员提议废除死刑。他们对他的驳斥是："他想挽救维努亚（凡尔赛的将军)的性命。"

在国际的联合会成立以前，弗兰克尔在四月二十九日解释国际的政策时说："我们想要确立工人的仪利，而这一点只有说服和道义的力量才能办到。"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像戏剧批评家皮阿、会计员费烈、学生拉乌尔。里果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嗜血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在原则上一切雅各宾派都须拥护恐怖手段，但在实际上却很少看到这种手段的实施。很少有人能够避免那种鼓舞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全部民主政治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第二巴黎公社时期所获得的条件，也与第一公社时期产生恐怖行为的条件不同。

第二巴黎公社没有做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即按照资产阶级方针建立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公社制度；并且，它仅对大部分的居民站在它一边的巴黎行使它的权力。因此，他们就毋需用剧烈的手段求成吓他们的对手。真正危害公社的敌人不在他们的公社生活范围之内，不可能受到恐怖手段的影响。所以当时缺乏实行恐怖传统的动机。公安委员会的拉乌尔. 里果和费烈通过查封报馆和逮捕而做出的事情，与其说是模仿那种根据完全不同的方针进行的恐怖统治，还不如说是拙劣地模仿了法兰西帝国。布朗基派的学生里果在帝国统治下因不断同警察斗争而名噪一时，他是十分熟悉警察的狡猾手段的。

甚至在三月九日之前、即起义之前，劳塞就提到他说："那些认识他的人曾经和我谈起关于他的疯狂行径的一些最可惊的事情，以及他用以探明警察动向的狡猾巧妙的手段。他就是用这种手段来破坏他们的一切迫害，并使自己在事实上充当了巴黎警察厅长的角色的。"[24]

三月十八日，他奉到正式命令，充任巴黎的警察厅长。他的第一项行动是在三月十八日夜间到警察厅去就职。他的警察制度不久就遭到各方面、特别是国际会员的激烈反对。这个制度同一七九三年的原则毫无关系， 虽然他当时正在著作一部关于一七九三年公社的历史。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枪毙克列芒. 托马将军的事情算在公社的帐上。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处决是在公社存在以前发生的，并且是中央委员会所反对的。

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中只有一种是可以称为恐怖性质的，那就是逮捕人质，用压迫没有防备的人的办法去威吓敌人。拘留人质是一种绝望的做法，它很少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往往只会相反地增加那种引起这一做法的斗争的残暴性，这一点已经由经验提供了不少证明。

可是就公社来说，也很难采取别种措施，除非它愿意忍气吞声，对于凡尔赛军枪杀俘虏

的举动不加抗议。凡尔赛军枪杀俘虏的事情在四月三日以后确实是发生过好多起的。

“由于凡尔赛军枪决了俘虏普托和夏蒂昂，以及在四月三日进攻时俘获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军官社瓦尔，公社的一些委员义愤填膺，坚决主张立刻枪决若干反动分子，而这些反动分子大部分是从巴黎的教士中抓来的。其它的雅各宾派、特别是德勒克吕兹，对于敌人的这些过分的行动深表愤慨，建议公布一项关于人质的法令。当时决定要反对凡尔赛分子盲目地陷入的残暴行径。然而，根据一种默契，他们同意不把这项法令付诸实施。”[25]

所以，这项法令的制定，不是想要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想要加以拯救。另一方面，其目的是想迫使凡尔赛军的指挥官不再处决俘虏,另一方面是想使普鲁士人放弃直接报复的念头。

“人民即使在愤怒时也是高尚而正直的，”四月五日的公社公告上这样说，“……而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痛恨内战一样地痛恨流血，但是，人民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6]

事实上，公社是表现得很高尚和正直的，但它没有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办事!

公社所发布的关于人质的法令规定，凡被揭发与凡尔赛政府狈狈为奸者，立即交法院审讯，加以监禁。在二十四小时内成立法庭来审问被告，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对其作出刊决。经法庭判决的人犯不予枪毙，而是扣押作为人质。所有的战俘均应受这一法庭审讯，由法庭判决是否应予释放，或扣押作为人质。最后，法令规定，如果凡尔赛政府处死一名被俘的战士或公社的拥护者，应处决所扣押的三名人质。法令的这个最后的并且也是最可怕的规定，实际上始终是个具文，并没有实行，但是凡尔赛的军事当局在隔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却继续枪杀他们所捕获的俘虏，并且似乎完全不愿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由于这种行动，已使他们的作为人质而被扣押在巴黎的朋友们的生命遭到威胁。梯也尔不遗余力地刺激公社，要他们采取屠杀的手段。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每枪杀一个人质，只会对他自己而不会对公社有利；因为当时一般的舆论还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支配，它无动于衷地听取凡尔赛方面枪杀无数俘虏的消息，却对巴黎方面仅仅扣押人质的举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因此如果枪毙人质，那就会使舆论骚动起来。梯也尔的这种卑鄙的态度也表现在交换人质的谈判上面。

在四月五日的法令公布以后，巴黎扣押了一些人作为人质，其中有几个教士、墨西哥远征的发起人银行家热克尔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可是公社提出交换。如果凡尔赛政府释放被捕的布朗基，他们愿意开释所拘捕的一些教士，其中包括大主教达尔布阿、神甫德盖里、副主教拉加尔德，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他们十分宽厚，甚至在副主教拉加尔德矢口表示万一谈判失败誓必回到巴黎之后，允许他在四月十二日携带达尔布阿致梯也尔的亲笔信件前往凡尔赛。可是在那以前，即在四月八日，达尔布阿就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梯也尔，请求他不要再枪毙俘虏。梯也尔始终默不作声。四月十三日，巴黎的一家报纸《解放报》刊载了这封信。梯也尔因此作了答复；但他的答复是满篇谎话，因为他把关于处决俘虏的一切消息说成是一种切头彻尾的诽谤。拉加尔德转交的二封信的答复，直到四月底才收到。可是那位副主教尽管曾经宣过誓，却存着戒心，没有敢回来触犯雄狮的复仇锋芒。在这封复信中，梯也尔

拒绝释放布朗基，但安慰大主教，说是保证人质的生命没有危险。罗马教皇的使节和美国大使华施贝恩的企图实现交换俘虏的斡旋也同样没有成功。所以，当公社解体而丧失了保护上述那些人的能力的时候，那些人除拉加尔德之外还仍旧作为人质被关在马扎斯的监狱里这一事实，应当由梯也尔负责。顺便提一句，完全同他所说的关于公社残暴行为的诽谤性言论相矛盾，他说公社扣押的人质的生命没有危险，这句话是说得很对的。但他自己却尽力要推翻人质的保护力量、即公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确实使人质的生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某种背叛的行为，凡尔赛的军队得以突然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冲入巴黎，这时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正在很热闹地举行一场民众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时，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邀请听众在下星期日再来参加，并且说，“梯也尔希望在昨天进入巴黎。他没有来. 他是永远也来不成的。”就在这个时候，凡尔赛军队开进了巴黎。居民惊慌万状，公社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因此凡尔赛军队本来也许可以用迅速而果断的推进，在没有任何激烈的抵抗下占领巴黎全城。但他们进展得很慢，这就给了公社的保卫者以充分的时间，可以集结起来进行整整持续一星期的激烈的巷战，那个一星期就是著名的“可怕的五月周”。由于凡尔赛的指挥官不予宽赦，不但枪杀了所有那些在被俘时手里拿着武器的人们，甚至还枪杀了所有的嫌疑分子，这就火上加油，使人们忿恨达于极点。巴黎公社的许多历史家指出，凡尔赛军队的这种缓慢的推进结果增加了抵抗，同时也增加了牺牲的人数，从而扩大了失败的规模。

“如果军队沿着左岸的码头推进，巴黎本来是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占领的。这样它就只会遭遇蒙马特尔和梅尼蒙坦两地的海军部方面的抵抗。由于它推进缓慢，它给了对方组织力量的时间。他们所俘掳的人数超过对方实际战士八倍至十倍，他们所枪杀的人数此实际站在街垒后面的来得多，而凡尔赛军只阵亡六百名和受伤七千名。”[27]

公社方面死亡的人数超过二万人，有些人说是三万。司法部长阿贝尔将军估计为死亡一万七千人。当局所不知道的牺牲者的人数无法确定，但总数至少有三千人。

在这可怕的风暴中，渴望复仇的心理在许多情况下占了上风，这是不足为奇的。它越是丧失权力和越是不能避免失败，它就变得愈加怒不可遏。处死人质的事是在公社已经不再存在之后才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队突入巴黎；二十二日发生巷战：二十四日开了最后一枪。在这方面，虽然执行死刑是狂怒和盲目复仇心理的结果，而不是预谋行动的结果，雅各宾派和国际成员的对立却很明显。死刑的执行是由狂热的布朗基主义者拉乌尔. 里果开端的。他命令把三月十八日逮捕的一些宪兵和四月中旬捕获的一个名叫肖戴的报馆编辑在五月二十三日夜间执行枪决。肖戴曾唆使军警在一月二十二日向群众开枪，在这次骚动中，里果的一个朋友萨北亚牺牲在他的身边。二十四日，里果本人被捕枪决。与此同时，老布朗基主义者欣东要求处决六个人质，其中有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大主教达尔布阿、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和神甫德盖里。布朋基主义者费烈批准他执行。

“行刑队几乎是清一色由实际上还是孩子的青年组成的。在多数的场合，参与这些罪行的人们充其量还不过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受到城市中十分流行的不道德行为的刺激，过激的

情绪此他们的胡子还长得快，根本没有可以容纳责任感的余地。”[28]

就那些想用实践来为战争权利辩护的人而言，我们偏巧今天在德国无法作同样的评述。

在二十六日，又是那位布朗基主义者费烈决定把四十八个人质交给另一个布朋基主义者格瓦上校；这些人质大部分是教士、秘密警察以及在三月十八日向群众开枪的宪兵。他带领一伙武装人员去提取人质，这些人由于没有希望获得赦免，已经注定非死不可，所以显得非常混乱。他们在狂怒的心情支配下扑向人质，逐一把他们杀死。国际成员瓦尔兰和赛拉叶想要拯救他们，可是没有成功。他们自己都几乎遭到愤怒群众的毒手，因为这些人指责他们是和凡尔赛派一鼻孔出气的。五月二十八日，这位曾经冒了生命危险去拯救人质的瓦尔兰，由于被一个在街上把他认了出来的教士所告发，被凡尔赛军的指挥官捕获，立刻遭到枪杀。

无论在战斗期间或战斗以后，有无数的人牺牲在胜利者的嗜杀欲之下，那些对于公社的恐怖主义表示愤慨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此默不作声。相反地，当他们谈到在巴黎公社崩溃后有五、六十个人质成为某些凡尔赛派的复仇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的牺牲品时，他们却用尽一切字眼来表示他们的愤怒的谴责。

这一段关于人质问题的记述十分清楚地证明，巴黎公社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有多么大的距离。往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场内战或一次对外战争能像一八七一年的法兰西内战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一方惨无人道，另一方却确实以高尚的决心坚持了人道原则，同少数“激进分子”的嗜血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第二巴黎公社的结局和那组织一种可怕的恐怖统治的第一巴黎公社有天渊之别。

第一巴黎公社的恐怖统治在没有受到巴黎工人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彻底崩溃了。的确，对它的崩溃有些人感到松一口气，甚至有很多人额手相庆。在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当敌对双方的兵力接触时，罗伯斯此尔的党羽在发出第一枪以前就逃之天天了。另一方面，巴黎人却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地紧紧靠拢第二巴黎公社。非常激烈的巷战必须经过一个星期才能结束。巴黎公社的殊死斗争所造成的伤亡、被俘和逃脱的遭难者的人数共达十万人(据一八七一年七月的估计为九万人[29])。

第二巴黎公社被严重的对立弄得四分五裂。这一点我们从参加最后斗争的两派的不和中已经看出来。但是这两派的任何一方从来没有用恐怖手段来压迫对方。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不顾一切地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所以公社中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派系预先看到了他们有必要共同代表整个的战斗无产阶级。在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融会贯通了马克思和巴枯宁、拉萨尔和爱森拿赫派的见解。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府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那些渴望解放全人类的人们的心中。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争取在一切国家获得解放的斗争的强大影响是大部分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当时人们普遍地受到人道精神的鼓舞，这种精神使得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充满着蓬蓬勃勃的生气。

[1]路易．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巴黎版

[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36 页。

[3]同上书，第 438 页。

[4]同上书，第 441 页。

[5]佐治．波尔根：《巴黎公社史》，巴黎，1917 年，第 43 页。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9 页。

[7]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 283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5 页。

[9]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 页。——译者

[10]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 332 页。

[11]沙利．达．科斯塔：《布朗基派》，巴黎，1912 年，第 17 一 22 页。

[12]马克思：《论蒲鲁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 373 页。

[13]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二版，第 145 页。

[14]5 月 6 日的会议，5 月 7 日的《公报》，第 493 页。

[15]参阅《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68 页。——译者

[1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6 页。——译者

[17]同上书，第 67 页。——译者

[18]同上书，第 67 页。——译者

[19]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入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5 页。

[20]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摘录)(1871 年 4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24 页。

[21]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 205 页。

[22]同上书，第 273 页。

[23]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史》，第 440 页。

[24]劳塞：《在巴黎公社的统治下——日记》，来此锡，1878 年版，第 18 页。

[25]菲奥：《一八七一年的内战》，第 246 页。

[2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02 页。

[27]波尔根：《巴黎公社》，第 108 页。

[28]菲奥：《内战》，第 528 页。

[29]波尔根：《巴黎公社》，第 183 页。

第七章　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残暴与人道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在以后的几次革命中没有再度出现；从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战士们即使受到恐怖统治所树立的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却力求尽可能合乎人道——同他们的敌人在此前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五月所表现的最触目惊心的残暴行为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在整个十九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生一种逐渐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情况。现在，在二十世纪之初，革命已经在俄国和德国爆发，并且已经恣意地实行那种类似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杀戮。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倒退的现象呢？按照一般的看法，人道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假定人天然是一个邪恶的冶酷的生物，他具有猛兽的本能，常常准备去袭击他的邻人，压迫他、折磨他和杀害他。我们还相信，只有经过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即文明的进步，人才获得社会的感情，一种互助、仁爱以及憎恨残暴与屠杀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表达出来，它用“人道”一词来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品质，把它们同我们斥之为兽性的(起源子“野兽”一词)和残忍的（起源于“畜生”一词）其它特征区别开来。我们有许多人种学家也抱有洛姆布罗素[1]及其学派所采取的观点：认为重新回到人类的动物先驱的感官生活乃是他们叫做返祖现象的严正罪行。而且，即使是残忍的猛兽也照例不残害同类；我们没有理由来假定人类真正生来就是具有强烈的嗜血本能的猛兽。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动物先驱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假定，在今天的动物中间，类人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像这些动物一样，人类的祖先显然靠植物性的食物为生，偶尔补充一些小动物、毛虫、蠕虫、爬虫甚或小鸟；但他从来不为了贪图口福而杀害一个哺乳动物。任何的类人猿都不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类人猿决不对它自己的同类进行任何凶残的战争。从最初起它就并不具备为进行这种战争所必需的器官。个别的类人猿可能会抢夺卤获物或为了争夺配偶而发生格斗并受到轻伤，但这种扭打结果并不是致命的。

就人来说，一旦他的技术知识给他提供了用具以补天然器官的不足，即给他提供了贝壳和刀剑的工具与武器，上述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这样，他便获得了一个猛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他身上的发展叉使他具有猛兽的一切本能和机能。这时他能够杀死较大的动物并撕裂它们。植物性的食物因而对他丧失了重要的意义。打猎和流血变成他的日常的事情。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民族与民族间的屠杀、即战争却不能单纯用武器的发明来解释。战争的先决条件是教养上的进一步发展，即人们分别聚集为紧密的社会。

这一点至今很少被讨论过，并且我自己也一向谈得很不够，所以在这里不妨作一些说明，

虽然这样做会离题较远。毫无疑问，人起源于爱群居的动物，但他和它们不同的是他组成紧密的社会。爱群居的动物惯常过一种内部缺少团结的合群生活。这些同样的个体动物根据生活的条件、食物的供应情况、敌人的数目等等，有时组成庞大的群体。在另一个时候，它们又分成许多小群，甚至只是分成若干对，直到某种比较有利的机会又把它们聚成巨大的集体为止。一个个体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一群转到另一群。对于人来说，这是极端困难的。在这里讨论这种改变的原因，也许离题太远，但不妨作如下的简短的说明。

动物的互通消息的方法依靠它们本能地发出的自然的响声，以及包含在姿势和模仿中的交谈方法，但这种方式它们毋需彼此学习，而是生来就具有的。因此群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可以用这个方法同样清楚地表达它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为其它所有的分子所了解。

除对工具的使用以外，使人类与动物有别的是发言清晰的语言。人类所用的工具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由他自己制作的，并且必须从邻人那里学会制造工具的方法；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相互了解的媒介，这种媒介也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他的同类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并且他自己非向他们学习不可。这种沟通消息的媒介不是一开始就由全社会所共有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的。通过这种运用语言的方法，社会的团结变得更加巩固和密切，因为依靠这种方法，对于劳动的了解和协作变得比较容易和多样化。由于这些不同，人类的一些部族和群体从一开始就互相分离。因此每一个人不得不同他已经熟习其语言的那个特定的邮族或群体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同其它的部族和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他处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感到不惯和不舒服。除此以外，还产生另一种因素。语言让一些个人彼此建立关系。它也让人们把自己对于过去的回忆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它形成一个保守的因素。即使是充分发达的动物也无法辨别同类的其他动物，因此它很容易忘记它的父母和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但人类却能终身保持这些关系。他甚至能够辨别和记得他的双亲的父母、他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女等等。

一般人认为：家族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血统的声音”就是这一事实的明证。事实上，所创造的是“语言的声音”。如果没有某种关系的标志，任何家族都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组织存在下来。在动物方面，一旦幼小的动物羽毛丰满并且已经开始过独立的生活，“血统的声音”就嘎然而止了。这一事实使得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听起来格外可笑，他们企图不但把家族的关系而且甚至把民族的关系解释为“血统的声昔”的结果；例如，当日耳曼血统的奥地利人倾向于同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联合起来的冲动被说成是这种“声音”的不可思议的规律的例子时，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住在奥地利的非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待别是捷克人，此直接同德意志帝国有关的人来得多。

由于形成了家属，由于积累了比占有者寿命更长的以工具、武器和各种用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一个家庭的亲密的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在他死了以后，所有这类私有财产都归那些曾经和他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承受，从而成为直到他死亡为止始终维持这种关系的坚强理由。直系亲属的亲密程度又因另一种类的财产、即由于全家共同占有的

土地而更加有所保证。甚至动物也都愿意住在它们曾在那里长大的、可以说是感到很自在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它们熟悉食物的每一个来源、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危险的地点。然而，这种地方的范围并不是划得很窄的，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如果在附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由于某种危险，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直到他搬进他比较中意的另一个地区为止。可是在那里，他是迟早要隶属另一个部族的。

往比较亲密的人类社会中，这一点就有所不同。无论是谁，只要他来到另一个地区，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他无法了解的人们中间。原始时代的人并不利用搬到人口稀少的新的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办法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适应只有在一个较高的文化状态中才能找到，即使那种文化状态还是不完备的。另一方面，原始的人群聚在一起，力求扩大其活动范围而不利于邻近其它的人群。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旦军队的技术有了十分高度的发展，便产生了战争和同类相残。由此我们也看到，我们称之为“残忍”的品性并不是由于人类的动物先驱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发展的产物。道德的本能本身，休戚相关的感情，对于别人的同情心，急难相助的心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着它们的性质。在社会动物方面，这些本能是由同类的一切个别的分子所共有的。

但是，在人类方面，这些本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最接近的圈子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凡是在这圈子以外的人都是漠不关心的对象。他对他们没有同情心，并且往往是直接敌对的。随着相互沟通的发展，我们“个人”自己感到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的范围也扩大了。今天我们仿佛正在回到人类发展的起点；我们的社会和道德感情的范围又在开始扩展到同类的一切个人，换句话说，扩展到全人类。但是，一般说来，这还多半是我们正在十分缓慢地争取的一个理想。同时，由于分工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联系，经济的发展促使国家内部建立了一些单独的、界限分明的社会，而国家本身又接着被分裂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也就变成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例如贵族、家族、教会团体、宗派、行会等等。这些组织各自发展它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这种理想只对每一个具体组织的成员发生影响。甚至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互相倾轧。它们对于自己的狭隘集团的成员能够牢固地团结一致并表示同情，同时对其他集团却根本缺少仁爱。每一个个人可以属于若干具有不同的并且往往是对立的利益和道德原则的社会组织。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是尖锐，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就越是严重。南方各国的封建贵族的太太们在她们同类的其它一切人看来是非常娇媚和可爱的，并且是充满着慷慨和同情的；但她们却残忍地折磨她们的奴隶。分明是同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可以关怀得无微不至，然而在他的业务关系上却成为最无情的敲诈者和最冷酷的监工。

文化不一定同时有助于使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通情达理。另一方面，如果作相反的假定，把原始的自然状态当作黄金时代的羲皇盛世，认为我们一直是从那个盛世逐渐衰退下来，那也是荒谬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看出两种互不兼容的倾向，根据当时的条件，不是这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便是那一种倾向占据优势。

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以及增加人类的敌对势力。它助长国内的对立，即发生于人口过多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穷人与富人的对立，独占自然财富的人们与被迫留在贫瘠沙漠中的人们的对立。而且，它引起工业发达地区与工业落后地区的对立。最后，在各国本身中间产生人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剥削和奴役形式，从而引起了仇恨与残暴。

一种相反的倾向是随着农业的开始而产生的。在早期的生产方法中，狩猎和畜牧占主要地位。畜牧和狩猎都需要武艺，并使流血成为维持生活的手段和防御猛兽的手段，因为那些猛兽在文明初期威胁着牲畜的安全。另一方面，农业却并不一定要用武器。农夫往往看到野兽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们袭击其它想来糟蹋农作物的猛兽；而猎人所看重的保护野生鸟兽的措施是不受农夫欢迎的。在农业方面更加突出的情况是，技工和聪明的工人利用多余的武器作为生产资料。制造这种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原料以及学习使用武器的过程，在这些与猎人和牲畜饲养者抱有不同见解的人看来，是他们想尽量减少的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因此农民、技工和知识分子的本性变得越来越平和；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农民和技工还需要用体力来进行他们的工作。这种体力很受他们重视，并且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甚至在游戏中、特别是在含有比赛性质的竞技中，非常受到欢迎。知识分子却不需要其它的力量、他把别人用以使肌肉发达的时间用在获得知识战或锻炼他的脑力上面。无论是谁，只要他企图用智力的武器以外的其它武器求进行文字的论战，就会立刻暴露他的低劣。这种论战决不可以因为德国学生界往往采取粗暴和恫吓的方式就加以否定。德国学生界的粗暴态度是逐渐导致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斗争所特有的横蛮作风的结果。

古代世界的僧侣阶级以及基督教的精神领袖们一般是反对流血和暴力行动的，至少在他们不属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时是如此。对于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当知识分子本身变成了剥削者时，他们就并不总能表明同样的和平倾向。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的情况就同农民、技工和无产者一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被当作达到别人的目的的手段，而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或者是达到全社会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是被当作达到其它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康德的伦理学恰好符合这个观点。不过在康德看来，伦理学并不单纯是特定阶级或时代的道德律，而是全能的上帝本身都受其支配的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永久的道德律，因为甚至在上帝看来，也是不准把人当作单纯的手段来使用的。(为什么呢？)[2]

不论这种态度如何产生，其结果总是成了对于人格以及对于人生和人类幸福的尊严的莫大尊敬。可是，这些热爱和平的倾向在农业和村社生活的初期已经开始显出不利，因为各国的和平的阶级是最缺少防御的。他们受到武装集团的剥削，这些集团曾经作为一个好战的贵族社会对他们逞尽成风，这时又专门从事于狩猎、战争和杀戮，像以前猎人和畜牧者所做的

那样。所以，他们在对自己的心怀敌意的同胞的态度上，把猛兽的方法和本能提升为一种原则。

于是，残暴和人道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两个特征。这些特征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按照不断改变的条件而占据优势。在古代罗马，全部人口都卷入征服的政策。罗马人由于他们在军事上占优越地位，终于能够使地中海的一切国家都成为他们的附庸。全部人口靠剥削这些国家过活。他们对战争非常热心，赞成最残酷的战争行为；由于战争的胜利给罗马人带来大批廉价的奴隶，因此在竞技场中使用奴隶并使他们在决斗中互相残杀以取悦观众，就成为他们的主要娱乐之一。单纯供懒惰的上等和下等民众消遣的格斗和杀人，标志着最下流的残酷行为的极限；然而这一类的事实却代表着高度文明阶段而不是野蛮状态的古罗马城。这些以人命为儿戏的格斗，直到罗马国家由于住在边境的蛮族入侵而从高度的"文化"下降时，方才告一段落。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好战的贵族以外，还出现了具有两种不同倾向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是个剥削者，因此他把自己依靠对其剥削而生活的人当作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到那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态度中，已经潜伏着冷酷和残暴的萌芽，至于这些萌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那就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殖民地政策应对最残忍的和最可怕的暴行负责。另一方面，在商业垄断时期，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发生了对立。尚业资本在这时期显出是好战的和肆无忌惮的。它屠杀和掠夺了印度的人民。它进行了对黑人的奴役，迫使它的各国政府发动凶恶的、消耗性的商业战争。反之，工业资本却必须支付大部分的战争费用，从而遭到严重妨碍。因此，它是同这种方法直接对立的，并且事实上也是义愤填膺地反对了这种方法。人类的同情心显露出来了，它对虐待西印度群岛黑奴的暴行表示愤慨，但始终容忍着以不足维持温饱的工资迫使英国的白人工作过劳的残酷折磨的现象。不过在这个时期，连无产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始终一贯的、统一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生活环境曾迫使无产阶级把人生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既然它不仅是一个剥削的而且毋宁说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深受漠视人生的痛苦；所以以古代罗马为例，战争除使无产阶级担负军费以外，还使它承担许多重荷与危险；而胜利和由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则归统治阶级独享。所有这些引起无产阶级厌恶一切杀戮和各种暴行。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早在近代工业生产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获得发展以前就在群众中间出现了。封建制度对农民课以苛重的赋税，所以农业受到不利的影响，生产量急剧下降。

结果是，农业不得不逐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而那些仍旧留在农业岗位上的人的劳动负担不断增加。那时多余的劳动力很少有机会受雇于工业生产，因为工业本身受到行会的限制。所以无数的失业群众、即挨饥受饿和绝望的无产阶级充斥全国；由于他们本身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便求助于各种寄生性的糊口之道，从求乞和偷窃直到明目张胆的抢劫。这些人生活极端贫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为社会所不齿，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充满着对于整个社

会的疯狂仇恨；这种仇恨增加着，因为那些当权的人无法并且也不愿采取有助于社会改革的措施，而是一味采用恐怖手段。他们不得不恐吓挨饿的人们，使他们不再求乞、偷窃、欺骗、卖淫和抢劫。于是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受到最可怕的惩罚。“一场反对流浪的真正残酷的战争，”马克思在其《资本论》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达本书里他举了有关这种立法的许多例子。[3]其结果是同任何恐怖时代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它既然不能改变社会产品所由产生的基础，就只会减低社会产品。罪犯的人数没有减少，尽管他们有多少人被押送到木帆船上去从事苦役，或者有多少人被处绞刑和遭受毒打。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人除继续行骗外，没有其它谋生的办法。于是就产生了同警察的不断冲突。唯一显着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日趋败坏，而执行重典的恐怖与残酷的行为格外助长了无产阶级的仇恨和忿怒，以及对于残暴的渴望。当然，首先只是无产阶级的作奸犯科的一部分人才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那时为数很多，同工人无产阶级的分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友谊的联系(正如同中小阶级和农民的下层有着相类的关系一样，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一只脚站在有害影响的泥沼中的)，因此连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方法也受他们的影响。结果，在法国革命爆发时，只有知识分子以及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中小阶级富裕部分和资本家与工业家的那些阶层才对人道表示同情。在无产阶级本身以及与其关系最密切的那些阶层中，由这种残暴立法所产生的粗暴和残酷的倾向，一旦在国家政权最后垮台时就往往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种倾向以前是受国家政权的压制，完全处于潜伏状态的。

杀戮和恐怖手段

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如何对待群众中最穷苦的分子，那么对于革命分子在能够自由行动时往往立即使斗争具有疯狂和残酷的性质，从而把伟大的革命变成特别凶残的革命这一点，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然而，如果把各种革命的屠杀列在同一个项目之下，那是错误的。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变得凶残的人们在斗争和失望所引起的忿怒支配下或由于无名的恐惧而容易造成的过激行动，同那由预先安排的训练制度所产生的过激行动区别开来；后者以策划周到的立法形式依靠当局人物而被采纳到国家制度中去，以便压制那些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分子。

我们看到在革命开始时就有从人民方面自发地产生的暴行，但恐怖时代是从一七九三年夏季吉伦特派被逮捕和被处死刑时开始的。早在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当驻军投降时，人民就表现了他们的残忍。有些人被杀死了，其它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人们把那些脑袋挑在枪尖上耀武扬成地四处走动。这种用枪尖挑着人头的示成游行，在革命过程中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当革命变成了革命方面同欧洲各君主的战争时，对于流血和残暴的渴望增加了。当普鲁士军队逼近巴黎，普军总司令布伦斯威克公爵在其宣言中以屠城来威胁巴黎时，关于全国贵族阴谋支持外敌的谣言甚嚣尘土。于是巴黎人怒不可遏地纷纷起来，想要消灭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这一行动发生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这场使三千人丧失性命的屠杀是大革命恐怖的高

峰。一伙伙的刽子手对于流血着了迷。他们并不以杀戮为满足。他们真正是以狂喜的心情泡在血泊之中。

德．拉姆巴尔公主的全部罪行不过在于她是王后的朋友，但她不但遭到杀害，而且被剖腹掏心。人们把她的头挑在枪尖上，带到被囚的王后的窗子跟前。王后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立刻晕过去了。

连宽赦的行动也带有残酷的形式。德．索姆布鲁伊夫人在九月屠杀期间同她的父亲囚禁在一起，她的遭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站在她父亲旁边的某一位德．圣马尔先生被劈开了脑壳。她的父亲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她拚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他，斗争了半天，终于在受伤三处以后使那些人受到感动。

“其中有一个人拿来一只酒杯，把那被杀害的德．圣马尔先生头上流出来的血倒进杯里，再搀进酒和火药，然后宣布，如果她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干杯，她就可以拯救她的父亲。她泰然自若地一饮而尽，于是立刻就被这同样几个人带了出去。”[4]

毫无疑问，愤怒的和孤注一掷的群众在革命时期的残暴是可怕的。但是，即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这种心理的改变，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点单单归咎于革命。这种心理的改变是高级当局长年累月对待人民的结果。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一七五七年，一个名叫达米昂的人想要谋杀路易十五。他用一柄证明完全不能致人于死命的小刀行刺。但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是可怕的。达米昂的右手被砍了下来，当着他的面被烧掉。人们砍伤了他的手臂、腿和胸部，把滚油和溶解的铅注进这些伤口。、然后他们把他的四肢各缚往一匹马上，驱策那些马朝不同的方向奔去，因此他的整个身体确实被分成了好几块。这个不光彩的酷刑是完全公开执行的，其目的是要对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这种残暴的行为一直继续到革命时期。只有革命才彻底扫除了这种暴行。可是，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三日，高尔蒂埃．德．皮奥扎还从凡尔赛作了如下的报道：

“上星期二，在晌午时分，凡尔赛的人民终于阻止一个罪犯的死刑的执行，他由于犯了杀父罪，本来是判决要缚在刑车上活活烧死的。”[5]

“由那些执掌较高权力的人所犯的这些暴行先于群众所犯的暴行，群众从事的杀戮得不到公认的革命领袖的赞许。事实上，他们是极力反对这种行为的。一向被人十分错误地归罪于那些领袖的九月屠杀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有何指责，那也充其量只是说他们没有能够抑制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是非常厉害的，是可怕的和使人胆战心惊的，因此谁也不敢拿性命当儿戏，变成这种愤怒的牺牲品，连吉伦特派也不例外。公社的委员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力图拯救那些侍奉王后的贵妇人；他们每次都获得成功，只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德．拉姆巴尔公主不在此例。”[6]

罗伯斯此尔就是对九月屠杀深感愤慨的人中之一。他痛苦地喊道，“流血，经常不断地流血。这些可耻的人最后一定要把革命葬送在血泊中了”[7]。

连马拉都在这种屠杀的而前感到战栗。“一个足以表明马拉本人的特征的事实，据我所了解还没行被任何历史家提到的是，他公开地不赞成九月屠杀，或者至少是对那种屠杀深感遗憾——这同一个马拉在他于八月十九日发表的言论中还曾赞许过屠杀，并在九月二日想要把屠杀的好处扩展到法国全境哩。”[8]

不消说，在马拉的方面，使他不赞成九月屠杀的，与其说是对于人道的重视，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罗伯斯比尔属于根本反对任何流血的知识分子。这可以从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七日制宪会议对于新刑法的讨论中获得证明。在讨论新刑法的会议上，当有关死刑的条文被提出考虑时，罗伯斯比尔是同那些最激烈地反对这种刑罚的人们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理由是：死刑并不能防止犯罪，而只会使民众更加残忍，更加倾向于作出暴行。他的努力落了空。死刑仍旧保留下来。只是规定不得采用最可怕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斩首是保留下来了。这项决定构成了若干少有的原因之一，使得马拉表示赞成国民议会而反对罗伯斯此尔。两年之后，罗伯斯此尔站到马拉一边，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对死刑的意见。从此以后，这个刑罚就成为他的主要的政治武器，甚至用来对付他的政治上的朋友。

我们已经竭力主张，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恐怖主义的方法这一事实，不应该同一个愤激的群众的过火行动混为一谈。因为这些过火行动起源于民众的没有教养的和粗野的分子中间，而恐怖统治是由那些充满着最高尚的情感的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所支持的。这种恐怖统治是当时存在着的条件的结果，它的根源和自发性的暴行不同。自发性的暴行是由旧制度对于贫苦群众的残酷立法造成的；而恐怖统治则是雅各宾派由于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任务而不得不实行的。那时，雅各宾派正处于由雕敞的群众的不幸所引起的、只是到了他们当政时才达到顶点的战争期间最可怕的环境之中，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保全资产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同时还要消除人民的痛苦。其结果是，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只有使用他们自己所不赞成的并且深知其无益的手段，才能从那种境地摆脱出来。正是群众的这种困苦，使得旧制度着手制定它的残酷的法律，求助于恐怖主义。事实上，也就是这种普遍的困苦引起了新制度的同样残酷的法律和恐怖主义。唯一的区别是：古代的国家力图用杀头和虐待穷人的办法来统治可怜的民众；而新的国家则力求用砍富人及其奴仆的头——没有虐待——的办法来减轻群众的困苦。但是后者正像前者一样，并没有达到目的。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还有所不同。旧制度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恐怖统治之是否摧毁无产阶级。恐怖主义的失败当然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但它对旧的国家没有构成严重的危险，因为旧的国家想要压制的阶级、即流氓无产阶级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占据上风，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完全不值得重视的因素。反之，新的制度在它的恐怖手段失败时，便立刻宣告破产并趋于崩溃。因为它想压制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宜于执掌无上权力的阶级，并且从经济上考虑，它在当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镇压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困苦，连那些本来应当从恐怖时代获得利益的人也同样遭到这种厄运。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使旧的“恐怖统治”与新的不同。就前者而论，那是完全符合于支配这个时代

的集团的伦理的。他们并不一定由于实施恐怖手段而不忠实于自己。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正当的手段。可是，新的恐怖时代是与实行恐怖手段的这个阶级的伦理背道而驰的。因此，从最初起，恐怖主义者就受到良心的谴责，虽然他们企图用种种诡辩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它却破坏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削弱了他们的威信，加剧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动荡和磨擦，甚至使他们的许多成员腐化堕落。即使在来世也没有绝对的“道德”，即使一定时代、一定国家或一定阶级的道德是相对的东西，伦理还仍旧是最牢固的社会维系，以及在人生的——切问题和冲突中的最坚强的支柱。最坏的时期时期莫过于对自己不忠实，或者违反公认为构成良心的无上命令的那些伦理原则了。恐怖统治在遇到有力的抵抗时所以会彻底崩溃，大部分应该说是这一切约结果。残存的恐怖主义者曾经多么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啊!在拿破仑看来，合法的君主主义者是一种此旧的共和主义者大得多的危险。这证明了后者的“道德”在恐怖时代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害。

十九世纪行为的倾向仁义

法国大革命属于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时代，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流血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结果，他们不是谴责了革命，便是颂扬了杀戮。事实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它所以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它排除了封建主义，鼓励了能使无产阶级群众从单纯的流浪者变成工资收入者的工业资本，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发动了一个迟早要以民主政治获得胜利而告结束的运动。最后，由于研究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使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特定时机能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而其目标又在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的理论；因此它没有理由要陷入一条只会导致恐怖统治的死胡同里去。通过革命，农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他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结果，土地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产生了农民也分润其利的较大的报酬；所以曾经放弃农业工作的过剩的劳工的总数就有了减少。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人离开土地而涌进城市去寻找职业。一切旧的行会的限制已经打破；手工业可以不受妨碍地自行发展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这种劳工受到新兴的工业资本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工业资本的迅速增加，迤这种资本也有助于扩大对劳工的大量需求。工业无产阶级这时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阶级觉悟的特殊的阶级，它变得越来越显着，同流氓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资本的统治下，同盛行手工劳动的时期的独立劳动者的地位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地位当然已经恶化。另一方面，与流氓无产阶级相比，资本也肯定是改善了劳工的地位。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会斗争的；而工业无产阶级依靠它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却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具备了理智和道德上的一种了不起的动力。在最初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到资本的可怕的抑制。在它的居住条件上，在它的生活的贫

乏和动荡上，在它的愚昧无知上，它同流氓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大距离。的确，由于生活的单调，由于排斥一切行动自由的工厂纪律的不断压迫，由于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剥削，它在许多方面还不如流氓无产阶级。

因此，工人无产阶级里就没有流氓无产阶级中比较强有力的分子的那种胆量。这样它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但它并不因此摆脱它的粗暴。在这种情况下，要存有解放的念头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很长的时间以后，人们由于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希望从那似乎要使他陷入的看起来是绝望的泥沼中脱身出来。这个过程越是继续下去，由于当时的环境而显现出来的富有人性的倾向也愈能发展和成长。有利于这些倾向的事实是：由于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甚至为反对无产阶级而制定的刑法也开始丧失它们以前所具有的残酷的性质。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我们已经讲到的结果，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已经显出是一个充满着使人赋有人性的最大的力量的阶级，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所发生的运动中；他们愈来愈脱离了那种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先驱的特征的、连恩格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工厂工人中间看到的残忍的野蛮行为。与此同时，导致恐怖统治的种种原因消失了。在这恐怖统治瓦解以后，比较有远见的同情无产阶级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恐怖统治并不能够导致任何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解放。他们得出结论，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采用共产的办法才能达到。但是他们在资本家中间找不到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无产阶级中间也找不到精神条件；并且他们看不到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正在起着产生这些条件的作用。因此，他们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企图找到一个在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手段以后似乎就能立即实行的计划或公式。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思想，不是向某一位仁慈的百万富翁而是仿照第一巴黎公社的榜样向政治上的垄断求得权力，每一个这种企图当由政府中的少数人实行时，就必然会导致与第一巴黎公社的统治相同的恐怖统治。无论如何，这种企图至少是合理的。它并不想要避免资产阶级社会的后果而又保全这个社会，而是企图利用摧毁其基础的办法来消除那些后果。不过，只要缺少那种唯一能够扫除他们想要加以摧毁的基础的社会条件，在企图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甚至这种努力也一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将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以不可能办到的、或至少是毫无效果的、甚至是违反对方利益的事情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只有借助于最后必须用屠杀来实行恐怖统治的暴力手段，那种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努力失败了，不仅因为当时的工人群众还不过是在逐渐抱有社会的观念，而且因为无产阶级已有好几十年没有保持它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占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二巴黎公社确实给与无产阶级以支配巴黎的权力，但它并没有获得支配法国的权力；并且即使在巴黎，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多数派。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者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是非常慎重和谦逊的。在巴黎公社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群众所接受时，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坚强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使其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学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历史唯物论。他们具体地阐述了关于历史的纯粹自然发展的思想，按照他

们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受经济关系的发展支配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造成那种终于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但他们同样承认，只要转变的条件还没行成熟，想用第二种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第一种的任何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

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再是找到一个可以提出并在一切条件下采用社会主义的全面社会化的计划或公式。他们必须研究经济情况，并且作为自己的研究的结果，阐明对一般社会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同时为推行那个步骤而努力奋斗。换句话说，那些社会主义者从此以后并不仅仅关心于推行社会主义了。当社会主义还无法推行时，他们就不得不关心资本主义工业的条件，并要求那些条件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决不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所能立刻理解的。事实上，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社会主义者们在几年之后还瞧不起自由贸易和罢工这类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影响工资制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工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以及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经济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意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立刻加以推行和实现的东西了。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地方，它也只能推行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实行的某种性质的社会主义，而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必须符合那些具体的条件。根据这种看法，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政变来推行。它势必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者永远被要求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只从事于在当时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可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如果每一件事都经过适当的考虑才见诸行动，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在所进行的工作方面遭到失败或陷于绝望的境地，而绝望的境地是会迫使他们违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并借助于恐怖手段的。

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领导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甚至到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每一个行动上一直能够避免犯严重的错误，而利用恐怖手段来实行任何计划这一想法，已经完全从它的纲领中取消了。很多事情对这种结果作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最有力量的社会学说的同时，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欧扎了根，并且由于它在那里斗争的结果，已经开始构成政治生活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得到提高和巩固，而且对于经济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的认识也有所增长。一切异想天开的冒险行动被消除了，而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的内战也是如此。一九〇二年我在拙著《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第六章民主制度)中写道：

“即使没有其它原因而只是因为民主制度使较高形式的革命斗争成为可能，它也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制度。这个斗争将不再像一七八九年或一八四八年那样由无组织的群众进行的斗争，那时他们没有受任何政治教育，不了解进行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比，不能比较深入地弄清楚斗争的目的和解决斗争的手段。它将不再是一个由那些轻信各种谣言的、受各种偶然的事故支配的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它将是一个由有组织的进步群众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群众意志坚定，善于思考，既不乘一时的高兴而人云亦云，也不对任何不利的局势惊慌失

措，更不由于失败而垂头丧气。另一方面，选举和竞选的方法使人们有可能估量自己和他们的敌人的实力。它们有助于清楚地了解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而且，它们可以防止过分急躁的行动和避免挫折。它们也甚至有助于使对手自己认识到他的地位的脆弱，并且往往可以使他自愿放弃他的地位，如果放弃与否对他来说也许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整个的斗争就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残酷无情，如果它不依靠没有把握的机会的话。”

由于所有这些条件合并发生的作用，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水平之高于流氓无产阶级，以及由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那时就有可能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其所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表示的悲观的忧虑抛开。他说：

“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一七九三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9]

必须说明的是：只有当一次革命在恩格斯所预料的时候爆发，他的忧虑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甚至在四十年代，尽管不发达民族的群众、特别是爱尔兰人已经从事工业，他的忧虑还是多少有些夸大。但是恩格斯本人希望，如果革命不会马上到来，无产阶级就有时间发展自己，接受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使革命采取某种比较温和的形式。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恩格斯所预料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到来，但并没有发生在英国。在革命爆发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力量也有了增长。

在欧洲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情况改变得很快。早在一八七二年，即巴黎公社之后的一年，马克思表示希望在美国、英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将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无产阶级的兴盛已经带来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凡是对问题了解得深刻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可以单靠武力加以推翻。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不大想到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当时看得很清楚，德国和俄国的旧制度的人们将力求借用武力来粉碎任何想要推翻他们的企图。但是，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居然像十八世纪末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重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

恩格斯在其历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相信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断地减少残暴，同他的看法相反，近来在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由科学发展为行动》一书中讨论了另一种见解，这个见解也出现在布哈林写的《共产党人的纲领》(祖里克，一九一八年)一书的序言里。那篇文章中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资本主义越是发达，它的没有防御的斗争就愈加不顾一切，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愈加惨烈，胜利的工人阶级用以践踏失败的资本家的手段也就愈加残酷。”(第19页)

这是同马克思和思格斯的预料完全相反的。因为它把近十八个月来布尔什维克普遍推行的做法规定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格外错误了，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把这些做法说成是资本家们没有防御的战争的卤莽和残暴的结果。关于所有这种残暴，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其如此。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变得极端惨烈，却完全是事实。其所以有这种情况，依我这种“顽固的老朽”或“愚蠢的老朽”(布哈林，同上书，第22页)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归因子资本主义的残暴，因为在卷入世界大战的各国，资本主义的残暴是像在上次革命开始时的德国一样明显的。

战争的影响

在至今有案可稽的提高人性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向残暴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世界大战；但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人性的一般趋势的其它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法国革命本身暴露出来的。那就是革命政权认为必要的普遍兵役制，目的在于调动优势兵力和不断补充缺员来对抗那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的君主的职业军队。当法国又已抛弃这个制度时，这些君主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加以采用，并在事实上加以维持和扩大。那就是普鲁士这一个边疆地位最为不利的在欧洲强国中最近崛起的和最小的国家；它的生存要求建立一支按人口比例来说远较任何其它国家为人的军队。撇开这个事实不谈，旧的普鲁士由于种种纯属自然的原因，被认为是大国中间的一个晚子和最穷的国家。所以，如果它真正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他的一切考虑就非顾全军队不可。结果，自从它崭露头角，列为强国之一的日子起，它就是一个最杰出的军国主义国家。美国大使盖拉德在其论述德国的着作[10]中作了几点说明，这些说明非常清楚地揭露了普鲁士的军事职业。

由于实行普遍兵役制和主张一般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之间在西方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高峰。结果，欧洲大陆其余的国家也不得不实行普遍兵役制，并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铁路系统成了战争行动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有的陆军强国都企图不遗余力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有必要不断增加武装力量——换句话说，越来越严格地实行普遍兵役制。于是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光荣的成绩：全部男性人口，除非患有残病或体格不合条件，都被迫参军!但参军意味着使自己习惯于杀人并在杀人的行动上进行竞争。它表明人类的感情和文化的削弱，以及残暴的养成。在十八世纪，当只有人数不多的职业军队(国民军)的时候，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可是，由于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人民在十九世纪的期间变得越来越残忍，特别是在普鲁士。

十九世纪的提高人性的努力因此就完全徒劳无功，并且还受到十分不幸的影响。这种提

高人性的努力在知识分子中间本来是宣扬得最响亮的。他们一直在很长的时期内免服兵役，甚至在实行强迫征募而不是志愿投军的办法时也是如此。在征兵制度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只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各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免服兵役的。另一方面，普遍兵役制却终于使他们不能成为例外。当时需要有指挥预备军的军官。不过在此以前，正如在以后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在兵役方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个地位没有把他排斥于军队之外，而是使他在军队本身之内享有某些特权，成为限期一年的志愿军和后备军官。结果，知识阶级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上受到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且事实上这种影响比其它阶级所受的同样的影响格外来得深刻。因为兵役使他们占据特权地位，同时还在他们的心中养成了对于军队生活的某种兴趣。此外，设置职业军官的制度也加强了军队的吸引力。在那些把服兵役当作终身职业的人看来，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暂时的活动形式，他们必须在一切战争策略上采取主动，使他们的团队在阵容和作战能力上胜过其它的团队，因而他们养成了黩武主义的特性，其程度此那些仅服短期兵役、甚或被迫这样做的普通人为深。

因此，知识阶级此其余的人口更深刻地受到黩武主义的影响。而且，专门职业带来一种倾向，往往用一种绝对的过激的方法——这种方法毕竟是同极反动的思想方法十分吻合的——来阐释一切观念和概念，而那些通过实际的经验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障碍的人们却没有那么趋于极端。知识阶级中希望成为预备军官并以职业军官为模仿对象的人们，很容易地适应了黩武主义，带头提倡了由普遍兵役制所产生的立刻感染到全体人民的粗暴和暴戾。甚至在这方面，普鲁士也是走在其它国家的前头；因为它首先推行了为期一年的义勇军和预备军官的制度，此其它任何国家更高地把预备军官提升到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存在着普遍兵役制，无产阶级的提高人性的倾向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的关系比黩武主义的残暴影响更为强烈。就知识阶级、特别是普鲁士的知识阶级来说，曾竭力抑制这些倾向，从而大大地助长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酷烈程度。

这里关于知识分手所说的话可以特别适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人道本能由于他们的地位关系，从一开头就碰到一些比它们更强的敌对力量。所以，当战争爆发并在实际上把全部健康的男子拖在它的后面达四年之久的时候，黩武主义的粗暴倾向便陷入残忍的深处，缺少人类的感觉和感情。连无产阶级也不再能够不受它的影响。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了黩武主义，当它重返家园时在各方面都变得残忍了。由于养成战争的习惯，从前线回来的人往往抱着这样的心情和感情，甚至在承平时期和在自己人中间都动辄用暴行和流血来坚持他的要求和利益。这可以说是成了内战的一个因素；它还进一步促使群众成为纯粹的生番。尽管如此，许多比较成熟的人一旦摆脱了战争的影响，却非常容易恢复他们在承平时间所养成的思想方法和感情状态。但是以青年而论，情况就坏得多；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和指导，已经无力抵抗四年战争期间盛行的残暴影响，因而也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终生所不能完全磨灭的印象。

除此以外，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中还有一个异常深刻的变化在起着作用。战争已经十分严

重地影响了中小阶级，赢得了他们队伍中的许多成员并迫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而且，至今对无产阶级一切阶级斗争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的这些分子，一直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时所获得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能力。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不辞劳瘁地启发和组织群众，甚至在至今已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内部，也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同所有工人的情况一样，战争时期熟练工人由于死亡或由于受伤和患病比在承平时期减少很多。

同时，对于新的一代简直没有什么准备。没有时间或力量来教育青年，并且也缺乏为从事这种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兴起了仅给熟练工人提供狭小活动范围的单调得多的军需工业，以代替存在于承平时期的各类工业，每一工人只需学习使用一点机器，这种机器那怕是最不熟练的徒工也是能够同样操纵的。结果，曾对德国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熟练工人在战争期间人数大为减少；代替他们的是一批突然产生的在人数上增长得很快的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有过完美的组织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一切劳动阶级具有最清晰的看法。不熟练工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他们是无知的、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冷淡态度在战争期间肯定是有了转变。因为这个巨大的事件及其可怕的后果惊醒了每一个人，连人民中间观念最模糊的人也不例外，并且使他们极度激动。可是，与此同时，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无知的和缺乏修养的不熟练工人相比，以及同那些被迫落入无产阶级的中小阶级相此，根据社会主义学说教育起来的熟练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因此，受有较高教育和具有较高技能而一直领导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就逐渐丧失他们的领导权，代之而出现的是无知的盲目热情。这种情况格外容易发生？因为战争带来了最严重的经济混乱、大量的失业、物价的高涨和日用必需品的贫乏。所以绝望的群众要求最剧烈的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他们确实没有考虑过的较高形式的新社会，而是在于立刻摆脱他们的可怕的困境。在无产阶级看来，改变它的不幸的处境始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原因说明了，由于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大量的经济和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从来就觉得很难在工人阶级中间生根。群众在本能上所愿意接受的，不是一种导向发展道路的学说，而是一种能够提供一个公式或计划，使他们在实行之后无论如何都可以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学说。对于一个无产者说来，要承认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肯定地并不希望他处于单纯的消极等待的状态，而是激励他继续努力进行阶级斗争，但又使他的最后解放要取决于一种必须首先加以发现和创造的发展方式，那在他这方面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忍从。在战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无产者的处境不论如何艰难，他的状况还能让他勉强生活下去，因此社会的刻不容缓的改变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至少在那些构成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核心的熟练工人看来是如此。今天，这些工人在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地位被不熟练的工人所代替了，而不熟练工人的绝望境遇已使他们达到无法等待的地步。事实上？当战争的结束终于把政治权力放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又何必等待呢？

战争不仅已使工人阶级中最坚定的分子加入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同时由于军队的崩溃，

特别是在欧洲经济上最厚实的那些地区，战争也已经在各个城市中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与此相比，像在俄国可以找到的那种不识字的农民则还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真正独立的政治权力。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它为自己所争取到的权力，不论使它居于显着地位的形势是怎样的形势。由于他们本国的落后状态，如果要求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这样的放弃，那是愚蠢的。但是，一个由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使胜利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当前各种问题适应于现成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不会不假深思地力图在俄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立即采取全面国有化的政策。

究竟这样一个政党能否领导群众，肯定是一个疑问。在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看来，比较重要的是在当时实行统治，而不是抱着正当的终极目的冒经济上失败的危险。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愿处于在目前会引起民怨的地位，因为一个超过现实可能性的政策之必然归于失败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希望避免失败，希望他的理想不致连带受到损害。实际政治与理论政治之间、拉萨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旧的对立，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又发生了。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库格曼的信(我把它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社会主义者》刊物上)里说，由于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的反动，德国工人竟堕落到“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11]。这种“手段”和这种“救主”是不合马克思的脾胃。可是，正如在拉萨尔的哪个时期一样，俄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期即使具有截然不同的理由，也证明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极端不利的。俄国工人阶级中那些根据马克思的方针培养出来的人们已经死亡，或者被突然觉醒的落后群众扫除掉了。当初占据上风的是以布朗基、魏特林或巴枯宁为代表的前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这些就是首先在俄国、以后在邻近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所面临的状况。因此，难怪革命只是重新唤醒了原始的思想方法，并让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残忍的、凶恶的斗争方式显露出来，而这些方式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本来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理智和道德的进步克服了的。

[1]契扎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医师和犯罪学家，曾任都灵犯罪人类学教授。他认为一个犯罪者代表一种不同的人类类型，在身心力面具有明确的缺陷，并认办一个犯罪这乃是遗傅、返祖现象和堕落的产物。——译者

[2]参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版。第五节“上帝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准绳的存在”。

[3]　普及版，第 664 页及以下。

[4]　这个报道见古斯塔夫．兰乡瓦编《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二卷，第 176 页。此书在最近的德国革命之前的夏季写成：在注明日期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后有这样的话：“深切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和悲剧，在我们当前的严重时代是会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料到，在这“严重的时代”、革命的悲刚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实现了。

[5]兰多瓦：《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一卷，第 315 页。

[6]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 5 页。

[7]路易．勃朗：《法国革命》，第二卷，第 207 页。

[8]让．若累斯：《国民议会》，第一卷，第 75 页。

[9]《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85 页。

[10]盖拉德：《我在德国的四年》，伦敦 1917 版，第 447 页。

[1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77 页。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活动

剥夺和组织工作

世界大战使工人阶级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后退了一步。它几乎使每一阶层的人民都残暴起来，它把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终于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因此它带来的不是从容的思索和考虑，而是绝望。战争发展了军事的思想方法，从而也助长了工人阶级中的原始思想。那种思想方法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暴露出来的思想十分接近，因为他们认为单纯的权力是世界史上的决定因素，仿佛你只要拥有必要的势力和带有莽撞的作风，就无往而不利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经常抨击和反对这种想法。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里有三章专门讨论“暴力论”。[1]这个理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只要这个理论以革命的形式出现，思格斯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抨击。他不像今天有很多人主张的那样，认为只要一个运动是革命无产阶级运动，就决不应当揭露它的种种错误，理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十分明显，我们不应当过分苛刻地批评革命中的错误和缺点。最困难的历史情况就是革命的历史情况，因为你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全盘观察的崭新的局势。假如一个观察者本身处在安全的地位，或者从远处进行考察，却过分严厉地谴责那些置身在斗争的中心并担负斗争的一切责任和危险的人们所犯的错误，那就是最廉价的伪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错误不是起因于可以想象得到的对于情况的了解不实或了解不足，而是起因于本来对事物基本上抱有不正确的看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来谴责那些错误。只有纠正这种看法才能避免错误；如果我们把那些错误轻易放过而不加批判，甚或为了假想的革命利益而为之辩护和加以颂扬，它们就只会使未来的每一个革命运动遭受损失。

马克思和思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妨碍而不通过他们“火爆的脾气”对革命作这种必要的批评，这可以从恩格斯于一八七三年秋在《来此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获得证明。在西班牙共和国于当年七月五日宣布成立后爆发的起义，除了少数的例外，实际上早在一月二十六日就遭到了挫折，虽然迦太基人把起义延长到一八七四年一月八日。因此，甚至在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前，恩格斯就发表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批评文章，反对“这种绝对丢脸的起义……它应当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前车之鉴”。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用《巴枯宁派的活动》这一标题以连载的文章的形式发表(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五日《人民国家报》)，一八九四年重刊于《人民国家国际》杂志(柏林“前进”版)。

我们奉劝所有热衷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们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是因为，既然西班牙革命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同今天的公社的形势相类似，那篇文章就在很多方面预先提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恩格斯首先谈起西班牙的国际成员大部分属于巴枯宁同盟这一事实，然后接着说：

“一八七三年二月，当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西班牙同盟派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西班牙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根本谈不上立刻实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可能实行这一点以前，西班牙必须在发展道路上经历若干准备阶段，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共和国让全国人民有机会在尽可能短暂的时期内经历这些准备阶段，尽快地排除那些障碍。但是这个机会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实际参加政治活动才能加以利用。”(第 17 一 18 页)

但是，那就意味着要参加议会的选举并积极参加议会的活动。可是巴枯宁派却要想一下子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就西班牙当时的形势而论，议会民主虽然在使无产阶级获得发展和变成成熟方面是个必要的手段，却根本无法用来达到上述的那种目的。参加“任何种类的选举在他们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时他们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竞选运动呢？作为“一下子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没有被发现。巴枯宁派宣布了总罢工，并把西班牙划分成无数的小的区域；此外在一开始就把整个运动分裂为一系列局部的运动，并宣布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结果不仅是运动的瓦解、西班牙国际的毁灭，而且也是“巴枯宁派至今所宣扬的原则的破产”(第 32 页)，因为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逐一放弃那些原则。

今天在俄国的情况是否有什么不同呢？固然，在俄国工人阶级中爆发现在这次革命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像在俄国这样获得普遍的承认。

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几十年的期间自愿地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并从他们土地问题的落后性中看出某种好处。他们认为农业共产主义关于土地的措施使他们特别容易建立并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由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功绩是：争取承认这个看法；鉴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一般社会的不发达状态，经过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终于能使不可避免的革命从一开头就只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即使无产阶级被要求在革命中间起一种突出的作用。只要革命不使那把立即解放的问题列为纲领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中一定的高级阶层明白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上述的看法就能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胜利。俄国人民只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根本不管他们所想望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办到或是否与社会有利；当革命推动了真正广大的俄国人民时，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便落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马克思主义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群众心理学支配着他们，而他们也毫无节制地对它入了迷。无疑地，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已经变成俄国的统治者。所有这一切将会和必然导致什么结果，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由于把群众的盲目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就放弃了他们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顺利地扶摇直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由于他们具有科学知识，由于马克思的名字深入人心，他们认为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个口号、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就算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希望用这几个字眼来推卸他们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种种罪责。

这场革命是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而发生的。士兵们厌倦战争，不愿意再打仗。布尔什维

克使自己成为不愿继续作战的心理的最不可轻视的代表人物。他们坚决主张用一切办法瓦解军队，根本不问这种做法是否帮助了德国的军事独裁政府。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

军队的彻底崩溃给了下层阶级以完全的自由。农民立刻坚持要没收地产，把它分割成私有财产。当时不能不把这些大的庄园移交给农民，但是问题本来可以解决得比较圆满，使得这些庄园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好处不致丧失。不过那样就需要时间，而且农民也不愿等待。

布尔什维克在乡间制造混乱，听任每一个村落自由行动，从而把农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因此这些庄园被十分幼稚地破坏了，技术丧失了，许多生产资料损毁了。另一方面，农民完全让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已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的城市里采取自由行动，作为报答；所以工人阶级仅仅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挥，不去考虑实际的局势。

这时无产阶级正在挨饿。它觉得自己遭受压抑和剥削，所以它越来越热烈地要求立即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要满足它的愿望，就没有时间来研究或思考了。受到了几下沉重的打击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变成一片瓦砾。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问题。它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用一种国家的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的形式来改造社会上的财产。它也要求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把管理工作和诸如此类的一切职能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之内。在这两种改造中间，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此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事情比剥夺一个资本家更容易的了。那单纯是一个暴力问题，并不和任何社会理论有必然的联系。早在有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即在单纯的商业和金融资本的时期，我们就看到通过封建贵族和君主，并且事实上还通过人民本身，发生没收商人、银行家和放债人的财产的相类行动。在中世纪，不仅犹太人往往被没收财产；而且即使人们对宗教十分虔诚，一个教堂的或某一个教团的财产也有时会被充公。例如，法国的菲力普四世在十四世纪初期没收了非常富有的圣堂武士团的财产。早在有近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以前，许多善良的、天真的人们就往往把劫富济贫的侠盗看作是人类的保护者。实行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容易的。这是同俄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状态相一致的，所以巴枯宁在一八六四年、即在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前不久，在其致当时俄国青年的宣言中指出了俄国盗魁斯青卡．拉辛所走的道路。拉辛在一六六七年组织了一伙盗贼，他同他们在俄国南部一起生活了整整四年，最后为政府击败，延颈就戮。

组织工作不像剥夺那么容易。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的运筹调度的中枢在于资本家本人或他的代表。如果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建立某种组织形式，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这就不像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简单；因为它要求有一整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条件，要求有一个不但关于生产而且关于原料进出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组织方法。除此以外，它还要求有一个不但了解自己对邻人和同志的义务、而且了解自己对整个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其次，这个无产阶级通过长年累月的集体组织生活，已经习惯于自觉自愿的纪律和自我管理；

最后，这个无产阶级有很强的理解力，善于辨别可能办到的事和不可能办到的事，辨别品德高街的受过科学教育的领袖和没有心肝的无知偶像。只要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和一劳永逸地取消资本主义。即使在这些条件已有充分高度发展的那些地区利那些工业部门，也必须预先对实际情况进行慎重的研究，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因为新的组织暂时所采取的形式，对于一切工业部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来说，未必就是最好的形式。它们不是“现成的乌托邦”或永恒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要想获得成效，就必须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加以修改。

但是，如果不希望在至今所存在的生产状态之后紧跟着发生混乱和绝对停顿的现象，那就必须使社会化的两个因素、即剥夺和改组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可以把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剥夺，因为他们不打算建立某种新的生产秩序。靠这种简单的手段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群众是性急的。他们不愿等待。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以后，便把社会化的方法一分为二。他们把它的两个因素互相分开，虽然它们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他们起先从模仿斯青卡．拉辛的有效的方法入手，后来才竭力从事于组织工作，使其尽量能发挥作用。这两件密切相关的只能同时配合进行的事情被割裂开来了。列宁本人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其所着《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就承认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2]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统计和监督一般都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3]

当时并没有设法去了解是否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的方针组织一切企业和生产部门，便贸然加以没收。甚至在那些本来可以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的部门，他们也首先以没收为满足；因为只有这个工作可以预先不作准备就着手进行，同时也因为工人阶级不愿等待。但是后果很快便显露出来了。由于俄国的工业同它的农业生活比起来只占用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它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但在工业内部，最新式的利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它们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工业状况。因为在这后者，就可以算作社会化的成分而论，只有生产组合的形式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俄国的工厂大部分是大企业，因此在废除资本主义以后似乎首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企业收归国有。在生产组合中，工人的工资取决于他的工作和他的伙伴。这种工资的尺度由运往市场的产品的数量所决定。生产组合本身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在国有化工厂中，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资本家领取工资，而是向国家领取工资。他们的工资的最高额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生产活动的程度，还毋宁说是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国家政权也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支出。需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具有高度理智的工人阶级，

这个工人阶级认识到社会的繁荣、因而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在这些条件下使生产富有成果并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且，只有采取一些除工人、国家管理和消费者之外能对单独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发生必要影响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措施，只有建立工作的奖励制度以代替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活动能力，才能希望这种工人阶级踏踏实实地进行生产。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工人阶级不但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纪律。因为战争及其后果已使无产阶级中最无知和最落后的部分兴奋到了最疯狂的地步，情况就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肯定，俄国的工人已经从他的农村公社获得了高度的团结一致的观念；但是他的势力范围像村社本身一样是很有限的，因为它事实上只限于他自己的同志们的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比较扩大一些的社会上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者引以为憾的，正就是从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不幸的后果。托洛茨基在其所着《工作、纪律和秩序可以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的第 17 页上说：

"革命在最受压迫和蹂躏的人们的心中唤起了人格感，因而它在这种感觉觉醒之初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人格的一些基本本能的这种觉醒，往往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自利自私的性质，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即自我中心的性质。它力图为自己获得一切可能获致的东西。它只想到它自己，根本不愿重视整个阶级的观点。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特别在全国下层群众的较广范围内以及在早期军队中和工人阶级某些成员中所看到的各种各类扰乱秩序的叫嚷以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贪婪的倾向的泛滥"

这些性质和巴黎公社中表现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那里人们都满足于最微薄的工资，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可是在俄国的情况下，在被没收充公的企业中，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工资尽量提得很高，因而只存在着一种劳力的节省。为了实行方便起见，通过协议规定的工作被取消了。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像彼得堡波契洛夫工厂的那种情形。那家工厂在向国家领取九千六百万卢布津贴的期间，总共生产了价值五千万卢布的产品。只是由于漫无限制地使用纸币，才得以避免似乎无法避免的破产。如果说在那些工厂里确是作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显然就是工人们已从讨厌的、骯脏的和费劲的劳动中抽身出来。鉴于这种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确立和保证这种劳动，就成为引起一切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注意的问题。傅立叶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雇用那些喜欢在泥坑里打滚的"拣垃圾的"青年来做骯脏工作。但是这种滑稽的解决办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又可以收效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依靠技术科学来消灭在本质上令人生厌的、有损健康的工作中一切有害的和讨厌的成分。如果这一点不能办到，那么除掉利用某些特权、即或者特别提高工资或者特别缩短工时来使这部分的劳动具有吸引力以外，没有其它的途径。

布尔什维克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原则不符，而只是迎合了异常兴奋的劳动大众的群众心理。换句话说，他们推行了强迫劳动，但这种强迫劳动并不是为那些至今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规定的。为什么要对他们实行强迫劳动呢？在新的局势

的影响下，许多任务厂或者由于原料缺乏或者由于运输困难，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宣告关门，因此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噢，不是的!强迫劳动只加在以他们不工作、即他们是资产阶级为借口而已经剥夺了一切权利的那些人身上。苏维埃共和国不是建立正式的普遍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那些工作的人才应该享受政治权利；只有他们才应该吃饱穿暖，并受到国家保护。懒汉应当被剥夺一切权利。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一点小小错误的伟大社会主义的想法。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已经将近有两年只投工人们的票了。但是直到这一天为止，“一个工人的性格是什么？”这个闷葫芦还没有打开。我们从不同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回答。起初，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不外是大工厂的工资劳动者的代表机构。它们以这个名义形成了对革命来说非常重要的明确的但有限的组织。“苏维埃的观念”便开始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虽然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建立仅以大工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为限，它的基础就很不稳固了。但是，当他们走出这个范围，并且还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变得十分为难了。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助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

例如，就受过教育的阶级(知识界)来说，便完全要靠苏维埃当局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算作属于中产阶级。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他们是否应从事强迫劳动。

在苏维埃共和国,资产阶级不仅必须遭受被无偿地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痛苦，也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同时还是压迫的受害人，只有他们才要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只有他们被迫工作，而同时又因他们不工作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在苏维埃俄罗斯，一个人被划分为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根据他当时从事的职业，而是根据革命以前他所担负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人种，他们的特性是不能根除的。正如一个黑鬼始终是个黑鬼，一个黄种人始终是个黄种人，不论他容貌如何或穿什么服装一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也始终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变成一个乞丐或靠他的劳动生活。而他又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

资产阶级被迫工作，但他们却无权选择最适合于他们的能力的为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相反地，他们不得不从事那种最骯脏最讨厌的劳动。他们所得的酬报，不是数量有所增加的口粮配给，而是几乎不足以疗饥的最低的定量。他们的食物定量只抵到士兵和受雇于苏维埃共和国所经营的工厂中的工人的定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后者可以得到一磅面包，前者就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磅；如果后者可以得到十六磅马铃薯，前者只能领到四磅。从所有这些事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想把无产阶级放在较高水平以努力达到一个“新的较高的生活方式”的迹象，而只是无产阶级以最原始的形式渴望复仇的表现。无产阶级能够践踏那些由于自己的命运而曾经处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的、现在在教育程度和衣着居住条件方面还比他们自身优越的人们，并且想用这个办法来获得幸福。

在解放作为革命动力的这种“意志”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在某些事情上所实行的放任自流，甚至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原来的希望。因此，此如说，过去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变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牛马这一想法，使得以前受雇于这种资本家的工人们发布了摩尔齐洛夫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如下布告：

“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里安茨区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4]

把发布这个布告的责任放在布尔什维克身上，那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件事情肯定是违反了他们的意愿，正如九月屠杀违反了巴黎国民议会的人们的意愿一样。但是，一想到在一个地方苏维埃组织里，对于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轻蔑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委实叫人毛骨悚然；因为这些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且甚至被剥夺了人类尊严的最起码的尊重。

无产阶级的发展

甚至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完全听从采取这种形式的群众心理，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说他们“像空气一般自由”，并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神圣的实体”之后，他们企图教导一些改进这个“神圣的实体”的必要的方法’而事实上这种教育工作本来是应当作为一切社会化和没收财产的行动的先决条件的。

“前一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托洛茨基说，“我们缺乏必要的组织、必要的纪律和必要的历史教育。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它丝毫也没有妨碍我们力求全神贯注地为我们自己取得政权。我们那时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学习并安排一切事情的。”[5]

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车头并开动火车，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毫无疑问，他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他是否有必要的时间呢？火车是否有可能立刻出轨或爆炸呢？在你想要开动一辆机车以前，你必须取得某种为驾驶机车所必需的技能。同样地，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担任这项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组织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因为这种组织工作不容许有真空，不容许有空虚的情形，也不容许停止不动；尤其是不容许继续保留那种由战争所造成的状况，因为战争已经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设备能力，以致我们由于生产停顿，不得不做一天吃一天，而有饿死的危险。列宁本人也已经认为有必要阻止采取剥夺的方法。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6]

可是列宁不是个容易死心的人。相反地，他仍旧宣布，虽然有这一切情况，苏维埃人仍将赢得“反对资本的战役”；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他说道：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条件，就是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人民的内心已经开始表现出促进人生的‘动力’和首创精神，这个事业现在正在突飞猛进。”[7]

提千方人民群众的教育，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它可以通过各级学校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在这方面，俄国还须完成大量的工作。一个适当的普及教育制度要求大量的资财和繁荣的生产状况，可以为这种事业提供巨额剩余。但是俄国的生产状况带来十分恶劣的后果，以致学校系统不得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布尔仆维克一向不遗余力地在群众中间传播艺术和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却深受他们所处的改变了的经济状况的妨碍。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教育固然可以迅速地和很好地促进生产，却没有希望立即加以提高。相反地，这种生产的提高倒是教育的提高的先决条件。一般说来，成年人多半不再在国家或社会所设立的学校中学习，而是更多地在人生的学校获得知识。一个民主国家为他们提供最优良的教育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非常重视发表和讨论意见的绝对自由。这就使每一个政党负有争取解放人民的思想以及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研讨各方面的论证的责任，以便每一个人通过这种方法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

最后，阶级斗争从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最好的特色；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政党都是向全社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每一个政党当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辩护；但它不得不指出这些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样，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要此狭隘的乡村教会政策和党同伐异的职业政治来得优越。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由于参与政治而大大地扩展了眼界。如果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把民主政治束之高阁，一味推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种剥夺每一个“资产者”的权利并取消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治，那么，所有这些教育人民的可能性就会真正遭到损害。工资收入者的具体利益这样就同一般社会利益分开，同时工人本身也不能独立研讨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种种论证。因为这种研讨已由一个神气活现的当局替他指派好了，这个当局竭力想不让他知道各种可能使他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十分自然，这正是为了真理而应该发生的事情。一家资产阶级的报刊拥有它的一切庞大的、强有力的机器，不应当让可怜的、无知的人民受这种报刊的欺骗和毒害。可是在今天的俄国，这种使资产阶级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占据优势的强有力的机器在哪里呢？撇开这一切不谈，布尔什维克用以奴役报刊的严酷手段，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纸，而且针对着并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全部的报刊。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可是，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权者的地位越是不稳，他们就越害怕真理。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

受到最不利的影响。讲到概念和观念的真实性，我们必须用彼拉多[8]的话来问："究竟实情如何？"世间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着一种认识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以及人们求知的可能性处处都受到损害，如果一派利用它的权力来垄断它自己的概念，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并竭力压制其它任何的见解的话。不容怀疑，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主义者十分真诚地相信：他们完全掌握了真理，只是刚愎自用的偏执性格才使别人抱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必须同样认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那些人也是真心诚意的。人民群众中间的文化和教育的高涨肯定是在它的制度下受到了刺激。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然还不同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前者并不希望在这尘世上来改善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他们只希望保证他们的灵魂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苏维埃人则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方法从各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大大地降低人民群众的身分。此外，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的社会本能和感情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这些感情从个人同志们的狭隘的范围扩大到一般人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间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

可是这种"道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建立起来，所以托洛茨基说："同志们，我们有责任宣传、支持、发展和建立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那是我党在其一切活动部门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任务。"[9]

然而，托洛茨基是否真正相信你能花一夜工夫就把道德建立起来呢？那只能慢慢地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的鼓励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共产党人的道德在开始社会化以前没有形成，那么在剥夺资本以后再来加以发展，就未免太迟了。它该怎样发展呢？应该用宣传的办法。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道德的训诫中产生出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马克思主义者拿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训诫上面，他们就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怎样深深地陷进了死胡同里。可是事实上这种新的道德不但应该加以宣传，而且还应该加以支持。但仍旧要问，该怎样支持呢？"道德"是我们的生活和活动的产物。它从生活和活动取得它的养料和形式。斗争的无产阶级所发展的较高的道德依靠两个因素。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穷苦、最薄弱的成员，因而它只有通过最亲密的合作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个人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认为是最高尚的品质；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中，个人不择手段地损害群众的利益以发财致富。可是，如果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仅限于一个力求牺牲社会的其余成员以取得利益的狭小的圈子，如贵族、官僚或一个军官团，甚至这种感情也会产生直接反社会的效果。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提高到社会道德的水平的途径，是把这种精神扩大到全人类。团结一致精神的扩大是从这样一种自觉中产生的，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多年以前，青年的恩格斯便希望从人们对于这一事实的了解上找到提高无产阶级道德的最大的助力。他在所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10]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的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11]的重演。”[12]

恩格斯希望防止与此相类的崩溃，因此他劝告一切共产党人在着手工作时要消灭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待资产阶级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把人类的一般的利益放在首位。显而易见，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义和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完全不同。恩格斯所希望实现的事情，正就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现今正在争取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使未来工人运动的残忍和残暴行为成为“革命的动力”，从而压倒了它的社会敌子。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由于它降低了社会运动的价值，把人类的事业变成单纯工人的事业，并宣布权力仅仅归于工资收入者(以及乡间最穷苦的农民)；而且，它宣告要剥夺所有那些不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的权利，使他们落入最不幸的境地；最后，它还废除各种不同的阶级，而实际上把现在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阶级。因此，由于把那本来应该成为争取自由、争取提高全体人类的地位的社会斗争的运动变成了一种导致最可怕的凌辱和虐待的残暴与复仇的爆发，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败坏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而不是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剥夺剥夺者”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思想，而布尔什维主义由于把这二者截然分开，已经进一步败坏了道德。剥夺的过程立刻从对于生产资料的剥夺扩展到对于消费资料的剥夺。从这一步很容易走上抢劫的道路，像在斯青卡．拉辛的事迹中一向被人理想化的那样。

“群众已经毫无困难地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叫人不必斗争的消极纲领。布尔什维主义不再承认任何义务。你只要占据、攫取和剥夺你所能够弄到手的东西就行了，或者像列宁十分令人奇怪地说明的，你应当窃取曾经被窃取的东西。”[13]

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人纪念那位盗魁，这是符合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支持”并宣传了非此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共产主义道德。它只能意味着俄国

的无产阶级有更多的人在道德上日益斫丧。这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家们感到恐惧的一个特征，但他们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出它的原因，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要推翻他们的整个政治制度。他们到处拚命地寻找可以使群众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除了旧社会力图用以推卸自己罪责的那种卑鄙手段——法庭、监狱和处决——即恐怖主义以外，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冒失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什么也找不到。列宁在我们已经引述过几次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着作中写道：

“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纪律的工具。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决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暴力就能收效的，只有从各方面普遍地进行全民的组织工作，加强纪律，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在任何有关的事业部门或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提交法庭，严厉惩办。”[14]

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要用无情的惩罚硬把它所缺少的共产主义道德塞进自己的队伍，以便使自己成熟起来，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但道德却从来不是靠无情的惩罚可以提高的。相反地，那种道德的残余都已荡然无存了。从前，人们无法求得较高的道德和较好的生活条件，不知道除采用严厉的惩罚以外还可以采取什么办法，那时严厉的惩罚就成为旧制度的必然的弊害。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除利用严厉的审判程序以外竟找不到其它任何办法来启发无产阶级，使他们提高道德，这只能证明它自己的破产。

独裁

看来好象列宁本人也并不希望靠他自己的法庭来获得任何鼓励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对这种法庭提出他的要求以后,又立刻要求“给与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任何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共同工作的人们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随着音乐指挥者的灵巧的指挥一样。如果没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这种服从可以通过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15]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始终假定，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是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本人在我们刚才引述的那本书的开头说道：

“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主要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合作下，才能顺利实现。”在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不能依靠少数人而只能依靠人民大多数、不能专门依靠而只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大多数才能完成之后，在他承认这几点而违反自己的意志为民主制度作了辩护之后，他接着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

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然而，看来它的胜利是必须通过法庭和工厂首脑的独裁来保障的。

“革命刚刚粉碎了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使群众不再受束缚和鞭笞。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6]

既然群众分明还没有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他们昨天为自己赢得的自由就要在今天被剥夺掉。那本书在开头曾经指出，由于缺少这些品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后面，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又要求未成熟的群众“绝对服从”独裁的领导者。群众的地位将因此低于他们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占据的水平。因为在那个制度下，他们从属于资本，然而并不绝对服从。列宁说，这种独裁与旧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不同，它将由于工人群众和以前被剥削者的合作而成为可能，并将通过那些在结构上足以唤起群众以及依靠群众的积极努力来最后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的组织而成为可能；他说这番话，当然不过是想安慰他自己和公众罢了。据说苏维埃组织就是屈于这一类的组织。前面已经指出，排斥和压制任何种类的批评会怎样促进群众的觉悟和鼓励他们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苏维埃组织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什么改变。这种责成“群众绝对服从”的个人独裁的铁的形式，怎么能够通过那种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从事个人活动的办法求得实现呢？无论是谁，如果他必须由群众选出或罢免，或者必须由群众再度加以推选，就始终会依赖群众，因为他无法贯彻任何不受他们欢迎的事情。如果在那推选他出来的组织中有个别成员同多数人的意见相反，他当然可以想法打破他们的固执；但是，如果他违反多数人的意愿，想要强迫他们接受他自己的观念和命令，他就会立刻感到智穷力竭。因此个人独裁和民主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就苏维埃民主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列宁确实认为这些话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在他的论证中，激昂的情绪代替了力量，因为他只能回答说：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必须有国家，也就是承认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采用强迫手段。”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民主制度本身也并不排斥某种程度的强迫，但它所承认的唯一的一种强迫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工人对少数资本家的强迫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迫；但是在列宁本人提到的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已经粉碎了它的枷锁以后，情况就不是如此。这里是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群众所实行的强迫的问题。列宁不想指出这种形式的强迫是与民主制度绝不兼容的。他反而竭力想用一种魔术来使它们不发生矛盾，企图指出：既然广大群众必须对个别资本家实行强迫，以便实现社会主义，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同民主制度相一致，那么，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而可能采用的各种强迫形式就都是同民主制度相一致的，即使那些形式代表着一些个人的支配群众的绝对权力。他说道：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那也许是这样；不过它只是表明，苏维埃民主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主张任何形式的专断统治，只要他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就行了。如果要使一个企业里的工人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领导，那个领导就不应当由工人们选举产生，而只应该由某一个地位此他们高的权力加以委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的代表苏维埃就不应当有所主张。而且，任命这些独裁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就得具有独裁的权力，因此那些苏维埃就会变成徒有其名的组织，而由它们所代表的群众也将丧失一切实际的权力。一个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本身是没有能力选择它自己的独裁者的，但它却必须靠他被提升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如果他要求它作出那种需要“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行为，它必须屈从他的意志。这是工人阶级断然做不到的，正如闵肖森[17]不能用他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中救拔出来一样。哪里能够找到这些具有必要的精神力量以及高人一等的智力的独裁者呢？每一种专断的统治形式都带有掌权者本身贪污腐化的种子，不管那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还是一个小的派系。只有异乎寻常的性格才能始终避免有害的影响。我们是否要假定俄国的独裁者们是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人物呢？列宁断定他们是要经过审慎的选择的。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18]

他没有说明这个“我们”究竟指谁。显然不是无知的、没有修养的、忙乱的群众；比较可能的是较高的当局，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即使是这个机构也还没有学会正确选择工人群众的领导人的本领。它答应要学会这种不容易掌握的本领。没有说出确定的期限。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目前，这些领导人的选择工作是以一种十分难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们缺乏必要的资格，正如群众缺乏必要的成熟程度一样。

他们一直从事剥夺资本的工作，现今正在着手进行组织工作，在此以后，他们才觉得他们还必须首先开始学习——甚至学习怎样正确地选择国家经济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贪污腐化

什么样的成分正在暗中钻进那新的制度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复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胡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19]

毫无疑问，每一个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受到这种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德国也不能不感到这一点；但俄国苏维埃制度除此以外还表现了某些特有的性质。首先，我们的革新家决不像俄国的那样“还不老练”。那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前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所有努力向上的人都没有机会扩大眼界，更不必说参加国家和社会的行政管理工作，参加各种形式的高级组织和行政活动了。

革命者、特别是其中最急躁和最激烈的分子，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警察和秘密阴谋的斗争上面。当他们突然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他们还不老练。但是这种缺乏经验的情况代表一个特征，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负有指引道路责任的革新家越是缺少经验，就越是不能由无知的、没有修养的群众来实行社会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群众及其领导人的民主教育和训练，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可能从专制制度一步跳进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苏维埃制度和早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区别还在于：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这些讨厌的分子因而可以不受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一切批评。他们只须应付无知的工人和士兵，以及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于是他们就一帆风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当然已经开始在学习怎样区别小麦和麸皮，怎样辨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骗子与坏蛋。但是在他们“学会”这一点以前，由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状态，生产早已发生问题，甚至有完全趋于停顿的危险。他们把阻止这种奇灾大祸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领导人员的独裁上面，但他们必须在无法作适当选择的情况下给予这些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因此这种从一开头就容易受到很多批评的独裁只会起有害的作用。正如他们首先滥行剥夺资本，然后才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一样；他们现在指派独裁者，以后才想法学会正确选择那些独裁者的方法。只要他们不联系实际情况而贸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这种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维埃制度之所以面临危险，还不仅是由于它无法正确地加以审查和判断的“野心家和骗子”的入侵。它还面临着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危险，因为它疏远那些具有最高尚的品德并在学问上居于最杰出的人们之列的人员。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合作，社会主义在目前的生产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社会主义还处在宣传阶段，只要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前途的任务和义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就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分子——无论这些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受过多方面的教育的人们，还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刻苦自学的人们。但它只是需要他们来实行和推广它的理论。这里不是量的问题而单纯是质的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们处在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的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可靠的有本事的人员的帮助，就不能存在，同样地，由工人阶级所控制的社会生产和国家制度也同样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或反对这种帮助，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实际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发展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否抱有誓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热诚是无关紧

要的。顶顶必要的是，他们至少有一大部分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有人希望合作，就不必牺牲这份知识力量。假如说在体力劳动方面采取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不可能改进生产，则在脑力工作方面情况就更其如此。

消除知识界对于实际推行社会主义的疑虑，知识分子愿意在必要的权力产生时共同合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以获得进步(即使不是宜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时机)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其它必要条件越是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重要意义就越是明显；所以，有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一认识之后，没有偏见的知识阶级就会相信承社会主义是十分合理的。

布尔什维克起初并没有认识到知识阶级的重要性。既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士兵、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盲目热情，广大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头就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敌意，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到俄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宜实行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立即社会化的方针。他们并没有多费心思去考虑“知识分子”会受到什么待遇。比如说，一个属于这个阶级的人会从工人想要单独掌管的工厂里排除出去。他被剥削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因为工人苏维埃的权威方面只把选举仅给予体力劳动者。只要他有财产，他便遭到剥夺，并丧失了他的过优雅生活的一切手段。他甚至后来被判定要从事强迫劳动，死于饥饿。

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沙皇制度就认为一位将军即使没有取得任何特殊的资格或受过任何特殊的教育，也能充任国家的每一种职位。除了其它许多观念以外，苏维埃共和国也从沙皇制度承接了这个观念；不过他们把无产阶级代替了将军罢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论家把这个办法称为“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行动”。如果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半瓶醋的知识”，可能更恰当些。

苏维埃共和国听任自己受单纯本能的指导，而不去认真地深入研究实际的情况，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因此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孩子掉进井里去之后，他们所发现的必要措施是把井掩盖起来，于是他们就想这样做了。他们曾力图使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一个时期那样从事强迫劳动，而确实去做一些他们所了解的并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因此为政府服务的知识阶级便不再算作资产阶级，也不再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和虐待。他们由于从事“生产性的”和“有益的”工作而在“积极和工作的”人们的圈子里出头露面。他们可以不受剥夺，并且领取适当的薪金。既然迫使这些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的是对于虐待的恐惧，而不是心悦诚服的觉悟，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既不是很有生产性的又不是很有用的，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前面引述过的《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中便对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说：

“反对(知识分子的)捣蛋的斗争的第一个时期是无情地摧毁捣蛋者的组织。那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有所保证的时期，这个反对捣蛋者的斗争就必须采取把昨天的捣蛋者变成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形式，如果新政权有此需要的

话。”

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的“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踏在脚底下。他自己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

“我们已经摧毁了以前的各种各样捣蛋的行为，并且用一把铁箒扫除了旧的官吏。代替这些旧官吏的人们在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看来都决不是头等的人才。一方面，已经出缺的职位由各党各派的同志们充任，他们做过大大小小的艰苦工作，在革命中间受过锻炼。他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员、战士、可敬的人们、不求私利的人们。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一批找财路的人们，他们在旧政权底下一向是社会上的失意者，可以说是无业游民。因此，当我们有必要一下子吸收成千成万刚经过审查的工作人员时，难免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能够钻进新政权里来。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今在各个不同岗位和机关工作的许多社会主义同志们，并没有表明自己经常能够组织创造性的、精力旺盛的劳动。我们可以看一看行政机关的这种同志们、特别是十月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的这种同志们的态度，他们每天做四、五个钟头工作，并且工作也不很紧张，而我们的整个形势却要求人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而不是出于畏惧心理来从事最奋发的劳动。”

如果争取知识阶级的政策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既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上述情况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的、虽然决不是适当的后果。

所策划的另一种手段是增加积极的工作人员的物质供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减低了国家公务人员的报酬，规定最高薪给为六千法郎。苏维埃共和国也想这样办；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采用旧的方法。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20]

列宁表示说没有其它的办法，他的这种话是完全正确的。提高薪给的必要性可能是由两种原因产生的。企业的规模愈大，工人的人数愈多。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企业所交付的总价值的数量就具有大得多的意义。如果工人每天生产的价值等于五先令，雇有一百工人的企业将每天生产五百先令的价值，而雇有一千工人的企业就将每天生产五千先令的价值。企业的规模愈大，组织和领导的工作就愈加困难，在其组织方面也就愈不容易产生必要的效率。但是厂主可以用来雇用具有这种特别才干的人员的资财也就愈加充足。所以，这些大工业部门越是增多，它们的领导人的薪给就愈高，最后达到了极大的数额。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如果它不相应地提高它的高级公务人员的薪金，它就一定要准备看到私营企业把他们吸引过去——只要他们确实干练，不是什么尸餐素位的人。这样，国家行政部门就会变得虚弱无力，而这也就是同家的经济无法同私营企业竞争的原因之一。

当公社已经成立，当工业在公社领导下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向前发展而不是变成有

可能实现的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维持这种把工资固定在六千法郎的制度，那是值得怀疑的。四月二日公布的法令表现了那时巴黎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它也证明了公社成员的廉洁无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财政部长茹尔德的著名的例子。可是，由苏俄的繁荣而强大的私营工业所产生的竞争，不可能促使技术最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得到提高，因为这种工业不是受到剥夺和摧残，便是使私方厂主丧失其一切价值。高工资只能有一个目的。人们指望用它来克服知识分子中间最能干的一部分人内心隐藏着的不肯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的心理，同时引起他们对新政权发生兴趣。

既然提高人民的觉悟的办法不发生效力，既然饥饿的鞭挞得不到任何可惊的效果，剩下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收买人民，即供给他们至少相当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受的那种物质待遇。我们现在看到，将要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生产的领导人的是些什么成分。一方面是少数老的密谋起义者、心地纯洁的可敬的战士，但在业务上只是并不老练的革新家，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违反自己的信仰，或者作为力求适应新政权的单纯的谋职者，正如他们遇有机会也会适应其它任何政权一样，或者为恐惧、饥饿和惩罚所逼，勉强为政府服务；或者甘心受高工资收买。像托洛茨基所承认的，他们决不是头等人物。而且，即使他们有点学识，也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中最出色、最优秀的一类。在他们中间，既有坚强性格又有业务知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现在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独裁的权力已经被交托在这些人的手里。这是工人们必须顺从地承认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会使最好的人受到腐蚀。在这一方面，权力还往往交给那些从一开头就贪污腐化的人们。

在普遍困苦和普遍剥夺声中，他们把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聚集在自己的手里。当然，商品生产在进行着，并且也非进行不可；因为被当作民营事业的农业活动事实上代表着商品生产，影响着全部的生活。由于这个缘故，农村可供出卖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少。苏维埃共和国把一个村庄的全部权力交给贫农，这些人只有很少一点土地，生产不出剩余的粮食。于是就必须无偿地征发富裕农民的一切剩余商品，交由国家粮仓支配。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只能成功一次，因为到了第二年，富裕农民就会打好算盘，将产量限制在他们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样，农业的报酬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不论农民生产多少剩余产品，他们都把它隐藏起来，只偷偷地把它卖给投机商人。

与此同时，工业也趋于停顿。因此政府的开支就只能靠发行新纸币来弥补。于是，正像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也正像在目前的德国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严重)，投机商人、奸商和走私者的活动十分猖獗。从前他们是被送上断头台的。今天的方式是把他们枪毙。但终于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唯一的结果是：在目前，正如在一七九三年一样，骗子手们由此而获得的资本的不可靠性以及新的独裁者所需索的贿赂的数量都有所增长，因为，如果有个冒失鬼偶然落进那些独裁者的罗网，他们就可以拿到贿赂。即使是这种钱财，又成为聚敛新的财产的新的基础。

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俄国新官僚政治的这种贿赂风气，他应当读一读加弗隆斯基的《俄

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在这本书的第五十八页及以后几页里，充满着有关贿赂和贪污的记载。

该怎样压抑工人群众要对之俯首帖耳地屈从的这些新的“独裁者”呢？像在“启发”群众的道德的努力中一样，苏俄政府不知道除用法庭来恫吓以外，还有其它“启发”它的领导人的道德的办法。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应当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独裁之上，那么法庭的独裁又将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之上。

苏俄已经组成了——系列举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一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一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可是非常不幸，这种即决裁判手续没有效果。

这些非常委贝会是革命清洗工作的最后希望，当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真诚战士知道这些委员会本身也是贪污腐化的时候，他们往往万分愤慨。加弗隆斯基在他那本书的第六十一页上引述了非常委员会周报的下列呼声：

“四面八方传来消息，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真正的罪犯，正在想方设法钻进委员会里来，特别是钻进各个地区的委员会里来。”加弗隆斯基还在第六十二页上提到一些人，这些人已经表明，那种钻进去的企图不仅见诸行动，而且多半获得成功。所以革命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劳动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各个地方苏维埃已经千真万确地处在特殊和非常苏维埃的恐怖统治之下。当然，选拔工作是做过的。在各个苏维埃里，还留有一批比较正派的人员，但在各个非常委员会里，却是一伙伙准备干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因此，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用社会主义来革新人类的纲领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两三个心地纯洁的人士在日益严重的无知、贪污和自暴自弃的泥淖中挣扎着，这种泥淖越来越扩大，最后非使他们陷进深处并惨遭没项不可。”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西方的许多革命家扬扬得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还大权在握，并且，甚至在我撰写这几行文章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五月)，它显然从表面上看来还是完整的；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批评家在它统治之初便预言它不久必将崩溃。如果布尔什维克严格按照他们的纲领办事，这种崩溃早就实际发生了，他们由于接二连三地抛弃了他们的纲领的某些部分，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因此他们最后实现的事情与原定的目标完全相反。例如，为了攫取政权，他们

一古脑儿抛弃了自己的民主原则。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走民主原则的道路。他们已经作为一些个人而站稳脚跟；但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俄国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只须看一看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一经应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就必然如此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

让我们现在扼要地叙述一下发展的情形。我们在今天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看到一种建立在无限私有制和最充分的生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农民。这些农民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同城市的各项工业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既然这些工业不能为鄙野的乡村生产剩余的商品，自愿地和完全合法地把农产品运进城市的现象就越来越受到妨碍。为了补偿起见，已经采用了征发、即无偿地掠夺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借助于非法的走私，这种行动终于把过去一个时期城市所积累的工业产品一扫而空。

在破坏了大的庄园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农民不再有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因为那些工人并不工作，不能提供农业所需的商品；他们也憎恨执政的有力人物，因为这些人派遣军队到农村去征发物资；他们也瞧不起城市的投机商和走私者，因为这些人竭力用种种骗人的交易方法把各种各类剩余的商品奇货可居地兜售给农民。

除掉在全国各处可以看到的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的情形而外，在各个城市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的形式；不过它力图废除阶级的差别。它从侮辱和摧残上层阶级入手，因此它事实上有最后变成一种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它实际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最下层的一级包括资产阶级、资本家、中小阶级以及所谓知识分子，如果后者表示任何反对的话。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丧失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常常不得不去干那种最讨厌的强迫劳动，而他们所得的酬报则是完全可以称为最恶劣的饥饿口粮、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挨饿口粮的那种食物配给。这种类似地狱的奴役状态只能同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最可怕的极端行动相比拟。而这种局势的产生乃是布尔什维克的最有代表性的别出心裁的行动。它代表着他们走向解放人类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在这最低阶级之上的是以领取工资的工人为代表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享有政治权利。根据宪法的明文规定，只有它才享有在城市投票选举的权利；并且它也享有出版方面的充分自由，以及将其成员组成联合团体的权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凭自己所选择的工作取得十分优厚的报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过去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过不多久，事情越来越明显：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一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自然，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本身的反对，而且这种反

对变得格外强烈，因为由于工业和运输方面的普遍衰落以及乡村对城市的日益疏远，粮食问题越来越无法解决，即使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他们也同样受到影响。所以工人一批接一批地对于布尔什维克丧失了热情。可是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

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裁权力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独裁权力，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是：以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由他们任命的人员以及一种硬性规定的新式官僚系统的成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在共产主义老的理想家和战士的领导下组成的。

旧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独裁已经以一种新的但据我们看来决不是有所改进的形式复活了，除这种专制独裁以外，还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应该对真正的犯罪行为负责的，并且事实上此旧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水平要低得多。现在不再存在的只是旧式的封建庄园制。废除俄国封建庄园制的条件早已成熟了，但废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却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带有走私、谋取暴利、银钱投机等最恶劣、最腐朽的形式，以代替较高的生产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现在已经从私人的体系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从前，政府的官僚和私人资本的官僚即使不是直接对立，也往往是互相挑剔的。结果，工人有时可以利用一方，有时可以利用另一方。可是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合并成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结果。它代表着俄国历史上有过的一切专制形式中最暴虐的形式。为“剥夺剥夺者”这一运动服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以专制统治代替了民主政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统治。于是后者的这种统治终于能够使工人的民主完全成为一纸具文，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迫此过去任何时候更在经济上处于从属的地位。

而且，这种自由的丧失并不因繁荣的增加而得到补偿。当然，新的经济独裁所起的作用，比在此以前的势必导致急剧崩溃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来得好些。这个结局只是被独裁的统治推迟了，因为从经济上看，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发生作用的。

这个新组织的作用之如何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可以从交通人民委员克拉辛先生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下列呼声中得到证实。他的声明如下：

(1)现有的铁道管理制度连同五年战争所造成的其它客观困难已使交通运输事业彻底破产，无论何种运输都有完全陷于停顿的危险。

(2)它的崩溃不仅是由于错误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仅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的减低，而且还由于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经常改变。

(3)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恢复运输系统，至少使最低限额的口粮配给和工业的需要与要求得到满足。这项任务只有依靠十分果断地结合和调动铁道系统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这一办法才能担当起来。

(4)这个工作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进行，否则我们将眼看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

(5)集体管理事实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必须建立个人负责管理的原则和提高责任感，以代替集体管理的形式。每一个人，从勤杂人员到管理部的成员为止，必须正确无误地、毫无偏差地执行对他的全部指示。一切的改革必须停止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维持旧的人员，不予变动，在中心及其一切分支部门的原有技术设备必须加以恢复和维持原状。

(6)有必要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苏俄的一切政府官吏中，克拉辛表现了用一种由经验得来的英明的科学方法进行组织工作的杰出才干。铁路工人看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早在沙皇统治时代，它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常表现出巨大智能的良好组织。可是尽管有这一切，目前的情况却是如此!

这个声明清楚地表明了，那种贫困的状况并不像一般人所主张的那样应该单纯由战争的后果负责。战争的后果不过是加剧了紧张的程度罢了。看来要葬送革命的一切成就的，是现存关系的不成熟状态。为了拯救革命，似乎绝对有必要抛弃改革，恢复旧的局面，把旧的机构放在原来的地位——换句话说，要取消铁道系统的革命，以便拯救革命的人们。十分自然，这个法令也像过去其它任何法令一样，将很少能够改变执行法令的人员。

像旧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经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旧的资本主义并不单纯产生这些掘墓人；它还给与这些人以力量和生产能力，使他们把新的生命注入垂死的躯体。

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只会危害现有的生产力。它的“掘墓人”将无法创造某种较高的生活方式，而不得不重新开始过那正在出现的野蛮的生活方式。这种制度用训练有素的盲目服从的军队这类强有力的暴力手段求加以维持，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并且甚至在作这个决定时，他们的希望自身得救的原则也不得不遭到失败。他们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他们作为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以瓦解军队的先驱而获得政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起，那些可以随意任命军官以及仅仅服从自己所愿服从的人们的士兵代表苏维埃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策。他们打算用这个方法掌握一切权力。可是在采取了这一步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布尔什维克遇到公开的反对时，他们立刻需要一支军队来进行斗争：一支愿意服从任何命令的军队，而不是一支正在瓦解的或者各个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作战行动的军队。起初，热情似乎顺利地代替了单纯的盲目服从，但是，当工人的热情开始衰退，当志願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当个别的几师軍队开始不受节制时，該怎么办呢?在工业方面，经营管理的民主制要求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一定程度的成熟发展。从本质上说，民主制度应当出现在一支需要加以充分发展使之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军队之中。战争历来总是民主制的坟墓；即使是内战，如果它继续进行了一个时期，也总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对内战负责，并且也必然要对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废除负责。由于制造种种困难来阻挠新的选举，由于排除了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力量，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已把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变成名存实亡的组织。可是它已经

剥夺了这些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一切最重要的职能，甚至剥夺了他们的选举自己的军官的权利。像旧时代一样，军官现在是由政府任命；同时因为志愿参军的人数不足，他们已经采用了义务兵役制，像布尔什维主义存在以前的时代那样。这就形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的另一根源。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它也使得军队的扩充成为当务之急。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的事情相当流行，对他们惩罚的办法是大批判处死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以一个在俄国亲眼目睹的人的观察为依据的十分同情布尔什维主义的报道。这篇题目叫做《共产主义的原则及其应用》的文章在末尾有这样一段话："红军是协约国造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一再宣布它的反黩武主义的态度。爱好和平的人们今天厌恶战争，正如他们在昨天和过去的任何时期都厌恶战争一样。他们正在竭力反对征兵——红军中开小差的事件像从前沙皇军队中一样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团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因为一切有关的人员都已逃走了。"

红军的这种态度十分稀奇古怪地表达了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热诚。即使我们只是限于说明事实，没有给与这些事实以辩解的基础，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在军事方面，旧的沙皇制度的种种情形已经恢复，不过所表现的形式比以前格外恶劣罢了；因为这种新式的黩武主义无疑地正在比旧的发挥出大得多的活动能力，虽然它宣布了反黩武主义的纪律。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铺平道路的情形正在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最后决不会成为俄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由于领导了法国的胜利旗帜席卷欧洲整个大陆，获得了法国人民的拥戴。表明革命的原则是征服欧洲，这使有些人感到满意。因为当时法国军队正在掠夺整个欧洲，他们的战利品正在使法国富裕起来，也许还有许多人格外感到满意。但俄国现在是采取守势。可以遏制入侵军队的同样的运输困难，使得俄国不能让它自己的军队顺利地通过边境。列宁也未尝不想把他的革命的旗帜胜利地插遍欧洲，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黩武主义不会使俄国富裕起来。它只会变成贫困的新的根源。目前，俄国的工业就其已经开工的部分来说，是为了军队而不是为了任何生产的目的工作的。事实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变成一种"兵营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在经济上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失败最后归结为军事的崩溃，那只会把真相掩盖起来。任何世界革命和任何外援都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经济上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相反，欧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即：它力求使社会主义某一方法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灾难不致引起整个社会主义的灾难；而且，它力图在这些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划清界线，使群众了解这种区别。如果一家激进社会党的报刊向群众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使他们相信现在的这种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它公然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万能旗帜下大模大样地活动因而便是确实在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家报刊真正认为自己是在通过这种行动为社会革命的利益服务，那么它一定是没有懂得什么叫社会革命的利益。

恐怖

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发展，当然并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愿而发生的。恰恰相反，它实际上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他们也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止它的发展。但结果他们还是不得不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从一开头就竭力避免的那种办法，即求助于不是极轻微的批评所能影响的少数独裁者的专横势力。恐怖统治这样就成为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的结果。这是它想避免它自己的方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

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负有责任的一些现象中，从废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开始到实行大批处死的办法为止的恐怖主义，当然是最触目惊心的和令人厌恶的一种。它是引起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深恶痛绝的原因。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他们的悲惨的命运而不是错误——如果在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如此巨大的历史变动中可以允许我们谈到错误或过失的话。无论如何，任何错误或过失归根到柢只能是属于个人的。不管是谁，如果他要讨论罪责的问题，就必须着手考察个别人的向某些道德律的挑战行为；因为“意志”一词按照最严格的意义来理解，只能是个别人的意志。一个群众、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事实上并不会表示任何意愿。它缺少表达意愿的必要的能力。因此它是不会犯罪的。一群人或一个组织能够采取共同的行动。然而，每一个实际有关的人的动机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确定罪责的问题上，成为决定因素的是动机。

布尔什维克的动机当然是最好的。从他们开始掌握无上的权力起，他们就看起来充满着人类的理想，而那些理想是起源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种种条件的。他们的第一道法令是有关废除死刑的法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的罪责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恰恰在他们公布这项法令的时候，他们的罪愆就暴露出来了，那时他们为了取得政权，决定牺牲他们长年累月以百折不回的决心加以争取的民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们的罪愆也在这种时候暴露出来，那时他们像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一样，不顾俄国的落后状态，宣布“立即彻底地解放工人阶级”；并且，既然民主制度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抱着上述的目的，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这里就是可以寻找他们的罪愆的地方。从他们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他们便不能不采用恐怖手段。不用暴力而建立一个和平的但又是真正的独裁统治的想法，乃是一种幻想。

恐怖主义的工具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二者都开展了同所谓军事讨伐毫不相干的可怕工作，受害的人数不可胜计。遭到非常委员会荼毒的人究有多少，恐怕永远不容易肯定。无论如何，他们的总数一定有好几千人。最低的估计数字是六千；有些人估计要加一倍，另一些人认为要加两倍；而远超过这些数目的，是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或者虐待和拷打致死的无数的人们。

为布尔什维主义申辩的人们在辩护时指出，他们的反对者，即芬兰的自卫军、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反革命的陆海军将领的行为也未必高明。可是，指出别人也在愉窃，难道

就能为盗窃的行为辩解吗？无论如何，假如这些其它的人为了要维持他们的权力而蓄意草菅人命的话，他们并不违反自己的原则；但布尔什维克则多半可以肯定是违反自己的原则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便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公开宣布的有关人类生命尊严的原则，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原则才能取得政权并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理论根据的。我们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同样反对这些贵族和将军，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吗？也许有人认为所抱的目的使情况有所不同；认为较高的目的可以使不正当的手段也成为正当的手段，而在单纯追求权力的人的方面，则由于其目的不纯，手段也就变成可耻的和不正当的了。但是正当的目的并不能够证明任何的手段都是无可指摘的，而只能肯定那种与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同目的相反的手段并不会由于目的正当而变成正当的手段。如果人们牺牲那种给与生命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他们便很难保卫自己的生命；同样地，如果人们放弃原则，他们便很难谈得上保卫自己的原则。良好的意图可能会原谅那些求助于错误手段的人们；但是这些手段却始终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手段越是错误，它们可能造成的损害愈大。

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的目的也决不是无可反对的。它的当前的企图是要保存它所建立的政权的黩武的官僚机构；但多半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反对那种在官僚机构内部所表现出来的贪污腐化现象，他们才能保存那个机构。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真理报》上，杜克尔斯基教授坚决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应当清洗所有那些与共产主义革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罪恶目的才利用共产主义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于是答复说：

“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21]

枪毙——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能。可是，难道列宁本人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帮他进行斗争来反对坏蛋和野心家吗？当然他是这样号召的；但他没有给他们唯一有效的手段、即出版自由。

只有报刊所行使的在各方面不受拘束和妨碍的监督，才能打击那些必然紧抓住任何拥有无限权力而随意自由行动的政府不放的坏蛋和野心家。事实上，这些寄生虫往往是在缺少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更加猖獗起来的。

现今的俄国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里。在目前的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污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

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法庭拥有甚至在那个时候前所未闻的专断权力。顾全被告权利的保证

达到最低限度。然而，那时的法庭还至少是公开发挥作用的，所以人们可以对它的活动实行某种监督。可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非常委员会却采取秘密审议的办法，被告的合法权利是没有丝毫保障的。被告并非绝对需要受审，更不必说是传讯他的证人了。只要有人告发，只要有一点嫌疑，就足以使他脑袋搬家。

这个祸害波及的范围很广，以致大有非废除不可之势。因此当局作出决定，规定这些委员会非经审讯不得再行执行死刑。可是，虐政是独裁统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不同时废除独裁，就不可能废除虐政。因此，这项法令由于规定一个例外，即如遇“明显反革命阴谋”时得容许就地正法，便自行宣告无效。这样自然就为各种专断的处决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即使这项决定能在适当范围内获得遵守，它也只会保护盗贼和坏蛋而不会保护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因为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出现，政府机关才需要清洗的。这样的清洗工作如果不是对付反革命，又是对付什么的呢？稍微有一点不满的表示，就会像任何坏事那样受到严厉的对待。任何的反措施都不会使这种威胁烟消云散，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真诚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们同样发生兴趣的。他们在挑剔苏维埃制度方面携手合作。因此根本谈不到有什么修正。例如，就在最近，“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作了如下的宣告：

“最近爆发的一系列叛乱证明了，克拉斯诺夫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左翼孟什维克分子所获得的荣誉，并没行使他们停止活动。他们一心想要暗中伤害我们的军队(布里安斯克、萨马拉利斯摩棱斯克)，破坏我们的工业(彼得格勒和土拉)，并通过铁路罢工来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全俄非常委员会’兹宣布：以后将不再区别克拉斯诺夫军队中的自卫军和属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分子的自卫军。非常委员会将以同样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任何一方。我们所逮捕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将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他们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这两派的态度。”——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22]

因此，由于军队中存在着明显的分崩离析的迹象，由于产业工人和铁道雇员中间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非常委员会就要把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人物逮捕起来，以便在发现无产阶级再有丝毫反对的迹象时立即把那些人就地枪决。镇压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企图用以使大规模执行枪决这一愚不可及的手段在俄国成为正当手段的崇高目的。它决不可能把经济的失败变成一种胜利。它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俄国的广大群众可能不会像过去全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理解第二巴黎公社的复灭那样来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复灭；布尔什维主义的复灭毋宁说是会像法国全体人民所理解的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罗伯斯比尔的复灭，也就是说，会被看作是救民于水火，而决不是令人深戚痛苦和悲哀的失败。

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列宁的政府面临着另一个热月九日的危险，但危险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产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一个政府如果抱有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以两种方式垮台。如果它

坚持自己的纲领，它会终于被人推翻，连同那个纲领一起冰消瓦解。但如果它把自己的纲领作相应的修改，最后完全加以放弃，它就可以保全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事情的本身来说，都将导致失败。可是，对于那些有关人士而言，他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还是要像在敌人的忿怒下被打倒的偶像那样听凭别人摆布，乃是有很大区别的。

罗伯斯此尔在热月九日垮台了，但并非所有的雅各宾派都遭到他同样的命运。由于能够明智地适应环境，他们有很多人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拿破仑本人原先也是属于恐怖分子一伙的，并且还是罗伯斯此尔的弟弟的一个朋友。他们的姊妹后来说，“波拿巴是一个共和党人。我甚至还可以说他那时是站在‘山岳派’一边的。他对我哥哥的赞美，他同我弟弟的友谊，也许还有他对我的不幸遭遇所表示的同情，使我能向执政府领取三千六百法郎的津贴。”[23]

可是不仅仅是个人。整个的党派也能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可以不仅平安无事地、而且威信更高地从一个脆弱的地位上摆脱出来。俄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也并不是不可能同样改变布尔什维克的性质，保全他们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他们已经在改变了。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着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当以前俄国的国家生活中正在抛弃民主原则时，他们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热心拥护者，但他们现在却正在利用个人的独裁日益压制这种民主。他们以前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现在却正在恢复这种制度。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一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一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一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与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利。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法国从军记者吕多维克．挪多最近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同列宁的谈话，后者除抒述了其它的意见以外，还这样地说明了他对资本的友好态度：

“我们很愿意提出：我们一定承认我们的外债并支付利息；由于我们缺乏其它的支付手段，这种付款将采取交付小麦、石油和其他各种原料的形式，一旦我们俄国的工作充分开展起来，这些东西无疑是有大量剩余的。我们也已经决定想根据我们的合同——当然这类合同

必须首先得到外交上的批准——给与协约国的公民以开发森林和矿山的权利，这自然要看对方是否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基础的情况而定。我们知道，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正在竭力争取这种权利。”

访问录并不是绝对可以凭信的文件，可是我们上交谈起的对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看法，也由研究俄国问题的其它负责的记者所证实。布尔什维克看来对于实际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因为，如果他们准备把俄国的一部分租给外国资本家八十年，那个纲领就要推迟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立即解放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段来说，现在已经失败了。现今有待揭晓的问题是：是否列宁的政府会以一利隐蔽的方式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破产，从而力求维持它的地位；还是一股反革命的势力将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并用一种十分残暴的方式来宣布它的破产。我们自己倒是情愿看到前一种的局面，即布尔什维主义会再度自觉地把自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基础上，相信各个自然发展阶段是不能越过的。这将是痛苦最少，同时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也最有好处。可是，十分不幸，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因袭的罪恶一向在于通过一种政体、即独裁来扼杀民主，而独裁如果不代表一个人的或紧密勾结的一小撮人的无限的专制权力，便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对待独裁。德国有些人受到俄国方法的影响，正在玩弄独裁的计划，而不去细心深究它必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人应当牢牢记住上面那句话。如果掌握了国家政权，要开始实行独裁，就像发动一次战争那么容易。但是一经采取了这种步骤，无论哪一种都很难随意加以阻止。你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不是取得胜利，便是以惨败收场。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理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当它不准报刊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显然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拥护时，他们对它的政体产生了怀疑。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想法保护出版自由和召开国民议会呢？某些布尔什维克说过，他们既不怕出版自由，也不怕国民议会。那末为什么他们不扶植它们呢？为什么他们轻视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如果用之得当，必将有助于大大地增加他们的精神力量以及别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呢？在前面提到的布哈林所着《共产党人的纲领》一书的序言中有下列这段话；

“考茨基和他的一伙人想要强加在一次革命上面的条件似乎是：革命当然有权向资产阶级发号施令，但同时它要保证给与资产阶级以种种便利，不论是通过出版自由还是通过国民议会，来宣扬它的怨言。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如果不理会正义是否在他的一边，而只是盘算他是否能对他正在寻找的某一个人提出谴责，那么他的这种卓越的建议在抽象地加以考虑的时候也许是很可以实行而不致损害革命的。但是革命意味着一场内战，那些必须用大炮和机枪进行战斗的阶级很容易抛弃这种荷马式的论争。革命从来不同它的敌人一起讨论问题。它消灭他们，反革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双方都完全能够承受这样的指责：它们漠视了德意

志帝国议会的规定。”

这种为屠杀作辩护和怎样对待反革命的言论，同作者在前几页关于革命的见解相比较，就显得格外高不可攀了：

“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第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结果只会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一个为劳动群众谋福利的制度。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国家至少要花一代的时间。这个时期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继续粉碎资本家阶级而另一方面又能自动援助其它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时期”(第 18 页)。

这就是说，革命和内战具有同样的意义，它等于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此毫不饶恕，一方总想打倒另一方，即使这还不能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这个愉快的过程必须“至少继续一代”。这种用机枪和毒气弹进行的带有严重毁灭性的内战，比从前三十年战争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一定还要惨重，它使人民十成中死去一成，使他们的蛮横心理发展成为最疯狂的残暴行为，并彻底堵塞一切生产的来源——这种战争事实上就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所代表的较高生活方式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卓越的想法，当然不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而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暴动和革命是同义词，如果这种革命采取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内战的形式，他就确实会丧失他的健康和生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正确的。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谁要是抛弃民主，谁就必须准备内战，反过来也是这样。他只能避开独裁，因为在独裁制度下，他必须对付那些完全绝望和冷淡的人民，并且独裁制度本来就是缺乏那种可以用来建造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基础的。

因为我们只有在民主和内战之间作出抉择，我自己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主义看来不可能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如果大部分人拒绝社会主义，那么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就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却论证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办法才能推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独裁和内战才能办到。布尔什维主义自感在人民中间占据少数，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它如此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尽管它相信民主制度不会“损害革命”。如果它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它就毋需丢弃民主，即使它确实以为动用大炮和机枪的战斗是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它有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作为后盾，这个斗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就此较容易进行，正像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巴黎人所做过的那样。可是这样一个国民议会是不会支持它的。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处在可以左右工人、士兵和一大部分农民的高峰，然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敢要求实行普选。他们不是解散国民议会并进行新的选举，而是单纯地把它打碎了事。从那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声与日俱增。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徒对于各种非官方的报刊所表现的越来越胆小害怕的心情，以及把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排斥于苏维埃范围之外的做法，表明了向恐怖统治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独裁制度而逐渐恢复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所有这种努力至今都很快地成了泡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准备尽可能地向官僚主义、黩武主义和资本主义让步，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民主制度让步，那就等于自杀。可是事实上却只有这样做才能结束内战，

才有可能领导俄国重新走上导向某种较高生活方式的繁荣富强的道路。如果没有民主，俄国就会四分五裂；可是通过民主，无产阶级也会彻底崩溃。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它未必一定是另一个热月九日，但我耽心它会和热月九日没有多大出入。

世界革命的前途

布尔什维克自己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似乎没有很大信心。然而他们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俄罗斯不再是革命的选民，那么世界革命就一定是拯救俄罗斯人民的救世主。但是这个世界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格外激烈，因此社会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唤起全世界的人民，随着它的发展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过程，即一切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否则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能够拯救革命。而且，这将意味着到处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的权利。这将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从而使全世界普遍燃起内战的火焰，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代中不会熄灭。

人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宣传来要求达到这样的结果。引起一场像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决不是他们能够办到的。但是如果他们得心应手，当然也能对西欧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危害到另一种意义下的世界革命。因为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掀起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头就是党派纷争的产物，并且经过一番同本国其它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才取得了政权，因此竭力利用那种变成兄弟阋墙的内战来在俄国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作为取得绝对统治权的最后手段，它还力图分裂至今保持团结一致的其它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们证明并不具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多数。第三国际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实行世界革命。可是，这并不是一时的任性或单纯的恶意的结果，而是从布尔什维主义自身的本质中产生的。那种本质同西欧已经为之完成了开拓工作的较高的生活方式是水火不兼容的。

在西欧，民主不像在俄国那样是明日黄花。它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排除了重重困难而向前发展；它是赓续几百年的斗争的结果。它已经被吸收到群众的血肉中去。因此，要剥夺任何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法国，农民是一股十分小心地照顾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谁也不敢加以嘲弄的势力。而且，法国、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惯于进行斗争的阶级。俄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不及西欧的无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本身在帝俄时代还格外软弱得无可比拟。在俄国，正如在其它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独裁政府当政的国家一样，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盲目地相信自己可以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所处的不幸状态。国家政权的垮台，军事“保护墙”的坍倒，

国家的一切权力之落入无产阶级手中，所有这些使得一向不惯于从事积极政治斗争的资产阶级惊惶失措，终于完全瓦解，拱手把地盘让给它的敌手。

在西欧，由于持续了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下层阶级不仅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上层阶级。这些上层阶级已经逐渐尊重无产阶级；并且它们已经掌握了在适当时刻实行让步以应付任何攻击的方法，从而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盎格鲁一萨克逊族的国家，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必须不用任何强大的常备军而过着独立的生活。它在同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相处的过程中已经知道怎样来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它在面临任何危险的时候是不会轻易逃走的。在这次战争中获胜的，正是这些国家。

这次战争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军队崩溃，像同盟国和俄国那样。在东欧，在军队瓦解的时候，始终是士兵代表了反叛的力量，不管那些士兵原来出生于哪一个阶级。但是这股促成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起一种使薄弱的革命因素过早地掌握政权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面临一些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战胜的国家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在那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下变得十分强大，可以压倒其它的政党时，它才会为自己取得国家政权。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它没有丝毫理由要放弃民主；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中最高和最优秀的一层是决不会愿意接受独裁来代替民主的。他们知道，所谓独裁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裁。可以肯定，在目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声势很大；但他们之所以奋然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他们本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挤垮外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罢了。

还有许多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对俄国是合适的；但他们不打算介绍这些方法，原封不动地在法国搬用。然而，即使在这里，布朗基主义的暴动传统和蒲鲁东主义的反议会制度传统也没有完全根绝。这两股敌对的力量通过它们在工团主义中某种奇怪的溶合，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可能会给布尔什维主义提供某种基础。但是要说它们能够掌握法国的无产阶级、甚或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乃是绝对办不到的。当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面临着大规模的决定性斗争，而这些斗争只有通过紧密的团结和合作才能取得胜利时，它的发展就会以分裂告终。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决不可能促进正在酝酿中的世界革命。它所能够尽力做到的，是危害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由于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已经危及德国的革命。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一切成员所抱定的共同的、单一的社会方向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等到它把追随教权党的天主教工人争取过来以后，就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如果它占有了多数，争取民主的斗争、即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就会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获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就可以立刻在财富方面收获到由它的活动争取得来的最丰盛的果实，那个财富是德国资本主义增殖和积累起来的，可以用来迅速地改善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状况。世界大战把这个财富一扫而空。战后的德国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不管生产资料归谁掌握，根本不可能为群众创造较好的生活状况了。可是，由于军队的溃败和

解体，这次世界大战也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依靠政敌的破产而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虽然在这个时候，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它本身已经削弱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想要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它就绝对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人们本来可以认为，既然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即对于战争的态度现在已经消失，目前的要求可以格外迅速地实现了。

可是，十分不幸，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在德国社会主义队伍中间打进了一个新的楔子，那个宣传要求我党放弃不可缺少的民主主张，建立工人代表会议的独裁制度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为了不致被人误解，布尔什维克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其目的显然是想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规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年底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在几个月以后出版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同革命以前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另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的政党相呼应，德国已经产生了独裁和民主的对立。这种对立引起了那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在政治上的变化多端和分裂，并在独立党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而且，它终于在一部分右翼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一种反响来反对这些倾向，但是这种反响的火力偏高，没有射中目标，并且造成了倾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趋势，而右翼社会主义者由于战争政策的结果，已经和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多共同之处。

十一月九日的革命打破了同资产阶级的这种联合，产生了同独立党人的谅解。可惜这只是暂时的。在德国，要想推行一种包括全部帝国在内的真正的、永久的和有效的独裁形式，同在西欧一样不可能。人民已经大有进步，不会听任建立这种制度。无产阶级的个别党派想要采取独裁的一切企图只会获得暂时的成功。那些企图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加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并为反革命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但是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也决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和绝对的政权。在德同，要继续实行违反工人利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诺斯克的警卫队在柏林所表现的极端行动，在慕尼黑爆发的可怕的狂暴，并不足以证明政府的独裁权力。这种行动倒是表明了政府对待那些人的态度是软弱无能的。那些人由政府召来，肯定能够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出可怕的报复行动，但他们本身是没有能力支配政府的。

无论左派或右派的这种争取独裁的努力，不会导致真正的独裁，而只会导致混乱和彻底的毁灭；当一切生产都将停顿、一切食物商品都将消耗净尽时，它不会给与我们较高的生活方式，而只会使我们产生残忍的心理。甚至在它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有想要采用独裁制的企图，只会增加用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残酷与横暴的程度，以及增加受害者的人数，作为那种努力的一个结果。这种做法将使人们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积极的建设。诺斯克的统治和苏维埃的独裁都可以这么说。

目前，有人正在替某种形式的独裁作宣传，说它只会是暂时性的，无论如何不会采用暴力等等。这是一切可能的幻想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在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阶级都已充分理

解到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任何政党只有利用专制手段才能行使独裁。不管他们的见解多么和平，也不管他们只把独裁当作为积极工作取得必要力量的手段的决心多大，不久就会发现，在他们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种种独裁的方法都会被束之高阁，所剩下的不过是虐政而已。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避免虐政、促成某种平稳的积极建设的唯一手段。但是在目前，民主制度已经在理论上被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所压倒，并在实践上被右派所压倒。国民议会本身决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没有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现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帝国团结一致的唯一制度，不是通过工人代表会议，也不是通过一个独裁的政府，而只有通过一个由帝国各部分的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才能产生。现在的组织当然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谁选举了其中的多数的呢？这是积极的民众，也就是当工人代表会议在一个体系中被建立起来以后要去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那些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组织机构中的选票还不到国民议会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工人阶级代表着全国总票数的十分之九。

只要工人代表会议包括各大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它们的面貌就和同民议会迥然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可以对进步的政策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切国有化的努力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可是它们仅仅凭这种身分是不能够很好地代替国民议会的。因为，这种工人代表会议的制度越是扩展到大工业的全部领域，它越是把全体的工人群众包括在内，中央委员会在其组织上就愈加近似国民议会，但它没有给与它的多数以国民议会的多数由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拥有的那种权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议会制和民主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这种说法最近也出现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没有一种说法比这更错误的了。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形式按照它们所代表的人们的性质，可以有绝对不同的内容。如果在一个议会里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那么议会制就会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这些政党不起作用，它们的议会制也将是不起作用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一旦出现在议会里，整个的局势就根本改变了。现在有人说，即使实行最自由的和完全秘密的投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资本家统治着报刊并收买工人。但是，如果资本家真正能够这样地收买工人，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革命之后，他们也就同样可以影响那些有权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人了。另一种说法是：即使实行彻底的秘密投票，即使在群众中获得多数工资收入者的支持，由于资本家能够对无产阶级运用财政权力，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在任何议会中获得多数。这种说法等于是把无产阶级看作一帮软弱而胆小的无知之徒，并宣告无产阶级事业的破产。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具有这种可怜的不健康的素质，那么，无论世界上有任何制度可以不顾无产阶级在精神和智力上的无能而被煞费心机地用来保证胜利，它对无产阶级也是毫无助益的。

如果今天德国的国民议会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它已经在工人阶级和独立党人中间造成对于国民议会的某种不信任，并且在选举当中还损害了独立党人的利益。其它的工人阶级成员、即正要同资产阶级集团决裂的天

主教徒也因而遭到削弱，听凭资产阶级的领导。

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的领导下是决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一座障壁，使人们不能把斗争集中到可以进行改革、即选举国民议会这一点上，而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无产阶级的代表将组成多数，准备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努力从事全国的国有化的工作。他们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实行现在还不过刚刚开端的德国的民主化的工作。必须成为任何可能当政的纯社会主义政府的纲领的，正是这种议会政治而不是独裁政治。这样，它也就能够获得天主教工人、甚至一切资产阶级派系的拥戴，如果他们能从这个纲领中看到有办法使共和国避免一场由于互争雄长的政党的独裁倾向而已经发生的内战的话。假如共产党人说，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法，那么我们的答复是：民主的代替物、即独裁本身只会导致一场革命，导致过去时代所特有的暴力方法。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度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只是传入法国、英国、此利时和其它国家的以人口调查为依据的选举权，而不是平等的选举权。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平等的普选权——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实，可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们似乎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是把阶级斗争从交手仗变为运用理智的战斗的方法，在这种战斗中，一个阶级只有和它的对手处于同样的知识和道德的水平上，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制度是赖以实现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说的文明人的权利。独裁制度只会导致一向被称为亚洲式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可是这个称谓并不公道，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和佛陀。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或许更确切一些。

德国工人阶级没有从他们自己的胜利中得到什么收获，没有懂得怎样利用民主制度作为解放自己的适当的工具，其所以如此，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自然负有较大的责任，但除此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人的颠复和破坏活动，是由于他们用无益的冒险行动浪费了无产阶级的实力。

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前景。这些地区、特别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族国家，战后在经济上不像其它地区那样虚弱。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进步的形式和每一次权力的获得，必然会直接带来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也一定会采取此战前更加强烈的形式。

战争和战后的胜利所引起的爱国热情横溢的时期正在很快地成为过去。变化已经开始，等到和约签订以后还将以越来越高的速度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和约给战败国增加了多么沉重的负担，既然现在到处的注意力都将从对外问题转到国内政策的问题，战胜国的人民所蒙受的牺牲也是会同样被感觉到的。

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的对抗经常会随着觉悟程度的提高而带有越来越坚强的形式。德国的、尤其是俄国的革命在这方面起了诱发的作用。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

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作出了大得多的工作，因为那些人员应该负责的，是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损害而不是革命的成就。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它的国际压力很大，足以使得将来一切的经济进步沿着社会主义的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大战已使这个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显然，我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世界一步跳进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不是一架可以按照预先画好的图样装配起来的、一经开动就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相反地，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作的过程，正如其它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一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那个过程在这些规律的范围内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也能比较充分地发展起来，其结果是我们在目前无法逆料的。

我们现在没有“可以根据民众的决定来实行的现成的乌托邦”。现今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的力量的解放。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正在全世界发生而愿意称之为世界革命，那么我们肯定是面临着一场世界革命。它的进程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线，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实现那些有待无产阶级努力完成的较高的生活方式。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杜 1960 年版，第 162 一 190 页。

[2]《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正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5 页。

[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9—230 页。

[4]纳特．文希一马列叶夫博士编：《布尔什维克在干些什么？》，洛桑 1919 年版，第 10 页。

[5]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17 页。

[6]《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5 页。

[7]同上书，第 235—236 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8]审判耶稣的总督，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译者

[9]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21 页。

[10]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预料革命则将爆发，但它是于一八四八年在大陆上而不是在英国来到的，并且革命本身也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原编者

[11]热月九日是罗伯斯此尔被推翻和巴黎的恐怖统治崩溃的那一天。

[1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86 一 587 页。

[13]加弗隆斯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柏林工 919 年版，地 39 页.

[14]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4 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15]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6 一 247 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6]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7 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7]德国作家鲁道尔夫．拉斯普所撰荒诞不经的故事中的人物。——译者

18]《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0—241 页。

[19]《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0 页。

[20]《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7 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21]《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2 页。——译者

[22]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1919 年 3 月 1 日第 59 号。

[23]罗斯：《拿破仑一世》，1916 年版，第一卷，第 50 页。

译名对照表（略）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20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柏林 Verlag Neues Vater land 1919 年出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卡尔．考茨基着

马清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3 年 6 月第 I 版

1964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02　定价(七)0．80 元

印数 2001—3000

內部发行

統一书号：3002·102
定　　价：0.80 元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20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轉譯。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柏林 Verlag Neues Vaterland 1919 年出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3年6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2·102 定价(七) 0.80元
印数 2,001—3,000